

李慎之与转型中国

——自由主义议题在后极权中国社会的提出

**Li Shen zhi and China's Transformation : Liberalism in Post-
totalitarian China**

丘岳首
QIU Yueshou

博士
PhD

悉尼科技大学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SYDNEY

2007

Students are required to make a declaration when they submit the thesis for examination. Here is a recommended form of words.

CERTIFICATE OF AUTHORSHIP/ORIGINALITY

I certify that the work in this thesis has not previously been submitted for a degree nor has it been submitted as part of requirements for a degree except as fully acknowledged within the text.

I also certify that the thesis has been written by me. Any help that I have received in my research work and the preparation of the thesis itself has been acknowledged. In addition, I certify that all information sources and literature used are indicated in the thesis.

Signature of Candidate

Production Note:
Signature removed prior to publication.

鸣谢：

Acknowledgements

悉尼科技大学国际研究学院冯崇义博士导师对笔者的多方指教；

悉尼科技大学国际研究学院杨经青博士为这项研究做出的辛勤劳动；

师友徐友渔、朱学勤、秦晖、吴国光、丁东等对自由主义和李慎之的卓越研究成果为这项研究的写作提供了许多现成资料。

目 录

| | |
|----------------------|----|
| 鸣谢 | II |
| 论文摘要 | VI |
| 绪 论 | 1 |
| 一、选题意义 | 1 |
| 二、文献综述 | 5 |
| 三、论文主体结构 | 7 |
| 第一章 自由主义在中国 | 9 |
| 一、自由主义概述 | 9 |
| (一)、自由主义的基本内涵 | 9 |
| (二)、蒙难和蒙羞的中国自由主义 | 12 |
| 二、世纪末的重新发现：胡适与陈独秀 | 13 |
| (一)、四九年后大陆教科书中的鲁迅和胡适 | 13 |
| (二)、 “二十一世纪是胡适的世纪” | 18 |
| (三)、 “大彻大悟” 的陈独秀 | 19 |
| (四)、殊途同归的陈独秀与李慎之 | 21 |
| 三、半个世纪的断裂：顾准与陈寅恪 | 22 |
| (一)、 “我们有顾准 ” | 22 |
| (二)、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 27 |
| 四、当代中国自由主义的困境 | 29 |
| (一)、从胡平到李慎之 | 29 |
| (二)、批判“新自由主义” 剑指何方？ | 34 |
| 第二章 后极权中国社会与李慎之现象 | 39 |
| 一、 极权与后极权 | 39 |
| (一)、政权类型特征比较 | 39 |

| | |
|------------------------------------|-----------|
| (二)、1949年后30年中国社会的极权主义性质 | 42 |
| 二、 后极权中国社会的基本特征 | 45 |
| (一)、极权社会与后极权社会的分界 | 45 |
| (二)、后极权中国社会的基本特征 | 47 |
| (三)、后极权社会的深层危机 | 49 |
| 三、李慎之的人生道路 | 52 |
| (一)、“两头真”与“三朝元老” | 52 |
| (二)、触拊“逆鳞”的专业户 | 54 |
| (三)、剔肉还母，剔骨还父 | 54 |
| 四、“李慎之现象” | 55 |
| (一)、“李慎之现象”的界定 | 56 |
| (二)、“李慎之现象”的意义和对未来中国的影响 | 56 |
| (三)、“李慎之现象”的忧思 | 58 |
| 第三章 破题：大陆五十年来中国自由主义思想体系公开亮相 | 62 |
| 一、“毛毛雨”与“冒叫” | 62 |
| 二、起而行，自由主义难在实践 | 63 |
| 三、勇气有时比见识更重要 | 66 |
| (一)、“子路型士人” | 66 |
| (二)、“虽千万人吾往矣” | 67 |
| 四、自由主义旗帜下日益壮大的队伍 | 68 |
| 第四章 李慎之晚年思想的主要内涵 | 70 |
| 一、重新认识中国文化传统 | 70 |
| (一)、“传统文化”与“文化传统” | 70 |
| (二)、中国专制主义的支撑与特点 | 73 |

| | |
|---------------------------------|-----|
| 二、自由主义：瓦解专制极权最有效的思想力量 | 76 |
| （一）、自由主义是“最不坏”的主义 | 76 |
| （二）、“制度民主化”与“子民公民化” | 78 |
| （三）、“创旧”：回到“五四”、重新启蒙 | 79 |
| （四）、“全球化”与“民主化” | 82 |
| 三、重新点燃理想的火炬 | 85 |
| （一）、必须重燃理想之火 | 85 |
| （二）、“一个真正的理想主义者” | 87 |
| | |
| 第五章 李慎之现象引发的思考与争议 | 91 |
| 一、纪念李慎之的文集和研讨会 | 91 |
| （一）、《怀念李慎之》两册和《李慎之文选》三册 | 91 |
| （二）、“李慎之和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命运”学术研讨会 | 94 |
| 二、围绕李慎之现象的批评与反批评 | 100 |
| （一）、如何理解思想的“原创性” | 100 |
| （二）、如何评价“中共党内民主派” | 108 |
| 三、从书信看更为真实的李慎之内心世界 | 110 |
| （一）、李慎之书信的主要内容 | 111 |
| （二）、李慎之与许良英的书信往来 | 115 |
| | |
| 结论 | 117 |
| | |
| 附录一：李慎之子女为明报出版社出版《李慎之文选》所写的“后记” | 119 |
| | |
| 附录二：许良英：《痛悼挚友、同志李慎之》 | 120 |
| | |
| 参考书目 | 132 |

内容摘要

本论文依据李慎之先生已发表的全部文本和大量相关一手材料，对李慎之晚年思想进行细致和系统的梳理，通过对李慎之晚年思想与自由主义在中国近百年历史的延伸内在的联系的探究，依据上世纪四十年代以来人类对极权主义（Totalitarianism）的认识来分析考察近期中国社会的新变化并把握“李慎之现象”，对李慎之晚年思想在转型中的后极权中国社会的价值和意义做出初步的评价和定论。

本论文认为：对中国专制主义传统的批判和对自由主义价值的褒扬是李慎之晚年思想的内核。李慎之思想的嬗变是一个去后极权“党文化”的过程，是一个中国转型时期中国知识学人角色转换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李慎之虽难以脱尽“党文化”和“王者师”色彩，但这并未阻碍他突破专制主义意识形态的桎梏而达至对后极权中国社会本质特征的洞彻认知。基于这种认知和勇气，李慎之成为否定依据“唯物史观”对中国历史的分期，将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纳入中国专制主义框架来分析和认识，并明确提出必须彰显自由主义个人价值、以自由主义的价值观念作为消解中国专制主义和极权主义的最好思想资源、唯有自由主义是中国未来出路见解的杰出学人。也是基于对自由主义思想体系价值和后极权中国社会本质特征的洞彻认知，李慎之力倡重新启蒙和公民教育、高扬全球化与民主化旗帜、呼吁重燃理想之火实践自由。

本论文将李慎之现象界定为：知识学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自觉进行知识结构的调整和重组，这种调整和重组具有鲜明的自由主义指向，并且不屑于隐瞒自己新的思想倾向，勇敢争取和捍卫自由言说等个人基本权利的现象。认为这一现象在中国后极权时代的出现，对中国社会的转型将产生重大作用和影响。

本论文高度评价李慎之带头努力使自由主义议题得以在后极权中国社会重新提出。自由主义议题在百年前的中国晨钟初鸣，历经战火洗劫和政治强人拒斥，奄奄一息至 1998 年重浮出水面并在大面积范围内产生巨大影响，李慎之是推动此一重大历史转折的第一功臣。自由主义议题在中国后极权时代的重新提出对推动中国社会的转型具有重大的实践意义。李慎之晚年思想已经为中国改革向政治体制深层的推进标明了正确的方向并注入了新的动力，也将极大影响和加速改变中国知识学人思想文化结构的重组和转换。

本论文高度评价李慎之晚年思想的转变对于正在急剧分化的中国执政党产生的影响。李慎之挣脱了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桎梏，义无反顾地从党内公开打出自由主义这面大旗，向共产党人特别是中共党内开明派和在不同程度上具有自由主义民主倾向尚未完全认同自由主义民主的“半民主派”指明了彻底转变为自由主义者的唯一正确出路。在李慎之的带动下，分化的中共党内高层中更多有自由主义倾向的智者，正在将自由主义理念和实践落实在中国的进程中发挥独特和重要的作用。

Abstract

Making use of a large quantity of materials in original sources, this thesis is an attempt to evaluate the significance of Li Shenzhi's thinking in his later years in the context of current political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 in China. The thesis examines in a systematic way the thinking of Li Shenzhi in his later years, with a focus on his outstanding contribution to the rise of liberalism in China in the 1990s.

This is one of the few studies applying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totalitarianism for the analysis of the intellectual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s in contemporary China. It explores the reality of post-totalitarian regime in China as the social condition for the rise of liberalism and the restraints on intellectual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s in that country.

The term "Li Shenzhi Phenomenon" is coined in the thesis to describe and analyse the conversion of communists to liberals in their later years. Li Shenzhi is highly representative for a small group of old communists who made an intellectual and political lead through embracement of liberalism, adjusting and reorganizing their entire ideological and knowledge structure.

For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Li Shenzhi Phenomenon", the thesis also traces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liberalism in China over the last century. From the historical perspective, we can see very clearly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efforts made by Li Shenzhi in his later years. Suppression of liberal democracy has plunged China into disasters so many times in the last century that we could definitely appreciate the wisdom for Li Shenzhi to advocate liberal democracy as the only viable future for China. As an arguably most outstanding liberal scholar in the 1990s, Li Shenzhi revived the liberal discourse in China and pointed out that the basic liberal values constituted the best intellectual resources to eliminate the Chinese absolutism and totalitarianism. It is believed that the "Li Shenzhi Phenomenon" in the period of post-totalitarianism in China will have great impacts on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Chinese society.

绪论

一、选题意义

1998年，一个老人以《弘扬北大的自由主义传统》的重锄掘开了将自由主义禁锢了近四十年堤坝的一个决口，让自由主义思潮再次漫过中国大地国人心田。这个老人便是前中国社科院副院长李慎之。2003年3月，李慎之先生在北京逝世，中国境内外思想界人士纷纷发表悼念文章，除来不及收集的文章外，仅丁东主编的《怀念李慎之》上下两册的纪念文章就近一百五十篇。一位退休老人受到民间这样的重视为多年来中国所仅见，王若望、王若水、吴祖光等异见人士去世时都没有享此殊荣。饶有意味的是，多如牛毛的中国出版社，竟无一家能够出版该文集，文集最后是以作者各掏腰包，并以无出版号“谨作纪念，概不出售”的方式印刷出版。

李慎之生前没有专著出版，去世后出版的文集收了九十几篇文章，大部分写于1990年代，散落在国内的杂志上。这些有悖官方“主旋律”文章的数量虽不算多，但已发生的影响之深之广却已成思想界罕见的事实。从已公开表态赞同支持李慎之晚年思想的人士来看，聚集在李慎之执掌的自由主义思想旗帜下，由不同身份、年龄、国界人士组成的队伍已略具规模，并正日益壮大。

李慎之究竟是否是有深度的思想家，算不算自由派的领军人，自由主义在当代中国的“破题”是在1980年代或是1990年代仍是有争议之题。事实上，八十年代以胡平发表在武汉《青年论坛》的《论言论自由》、陈奎德由华东化工学院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新自由论》为例，已有一批有自由主义思想倾向的学者活跃在思想界，但随后这些当代中国自由主义初啼旋即归于静寂。这除了当时政治环境、学术条件等原因之外，至少也显示这一时期的大多论者并未能全面系统地领悟到自由主义的价值真谛。特别是1980年代提倡自由主义的人们并没有明确将自由主义视为高于马列主义的意识形态提出来，要求以自由主义思想体系取代马列主义思想体系。

由于李慎之的思想观念从共产主义向自由主义的转换只是晚近才完成，也由于国内语境的特别敏感和诸多限制，现有对“李慎之现象”的思考文章或欲言又止语焉不详或蜻蜓点水浅尝辄止，至今深入和细致的研究成果尚未多见。

李慎之明确提出唯有自由主义是中国未来出路，此举在后极权中国社会具有振聋发聩的重大现实意义，已经对中国向民主社会的转型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加之李慎

之是中共的老党员，在党内官居副部级高位，他晚年思想的转变，对于正在急剧分化的中国执政党，也将产生难以估量的影响。很显然，李慎之晚年思想对于未来中国社会政治和文化的重构具有十分重要的实践意义，也将极大影响和改变中国新一代知识学人既定的思维模式。

“李慎之现象”何以在此一时期得以呈现并蔚为大观？后极权中国社会产生李慎之现象的历史和现实的深层原因是什么？这种现象的意义何在？对当代中国社会的转型将产生怎么样的影响？李慎之思想的来源和构成是什么？如何准确理解和评价李慎之晚年思想的价值和地位？这些思想将如何影响现实生活及未来中国的走向？这些重要的问题急待研究，是中国思想界必需面对和深入思考的课题。

由于与现执政党的官方意识形态相悖，李慎之晚年思想的研究工作在大陆受到诸多限制无从深入展开，而笔者认为并坚信这项工作具有很高的学术和现实意义。

为此我确立了上述的研究课题。

笔者认为，“李慎之现象”与自由主义在中国近百年历史的延伸有一种内在的联系。自由主义思想价值观念是专制极权主义的天敌。观察和分析“李慎之现象”当然有多视角可以切入，但要准确把握“李慎之现象”必须首先把握当代后极权中国社会的本质特征。依据上世纪四十年代以来人类对极权主义（Totalitarianism）的认识来分析考察近期中国社会的新变化，可以使我们对转型时期的“李慎之现象”有一个较为清晰的认识。

对中国专制主义传统的批判和对自由主义价值的高扬是李慎之晚年思想的内核，本论文依据李慎之先生已发表的全部文本和大量相关一手材料，对李慎之晚年思想进行细致和系统的梳理。通过对李慎之晚年思想的历史成因和文化背景的探究，本论文对李慎之晚年思想在转型中的后极权中国社会的价值和意义做出初步的评价和定论。

李慎之思想的嬗变是一个消解极权“党文化”的过程，是一个转型时期中国知识学人角色转换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李慎之难以脱尽“党文化”和“王者师”色彩，但这并未阻碍他突破专制主义意识形态的桎梏而达至对后极权中国社会本质特征的洞彻认知。基于这种认知和勇气，李慎之成为否定依据“唯物史观”对中国历史的分期，将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纳入中国专制主义框架来分析和认识，并明确提出唯有自由主义是中国未来出路见解的杰出学人。

本论文力求对一些理论和核心概念如自由主义、极权主义、后极权主义和李慎之现象等有准确的理解和把握。为准确把握这些概念，笔者重新梳理了西方自由主义从

古典到当代的发展脉络，仔细思考分析了当代西方自由主义的分支和新思潮以及它们对当代中国的影响。同时，笔者认真回顾了自由主义进入中国百年的浮沉消长，在严复——胡适——陈独秀——殷海光——雷震——储安平——顾准——胡平——李慎之这一“道统”上沉思中国自由主义的曲折命运以及对当今转型中国的实质影响和未来走向。

根据极权和后极权主义理论，笔者初步界定后极权中国社会的七个基本特征：①极权主义意识形态因其乌托邦属性的显现而失却对社会全面强控制的能力，以至于掌权者不得不将之虚置和淡化，如“不争论”敏感理论问题，不问姓资姓社等。②失去意识形态支撑合法性的极权权力的边界开始出现可以伸缩的不确定模糊地带，从而使原本极为狭窄的个人和社会团体活动空间有所拓宽，但“一党专政”的政治一元化防线依然如故。③迷信经济能提供政权的合法性的权力执掌者开始有选择的放松对经济的控制，以发展经济作为维护自身合法性的主要手段和资源（辅之以民族主义和国情论），同时以刺激消费欲望消弭对其权力合法性的怀疑和追问。④不再以大规模社会动员方式强制人的思想言论，但仍以行政、警察、技术、黑帮等手段控制大众舆论，如勒令停刊、禁止出版、封杀网站、逮捕和殴打异见人士等。⑤逐步完善一些法制但仍然拒绝任何政党在宪法范围内竞争活动的法治。⑥机会主义和务实的新官僚作风以寻求权力稳定的新秩序，如亲民、扶贫、允许资本家入党、鼓吹“和谐”等。⑦基于利益算计，各利益集团之间的博弈加剧。

笔者将李慎之现象界定为：知识学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自觉进行知识结构的调整和重组，这种调整和重组具有鲜明的自由主义指向，并且不屑于隐瞒自己新的思想倾向，勇敢争取和捍卫自由言说等个人基本权利的现象。

由于目前国内理论和学术的研究仍受到后极权政府的严密控制，现有对李慎之晚年思想的研究尚未能深入，比如极权主义概念在目前的国内语境中就尚未广泛应用，更少有人从后极权主义理论的视角切入来分析研究李慎之现象，故笔者认为目前选定和完成的研究课题有一定的原创性和开拓意义。

在海外的中国问题研究中，虽已有仲维光、曹长青等涉入了对李慎之的评论和研究，但笔者在认真分析他们的论点和论据之后发现，他们由于被中国政府拒绝入境长期滞留海外，对自由主义在当代中国本土艰难的处境较为生疏，加之又以绝对的国际先进学术标准来衡量李慎之晚年思想的价值，贬低国内致力于自由主义常识传播的人士，这种傲慢与偏见不但不切实际而且导向存有严重偏颇的结论。

当前大陆执政党已严重分化，在中共党内，像李慎之这样完全挣脱了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智者以及一些有自由主义倾向的高层人士，在推进自由主义理念和实践在中国的进程中有其独特和重要的作用。海外曹、仲等人对李慎之没有退党的指责以及由此对李慎之晚年思想价值的贬低是幼稚和肤浅之见。

运用后极权理论来抓住当代中国社会的本质特征，由这一角度的切入来考察“李慎之现象”，笔者认为李慎之努力在后极权中国时代重新提出自由主义议题，此举对转型中国的重大作用和影响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以真话对抗消解极权主义意识形态。

极权意识形态以一套动听的话语为极权主义披上迷人的漂亮外衣。

讲真话是“李慎之现象”的突出特征，以真话对抗谎言以消解极权主义意识形态，以个体言说对抗总体话语以彰显自由主义个人价值，是“李慎之现象”意义的一个重要方面。

二是为改革向政治体制深层的推进注入新的动力。

遭受 1989 年那场打击，中共党内民主派可说已是溃不成军。一段时间内，社会上弥漫着一种看不到推进改革的新的内在动力的悲观情绪。似乎各利益集团已经安稳于既得的利益之上，知识精英也乐于为新的权贵效命，极权统治下的经济并没有像预料那样濒临崩溃，相反它在填饱庞大官僚集团贪婪的胃口之外，也勉强可以解决下岗工人和贫困农民的温饱，社会的改革与转型陷于停滞或临近终结。

作为“李慎之现象”主要内涵的自由主义思想观念大面积的传播漫开，为改革指明了新的进路，给改革注入了新的强大内在动力。自由主义者显然不停留在经济层面上的改革诉求，而是从人的全面需求上，为获得人的自由权利的根本保证上要求改革纵深伸展，进行新的政治体制安排。

作为在党内主张以民主宪政为目标推进政治改革的一员大将，李慎之公开打出自由主义这面大旗，不但在学术思想界掀起欣然大波，影响了一代知识学人，也向共产党人特别是中共党内开明派和不同程度上具有自由主义民主倾向但尚未完全认同自由主义民主的“半民主派”指明了彻底转变为自由主义者的唯一正确出路。

三是为困惑的理论界引入新的进路指引。

“六、四”后中国理论界还弥漫着一种思想的混乱。在学界三大派系中，保守主义要求在原有体制框架下进行改良的小修小补或回归中国传统儒家方略；新左派喋喋

不休于资本的罪恶和社会不公而绝少论及极权与专制对人权的践踏，此两种理论的论者虽具有人道情怀却未能切中时弊，因而在极权主义面前显得苍白无力。

自由主义者在表明自己鲜明的反极权专制立场的同时，拒绝非理性的暴力革命，也因为将人的生命和财产置于首位而极力防止社会的剧烈振荡。注重理性和建设，理性地抗争，妥协中建设，是自由主义理论不同于其它主义的显著特征。

自由主义在全球范围内的实践已经证明了自己的普适性和优越性，无论中国民族主义情绪如何浓重，国情如何特别，“李慎之现象”蔚为大观这一事实已经表明自由主义理论体系必将在中国的土地上证明自己的普世价值。

四是加速知识学人思想文化结构的重组和转换。

民族主义、社会主义、自由主义是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学人思想文化结构的主要构成，而自由主义因先天不足和后天失调而在这三块板块中面积最小。“李慎之现象”将促使上述现实的变化。自由主义的价值观念作为消解极权主义的最好思想资源，将在国人的思想文化结构版面上占据更为主要的位置。

五是自由主义学理落实于实践。

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坎坷命运，也造成了中国知识学人对自由主义学理认识的贫困。就此一点，书斋中学者对自由主义学理深入细致的研究不但无可指摘而且应大加鼓励。但同时更应倡导实践自由。自由主义既是一种学理，也是一种生活方式，归根结底，这种学理是要让每个个人在生活行为上从极权主义的束缚中“自由”出来。

“李慎之现象”正是崇尚自由主义的知识学人将学理推向实践的一种重要现象。

二、文献综述

三年来，笔者阅读了大量与李慎之的课题研究相关的书籍，并作了许多重要资料积累。

关于极权主义和后极权主义，笔者阅读了艾兰特的《论极权主义的起源》

（Hannah Arndt, *The Original of Totalitarianism*, New York, Haricot, Brace, 1951）等有关论著，反复辨认林兹对政权类型的比较论述，认清了极权主义和后极权主义的基本特征和不同。¹

¹艾兰特：《论极权主义的起源》，台湾时代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1995年版

李强的《自由主义》是较早在中国大陆系统介绍自由主义价值观念体系的专著，通过反复阅读研究此作，笔者对自由主义价值观念体系有较全面的了解把握。²

刘泽华《专制权力与中国社会》、《中国的王权主义》等著作对中国专制主义传统有很好的论述，也让笔者得益非浅。³

马蒂阿森的《以自由看待发展》一书获联合国秘书长安南高度评价：“全世界贫穷的、被剥夺的人们在经济学家中找不到任何人比森更加言理明晰地、富有远见地捍卫他们的利益。通过阐明我们的生活质量应该不是根据我们的财富而是根据我们的自由来衡量，他的著作已经对发展的理论和实践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联合国在自己的发展工作中极大地获益于森教授观点的明智和健全。”被大量“吸纳”到联合国制订的《人类发展报告》中的马蒂阿森的自由主义思想，也贯穿于本论著之中。⁴

徐友渔、朱学勤、秦晖、吴国光、吴稼祥、任剑涛及笔者的学位导师冯崇义等学者对极权主义、后极权主义、自由主义和李慎之都有很好的研究成果，他们的论著开阔了笔者眼界，为笔者完成本论文提供了大量宝贵的资料素材。（笔者阅读和引叙的主要书籍见附录的参考书目）。

由上述的这些理论资料 and 核心概念，笔者得以确立了极权主义和后极权主义的理论分析框架，并以此来对目前的中国社会和李慎之现象进行独特的分析研究。

在广泛的阅读和思考过程中，笔者就自己的理解对一些资料的含义进行认真和细致的分析、评价和取舍整合。比如：李慎之本人的论述哪些是有原创性的论述？哪些是在别人观点的基础上做出新的发挥？哪些是受时代局限的不完全正确的思想？对于有关李先生的评论，哪些是比较中肯的？哪些是存在偏颇的？哪些又是完全错误的？由此，笔者作了许多思考笔记，一些分析和思考已整理成独立的文章，发表于杂志和网刊。

2003年在悉尼召开的“李慎之和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命运学术研讨会”，于笔者是一次难得的学习机会。在会上会下与到会的专家学者交流之中，笔者了解到许多关于李慎之的一手材料。到会的徐友渔、朱学勤、秦晖、吴稼祥、高放、崔卫平等都直接与李慎之先生有近距离的交往。从他们那里，笔者认识了另一个文章之外的“李慎之”。作为李慎之多年的老朋友，高放教授透露了他们多年前私下设想共产党分 A 和

² 李强：《自由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³ 刘泽华：《专制权力与中国社会》吉林文史出版社 1988 年与汪茂和、王兰仲合著

刘泽华：《中国的王权主义》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 年出版

⁴ 马蒂阿森：《以自由看待发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3 年出版

B 来互相监督等史迹，使笔者能更详尽和全面的理解李慎之。从另一位拥有许多李慎之未公开发表文字资料的丁东先生传给导师冯崇义的资料邮件，笔者还了解到许多李慎之未曝光的真实思想从而认识了一个尚未广为人知的李慎之。

这些材料的收集整理为笔者的学位论文的研究和写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三、论文主体结构

本论文主体部分共分五章，简述如下：

第一章：本章简介自由主义的基本内涵，从近代以来国共两党蒋介石、毛泽东、邓小平等政治强人对自由主义的围剿、拒斥、挤压和毁灭性打击，从保守主义和新左派对晚近重新浮现的自由主义的夹击，从 1980 年代官方发动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勾画出中国自由主义不断被曲解、误导甚至于被蹂躏的蒙难和蒙羞的百年历史轨迹；从 1949 年后大陆教科书中鲁迅和胡适的不同评价论述世纪末的重新发现——“二十一世纪是胡适的世纪”；从陈独秀的大彻大悟论述陈独秀与李慎之的殊途同归；通过比较顾准与李慎之的异同描述 1949 年后一灯如豆的自由主义在黑暗如盘的思想隧道中的艰难掘进；论述陈寅恪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对李慎之的巨大影响；论述从上世纪七十年代胡平的《论言论自由》到九十年代在李慎之等人的努力下自由主义再次浮出水面的当代中国自由主义困境；对当局新近组织批判所谓的“新自由主义”的用心和目的作一些分析。

第二章：本章介绍以研究政权类型闻名于世的美国学者林兹(Juan J. Linz)对民主、专制、极权、后极权和苏丹式政权的不同特征的论述；分辨 1949 年后 30 年中国社会的极权主义性质；以极权与后极权社会的异同对比描述后极权中国社会的基本特征；对中国极权社会与后极权社会进行分界；论述后极权中国社会的深层危机。

第三章：本章简述李慎之“两头真”和触拊“逆鳞”专业户的人生道路；对“李慎之现象”做出界定；分析“李慎之现象”的意义和对未来中国的影响并表达自己对“李慎之现象”的一些忧虑；通过回顾李慎之“剔肉还母，剔骨还父”、“起而行”、“冒叫”自由主义论述实践自由主义的艰难和重要；评析李慎之的“子路型”人格特征和“虽千万人吾往矣”的胆识和勇气；概述自由主义旗帜下日益壮大的队伍。

第四章：本章论述李慎之晚年思想的主要内涵；评介李慎之重新认识中国传统文化传统、论中国专制主义的特点、公民教育、重新启蒙、全球化与民主化和必须重燃理想之火等论点；论证自由主义是瓦解专制极权最有效的思想力量，李慎之是“一个真正的理想主义者”。

第五章：本章概述了《怀念李慎之》两册和《李慎之文选》三册的出版情况和“李慎之和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命运”学术研讨会；叙述了曹长青和仲维光在肯定李慎之贡献的同时，提出其思想的“原创性”、谏士情结、“过渡人物”“三大局限”等批评以及朱学勤、徐友渔、冯崇义等人的反批评；提出本人对李慎之现象引发的思考与争议的一些看法；从李慎之与许良英的书信往来观察和分析更为真实的李慎之内心世界。

第一章 自由主义在中国

一、自由主义概述

(一)、自由主义的基本内涵

自由主义从西域引进中国不久便被蒙在战乱的硝烟之中。1949年之后，又被新政权遗弃尘封了半个世纪。到九十年代重新浮出水面后，其面目如此陌生难以辨认，以致于我们不得不在开篇之际简单描述一下什么是自由主义。

对于人人都知道毛泽东名字的中国人来说，80年代之前的自由主义便只是毛泽东所说的“迟到、早退、自由散漫”，是绝对的“坏东西”。

第一个把“自由”的概念引入中国的是曾任北大校长的严复。“他翻译了穆勒的《论自由》，但是因为‘中文自由常含放诞、恣睢、无忌惮诸劣义’，怕中国人不能理解自由的真谛而误解为可以‘为放肆、为淫佚、为无法、为无礼’，特地费尽心思译作《群己权界论》，给中国带来了自由的经典定义：人生而自由，他可以做任何他愿意做的事情，但是必须以不妨碍他人的自由为界限。不过，严复在本质上仍然是国家主义者而非自由主义者。自由主义有两大论域，一个是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另一个是个人与国家的关系。在讨论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严复的界权论突出个人的权利，算是把住了自由的脉搏。但在个人与国家的关系上，严复自始至终走在迷途之中。他将国家置于比个人自由权利更为重要的位置，本末倒置，在近现代中国开自由主义向国家主义投诚之先河，后世中国的大部分自由主义者都未能脱此巢臼，以至于有人认为中国根本就没有真正的自由主义者。”⁵ 1980年代以后，自由主义的面目在国人眼里有所改观，但仍是面目模糊，甚至在一些知识精英眼中也被误以为是“贵族思想”、“犬儒主义”的主义。

自由主义如果从1812年西班牙自由党首次采用“自由派”一词以表示他们促进宪政政府的决心时算起，至今近200年，极大地推动了人类思想的自由发展，但至今仍然在西方社会面临着批判和挑战以及自身如何完善发展的问题。中国文字的构词功能

⁵ 李慎之：《北大传统与近代中国》序言，《李慎之文选》，香港明报出版社，第41页

常有奇妙之处，顾名思义，自由主义也就是以“自由”为“主义”。自由主义一言以蔽之，就是以个人自由权利为最高价值的思想观念和制度安排，在诸多价值中优先考虑个人的自由权利。要准确勾勒出自由主义的内涵本质和理论边界不是一件易事，但从如下几个方面的描述至少可以达成人们对自由主义的大体共识。

i. 强调个人的尊严和权利

人生而自由平等，天然具有支配自己身体和财产的权利，在不妨碍他人的前提下，有一切行动的自由。政府的职能以维护个人自由为最终目的。政府的权力应当有限度，不能随意干涉和支配个人的生活，而是以法律为手段维护秩序以保护个人自由。自由主义的核心理念即“个人自由”，它的哲学底蕴，即“个人主义”，个人主义是自由之魂。

ii. 政治上实行宪政民主，结社自由，各党派平等共存，竞争政权。国家政府的权力应分属不同机构，相互之间形成监督和制约的机制，以防止权力被滥用。

iii. 思想文化上多元宽容，信仰、言论、出版自由。

iv. 经济上主张以“自由竞争，公平交易”为基本原则的自由市场经济。国家不负有直接控制生产，支配资源的责任，其职责仅为以法律保障公民在公平基础上的自由竞争。⁶

朱学勤在《1998，自由主义的言说》一文中论及关于自由主义的定性问题，朱学勤简明地将自由主义学理的哲学观、历史观、变革观、经济、政治和伦理思想等加以分列：“它的哲学观是经验主义，与先验主义相对而立；它的历史观是试错演进理论，与各种形式的历史决定论相对而立；它的变革观是渐进主义的扩展演化，与激进主义的人为建构相对而立。它在经济上要求市场机制，与计划体制相对而立；它在政治上要求代议制民主和宪政法治，既反对个人或少数人专制，也反对多数人以“公意”的名义实行群众专政；在伦理上它要求保障个人价值，认为各种价值化约到最后，个人不能化约、不能被牺牲为任何抽象目的的工具。”

按照冯崇义的归纳，“当自由主义者在17世纪的英国最初登上历史舞台时，赋予他们身份特征的要素是反对等级特权，要求平等、进步和改革。后来自由主义逐步发展成为相当复杂的意识形态，包括为个人的自由权利提供理论基础和伦理依据的自由主义哲学，强调个人产权、自由竞争和公平交易的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在社会政治领

⁶ 关于对自由主义的内涵，参阅李强的《自由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第120页

域主张个人权利、个人自由和宪政的政治学说。就自由主义的历史发展而论我们可以区别出 17—18 世纪的古典自由主义，提倡放任自流、个人权利、有限政府和进步改革等等以及 19 世纪以后的现代自由主义，不再支持经济的放任自流，赞成适度的政府干预，而且在不妨害有关个人自由的基本价值的前提下对社会主义做出让步，认可在提供社会福利等方面的集体责任。”⁷

刘军宁在《自由主义如是说》一文中论述：个人的自由是自由主义的核心和一切立场的出发点。在这一意义上，可以把个人主义看作是自由主义的另一种表述。自由主义对个人及其自由有独特的看法。个人有权自由地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以及有充分的自由权来改善自己的生存条件。每个个人在享用自己的自由的同时都应该尊重他人自我实现的权利。每个人都具有其独特的个性，但在价值上却是平等的。

自由主义最主张就是个人的自由，但这是法治之下的自由，因此，为了让每个人享受同等的自由而对个人的自由通过一个人的自由为价值内核的法律来加以必要的限制。自由主义虽然痛恨强制，但并不要求废除一切强制，而只是要求把强制限制在可能的最小范围之内，并受到法律的严格约束。自由主义主张保障人们的自由，但并不保障人们得到某种具体的东西，如幸福或福利。具体的成功或幸福只能由个人运用自由来为之奋斗。换言之，自由主义只允诺人们自由选择的权利，不确保自由选择的结果。一旦把个人自由的原则扩展开来，自由主义就必然主张个人有生命权、财产权、追求幸福权、反抗压迫权等公民权利，有信仰自由、思想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结社自由等基本自由。⁴

石元康关于“自由主义与现代社会”的论述也有助于人们了解自由主义的基本内涵以及这些内涵在现代社会的重要性——

价值多元主义与合理的分歧是现代社会最大的特性。多元主义与合理的分歧不仅是一个现实，而且在可见的将来，它们也还会存在着。当然，多元本身是一种具有积极意义的事情。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使得人类的文化能够放出灿烂的花朵。一元主义只会箝制人的思想。但是，当分歧太大又无法对别人容忍时，最后所能诉诸的只有武力。西方十六世纪宗教改革以来一百多年的宗教战争就是最清楚的例子。许多学者都指出了宗教战争这个历史经验与自由主义的兴起之间的关系。多元与分歧所表现的是不统一甚至是对立。前现代式的统一既然已经一去不返，那么我们就必须找寻一种新

⁷ 冯崇义：《从中国化到全球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第 87 页

⁴ 刘军宁：《自由主义如是说》article.comment-cn.net/show.php?type=sixiang&id=1117651137-43k

的哲学作为多元世界中的统一基础。当然，这种统一在形式上与传统式的统一已经是迥然不同的东西。自由主义哲学就是为这种多元社会提供统一的哲学理论……作为现代性的一个环节，自由主义为现代的多元社会提供了根本的组织原则。人权、自由、公正、平等这些自由主义的根本价值，今天成为人们评价一个社会是否理想的标准。当西方国家用人权作为标准来批评一些非西方国家时，这些被批评的国家所作的响应通常是：由于国情及文化的差异，人权也有不同的标准。它所显示的是，这些被批评的国家也默认人权具有极高的价值。几乎没有人提出过人权是负面的东西，或者人权根本不存在这种说法。这个现象显示了自由主义的威力。其次，在那些自由主义还没有充分实现的社会中，从事社会政治运动的人，所借用的资源也完全是从自由主义那边得来的。

这些现象充分表现出自由主义是现代社会的最基本的意识型态，它为现代社会及国家的正当性提供基础。没有任何其它的理论在现代社会享有这样尊崇的地位。虽然自由主义不断地受到批评，但是没有人可以想象有别的理论，可以取代它在现代社会中的地位。我们甚至可以说，只要现代社会存在一天，自由主义就还是它的基础哲学。⁸

上述几位学者对自由主义的表叙有助于我们较准确地去把握自由主义的主要内涵成份，对自由主义理论体系在各个方面的要求和主张有一个大致的了解。

（二）、蒙难和蒙羞的中国自由主义

自由主义因其自身的主要内涵构成，几乎从一开始就已经注定了它在具有二千多年专制主义传统的中国的多舛命运和坎坷历程。如李慎之所说：“中国毕竟是几千年皇权专制传统极深极厚的社会，经过几十年学人和思想家的努力，自由主义在有十几亿人口的中国社会，也只是浸润到了薄薄的一层。它的根扎得太浅，它的嫩苗十分脆弱，在历史的狂风暴雨中，它曾濒临灭绝的境地。”⁹

“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先天不足，后天失调”。所谓“先天不足”，是指自由主义并非中国土生土长的思想，而是美雨欧风吹进来的。所谓“后天失调”，一方面是 20 世纪上半叶中国长期处于战争环境使然，另一方面是由于它的中国奶娘——严复、梁

⁸ 石元康《自由主义与现代社会》，《开放时代》2003 年第一期

⁹ 李慎之：《北大传统与近代中国》一书的序，《李慎之文选》，香港明报出版社第 41 页

启超等人自身均不是纯粹的自由民主主义者，因而造成幼稚期的中国自由民主主义营养不良，既缺维生素，又缺钙。¹⁰

过往中国自由主义的一百年历史可说是蒙难和蒙羞的历史。所谓蒙难是指自由主义一直受到国共两党蒋介石、毛泽东、邓小平等政治强人的拒斥和打压。毛泽东早在延安作报告《反对自由主义》就开始了对自由主义的围剿；20世纪下半叶，自由主义在中国经历了一连串的毁灭性打击；1980年代自由主义又遭遇邓小平等发动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晚近重新浮现的自由主义也受到保守主义和新左派的夹击。所谓蒙羞是指自由主义不断的被曲解、误导、矮化甚至于妖魔化，被蹂躏得面目皆非。

在回顾早期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历史之时，除上面提到的先贤外我们还无法忘记鲁迅、蔡元培、张佛泉、傅斯年、储安平、马寅初等长长的一串名字。

本文只就直接构成李慎之先生晚年自由主义思想的来源、在今天对于我们更有启示意义的重要人物胡适、陈独秀、陈寅恪与顾准等略加评述。

二、 胡适与陈独秀：世纪末的重新发现

（一）、四九年后大陆教科书中的鲁迅和胡适

历史的帷幕常常遮盖着一些真相,要到潺潺长流的时间洗去厚积的尘灰之后,人们才能看清楚某些事件和人物的真实面目。

今天，学界越来越多的学者已达成共识——胡适是近代中国自由主义的中枢人物。在五四时期有自由主义倾向的文化名人中，较深理解自由的涵义，最为珍惜自由价值，并且终身一以贯之实践自由，宣扬自由精神者，首推胡适。李慎之甚至说：

“二十世纪是鲁迅的世纪，二十一世纪是胡适的世纪。”¹¹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实际领导人是创办《新青年》打出“民主和科学”大旗的陈独秀、北京大学依据兼容并蓄思想汇集自由学者的蔡元培、倡导自由主义和文学改良的胡适等人。然而，从四九年大陆政权换届到七十年代，中国的教科书中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旗手和主将却是鲁迅。鲁迅在1949年后的官办近现代文化思想史的地位如此之高，以至于在“大革文化命”中也是碰不得的“不倒翁”。1980年代初期，高校中文系开始重招研究生，“鲁迅研究”几乎遍布各主要大学，成为报考现代文学专业者第

¹⁰ 殷海光：《中国文化的展望》中国和平出版社，1988年版，第275页

¹¹ 见李普《悼李慎之——我们大家的公民教师》www.taosl.net/dir1/memo_lisz_hejiadong.htm -

一或唯一的选择。而当时的胡适仍然是“被扫进历史垃圾堆”的“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和“闲适文人”。

张耀杰曾指出：“钱（理群）先生是一个比较有学术良知和学术勇气的著名教授，在当下学术界和学术人被普遍压垮的情况下，他甚至可以被称作是最有骨气的大学教授之一，但是他最大的硬伤恰恰在于并没有研究明白他用来教育别人大半辈子的鲁迅其人。这样一个到处拆台害人而没有半点自由主义风度的刀笔文学家，在钱教授的眼里一直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民族魂’和站在民众一边的民族脊梁。稍微翻看一下历史资料，就不难发现鲁迅正是《新青年》的最后拆台者。女师大风潮时的鲁迅，仅仅为了追求一个女学生，就毫无操守地站在当时最为强大的学阀同时也是国民党元老的李石曾、易培基等人一边，充当起栽赃陷害代表自由主义先进文化的胡适、徐志摩、王世杰、陈源等英美派学者的文坛杀手。到了晚年为了充当唯我独尊的文坛皇帝，鲁迅更是发展到丧心病狂的地步，连‘四条汉子’中的夏衍都要为自己付出的血泪代价愤愤不平……”¹² 连钱理群这样一个比较有学术良知和学术勇气的著名教授尚且未能把握好鲁迅，可见鲁迅在一个特定的年代被全民“误读”和抬高到怎么样的程度。

“鲁迅”这一名词头上曾闪耀着权威论定的“思想家、革命家、文学家”的三个“家”七个“最”的光环，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鲁迅被“阶级分析法”层层肢解，政治化。鲁迅被剥剩“斗争精神”，鲁迅的文字在政治权威的语言巫术中咒语化，成为拥护现行意识形态的咒语，成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理论大棒。而鲁迅丰富的生命内涵则完全被忽略，他的个人主义、人道主义、虚无主义，他的爱恨交加，不能够再被提起。鲁迅，完全成为一个政治化的符号，随着政治斗争的需要而被任意宰割、肢解。到“文革”时期，鲁迅完全被神圣化，而胡适则被妖魔化。对鲁迅的“权威”的论断成为惟一论断，阻止了人们自由地接近鲁迅，准确地感受鲁迅。¹³

同一时期，与“胡适”这一名词联系在一起的却是八大册《胡适思想批判》，以及大人物小人物写的大大小的批判文章。不但胡适的书不能出版，甚至凡是语及胡适的，都必须划清界限。

胡适和鲁迅同站在自由主义旗帜下，在四九年后大陆的地位却是天壤之别，其中原因错综复杂。胡适主张宽容改良，抗战胜利国共谈判时，曾写信给毛泽东，劝其仿

¹² 张耀杰：《是不是思想家重要吗？》<http://www.dajun.com.cn>

¹³ 参阅陈愚：《鲁迅、胡适及其角色定位》www.zisi.net/html/wwzh/2005-04-06-15726.

效英国工党，以和平合法竞争方式争取执政。而后胡适又在 49 年 4 月 6 日在去美国的船上写下两篇坚决反对共产极权的文章《自由中国的宗旨》和《<陈独秀的最后见解>序言》明确声明，“我们在今天，眼看见共产党的武力踏到的地方，立刻就罩下了一层十分严密的铁幕。在那铁幕底下，报纸完全没有新闻，言论完全失去自由，其他的人民基本自由更无法存在。这是古代专制帝王不敢行的最彻底的愚民政治，这正是国际共产主义有计划的铁幕恐怖。我们实在不能坐视这种可怕铁幕普遍到全中国。”¹⁴这在当时对“极权主义”还所知甚少的中国，无疑是振聋发聩的精辟之论。但是，这种坚守自由主义来批判极权主义的思想自然不能容于致力于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而且要在这种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政权。胡适后来“也因此被‘我的学生毛泽东’组织大陆学界搞了数百万字的批判”。¹⁵

鲁迅从三十年代初，不时在文章中挖苦，漫骂胡适，以“正人君子”之名影射胡，说他为日本侵略者献策。《伪自由书》一文中说：“胡适博士不愧为日本帝国主义的军师。但是，从中国小百姓方面说来，这却是出卖灵魂的唯一秘诀。”鲁迅从未正面对胡适对新文化运动所做出的巨大贡献、地位和作用，进行过肯定。反之，对于鲁迅，胡适始终保持着好意，有机会的时候，总要为鲁迅说几句公道话。1936 年鲁迅去世后，女作家苏雪林写长信给蔡元培、胡适，对鲁迅进行了攻击。当时的鲁迅骂胡适尽人皆知，而胡适在回信中则尽力为鲁迅辩护。胡适说：“凡论一人，总须持平。爱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方是持平。鲁迅自有他的长处。如他早年的文学作品，如他的小说史研究，皆是上等工作”。1930 年 4 月，胡适曾写信给杨杏佛说“我受了十年的骂，从来不怨恨骂我的人，有时他们骂的不中肯，我反替他们着急。有时他们骂的太过火了，反损骂者自己的人格，我更替他们不安。”胡适的这些话一直被引为“容忍比自由更重要”的重要论据。

五四运动后，胡适与陈独秀分道扬镳。陈独秀日趋激进，信仰马克思主义，走上暴力革命之路，并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而胡则坚持科学，民主，成为资产阶级自由主义代言人，二人之思想已是水火不容。但胡适并没有忘记与陈独秀的私谊，他在 1925 年给陈的信中，将他们的关系讲的清楚分明。

¹⁴ 《自由主义人物》张忠栋著，第 23 页，台湾出版，第 191 页

¹⁵ 熊培云：《错过胡适一百年》www.zisi.net/html/xhjj/2005-04-04-

“你我曾共同发表过《争自由》宣言。争自由的惟一原理是：异乎我者未必即非，而同乎我者未必即是，今日众人之所是未必即是，而众人之所非未必真非。争自由的惟一理由，换句话说，就是期望大家能容忍异己的意见与信仰。

我知道你们主张阶级专政的人已不信仰自由这个字了。但我要你知道，这一点在我要算一个根本的信仰。我们两个老朋友，政治主张上尽管不同，事业上尽管不同，所以仍不失为老朋友，正因为你我脑子背后多少总还同有一点容忍异己的态度。”¹⁶

1932年陈独秀在隐藏中被以共党魁首名义逮捕，当时国民党政府已内定由军事法庭审判他，并处以死刑。这时的陈独秀，在别人眼里，仍是共党匪首，千夫所指，共产党则对他弃之如履，不闻不问，真是四面楚歌。这时，正是胡适，鼓动起北大教授，对陈独秀采取了营救活动，通过各种关系，四处活动，由胡的好友罗文干（时任司法部长）斡旋，在蒋介石首肯下，将陈转到刑事法院，以判刑保全生命。胡这不是第一次救陈，1919年陈被北洋政府拘捕，也是胡适出头营救，在胡适逝世后，蒋介石题的“德学俱隆”

当然，对于“总是号召积极参与公共事务，但又总是越超乎政治之外地不愿付出卷入其间的代价；总是强调人人的独立判断能力，但又总是保持一种温和节制的态度；总是和现存的政治组织离心离德，但又总是尊重和利用现行的法律秩序；总是要求社会制度的不断改革更新，但又总不赞成使用激进的手段……”这样一个历史人物的评价是难以统一划一的。对于胡适自由主义思想中的“好人政府”、“精英主义”、“反政治”以及“私性个人主义”也有不少见仁见智的批评¹⁷。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时至今日，学术界渐渐有了胡适是“中国自由主义最具诠释力的发言人”的共识。¹⁸

陈独秀当了一生的“反对派”，胡适则终生是一个“问题派”，他主张一点一滴的社会改良。1948年9月4日，胡适对自由主义的政治涵义做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叙述：“总结起来，自由主义的第一个意义是自由，第二个意义是民主，第三个意义是容忍——容忍反对党，第四个意义是和平的渐进改革。”¹⁹胡适是改良派，他寄了很大的希望在政府身上。他赞同知识分子应该积极加入政府，参与实际的政治操作。而且，他以政府的“诤友”自居。鲁迅之诟病胡适，正在于鲁迅对权力与权力者的极端

¹⁶ 转引自熊培云：《陈独秀和胡适，谁是新青年？》_www.crt.com.cn/2005new/2005/12-31

¹⁷ 吴国光《反政治的自由主义：从胡适的宪政思想反省宪政主义在中国的失败》
www.chinaaffairs.org/gb/detail.asp?id=27881

¹⁸ 欧阳哲生，《自由主义之：胡适思想的现代阐释》，上海人民出版社

¹⁹ 《胡适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810页

警惕。在《文艺与政治的歧途》的演讲中，鲁迅从文艺与政治的根本分歧，即政治想维持现状，文艺使社会分裂进步着眼，说明文学家（知识分子）与政治（权力者）的分歧，鲁迅甚至认为，到了革命成功，革命者变成权力者的时候，即便是颂扬革命的文艺，也会异化为颂扬权力者的文艺。在鲁迅这里，知识分子这一角色是与政治权力无缘的，而且必须以独立人的身份，批评权力。鲁迅对胡适的批评，便主要集中在胡适与权力过于接近，甚至站在权力的立场说话上。鲁迅写过这样几句绕口令一般的话：“革命，反革命，不革命。革命的被杀于反革命的，反革命的被杀于革命的，不革命的或当作革命的而被杀于反革命的，或当作反革命的而被杀于革命的，或并不当作什么而被杀于革命的或反革命的。革命，革革命，革革命，革革命……”他还说：“革命并非教人死，而是教人活。”可见他对“革命”是极其敏感与警惕的，特别是在中国这样一个往往在革命的名义下争夺一把旧椅子的国家。但是，鲁迅在晚年否定了自己，居然也无限向往其革命来，亦属可悲。

鲁迅与胡适，代表着知识分子两种不同的性格，及其面向国家、权力的两种不同的价值取向。鲁迅是通过展示个体价值来“建设”的，也就是说，在鲁迅的社会哲学中，所谓建设，症结不在建设改良政治，而在改良社会。因此他所面向的是社会，他以独立个体的身份向社会发言，通过揭露社会弊端以期引起疗救的注意，在面对国家机器尤其是强权驾驭下的国家机器的时候，任何批评都是苍白的，鲁迅不可能直接影响现实操作，但是他的存在，他的声音，给统治者一种来自民间良知声音的压力，那是无权者向权力者制衡的一种力量。而胡适是通过各种“建设”来体现自身价值，通过学术建设——开创哲学史、文学史的学科模式，制度建设——做政府的诤友，在高层之间斡旋活动，企图通过权力实现自己的主张，以成就他的历史价值。²⁰

十九世纪至今，中国处在一个文化转型时期，文化转型意味着文化的传承者知识人的文化性格的转换。对鲁迅、胡适的文化性格的发掘、认识，将有可能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影响乃至决定做过知识人群体的文化性格。

诚如熊培云所说：错过胡适，中国错过了一百年。毕“百年之功”于“百日维新”诚不可信，但胡老夫子所舶来的杜威主义却是一点一滴真诚的社会改造。胡适不仅是约翰克利斯朵夫，更是奥里维，他是思想之军，而不是暴力之军。他被忽略了，却从未有人能把他击垮。²¹

²⁰ 参阅陈愚：《胡适型知识分子与鲁迅型知识分子》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网站 2004-08-29

²¹ 熊培云：《错过胡适一百年》www.zisi.net/hm/xhgy/2005-04-04-

(二)、“二十一世纪是胡适的世纪”

1999年9月6日，李慎之在给许良英的信中说：“我年轻时最推重鲁迅，而有点看不上胡适，这点我现在承认是错了。”本世纪初，经过对“五四精神”“革命”一番深切反思之后的李慎之给早年曾在“白区”从事地下革命工作的舒芜写了长信，指出“就对启蒙精神的理解而言，鲁迅未必如胡适”，“能够比较全面地表达和代表‘五四精神’的毋宁是胡适”²²，力图扳正历史的误会。对专制主义传统扼杀个人有深切理解的李慎之痛惜倡导个人主义、鼓吹自由的“胡适和他带出来的一批留洋生，在号称四万万五千万的中国人中不过是零头的零头”。²³

胡适通过对国家主义的无情批判来弘扬个人的价值，他认为摧折个人的个性使不得自由发展的社会国家是罪恶的。社会国家若不允许个人有自由独立的人格，“那种社会国家决没有改良进步的希望”。他鼓励青年挑战国家主义“要特立独行，敢说老实话，敢向恶势力作战。”。“现在有人对你们说‘牺牲你们个人的自由，去求国家的自由！’我对你们说：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²⁴ 诚如陈奎德所说：胡适所接受和倡导的十九世纪欧洲的个人主义思想直接导致自由主义。在当时确是“最新鲜又最需要的一针注射”。胡适提倡自由独立的人格和为我主义的个人主义。国家主义所要造就的是完全丧失自由独立的人格的奴才。胡适号召个人要真实的为我，铸成自由独立的人格，这是从根底上破坏国家主义和其它一切集体主义和奴役主义的理论。胡适的自由主义是反国家主义、反集体主义的，个人主义是其本体论核心。这是抓住了自由主义精髓的。²⁵

鲁迅和胡适同对国家依靠专制主义手段肆意剥夺公民个人的自由有洞彻认知和猛烈抨击，但相对于只是挖中国社会黑暗面基本上只有否定性的鲁迅，胡适的自由主义思想更具建设性和启蒙意义。一个世纪过去，特别是经历了49年后极权主义对个人的野蛮洗劫之后，回头重读胡适，人们不能不为他百年前的真知灼见所折服。今天，胡适的自由主义思想正在更大范围内传播，连战、李敖在北京大学的演讲都大谈蔡元培倡

²² 李慎之：《回归“五四”学习民主——给舒芜谈鲁迅、胡适和启蒙的信》，《李慎之文选》，香港明报出版社，第61页

²³ 李慎之：《革命压倒民主——〈历史的先声〉序》www.libertas2004.net/Article/printpage.asp?ArticleID=127-17k-

²⁴ 转引自陈奎德：《胡适：中国自由主义的中枢——自由主义在近代中国》www.peacehall.com/news/gb/pubvp/2005/05/20

²⁵ 同上

导的兼容并包、思想自由，以及胡适的自由主义理想，认为“台湾民主化道路的成功，实际上就是胡适所主张的自由主义的胜利，是渐进变革的成功。”²⁶由此，我们可见李慎之过人的眼力——“二十一世纪是胡适的世纪”。

（三）、“大彻大悟”的陈独秀

在接受了主张专政排斥民主的列宁主义之后，中共创建人陈独秀早在一九二零年就在《新青年》上发表文章，力言民主的阶级性，批判现有的民主只不过是资本家阶级“拿来欺骗世人把持政权的诡计”，鼓吹社会主义民主，鼓吹无产阶级民主。如李慎之言：“此后中国所有左派的民主观都受他的影响，直到二十一世纪初的今天。”

27

早期的陈独秀，从领导创建共产党到成了极端主义小组织——中国托派的领袖，极力尝试把除社会民主主义之外的马克思主义三大流派中的两个（列宁主义和托洛斯基主义）应用到中国。而这两大流派的共同特点，是夸大现代社会政治、经济运行的基本架构的缺陷，把发展过程中的参与面不足和分配不尽合理，说成是它们应予彻底摧毁的理由，从而抹煞了社会管理的历史经验。用陈独秀的话来说是：“甚么民主政治，甚么代议政治，都是些资本家为自己阶级设立的，与劳动阶级无关，是欺骗劳动者的”，“法律是强权的护符，特殊势力是民权的仇敌，代议员是欺骗者，决不能代表公众的意见。”于是，他所向往和鼓吹的“革命”，不是维护和加强民主、法治，扩大人类自由，而是告别主流文化，依靠暴力建立崭新的“人间天堂”。²⁸

从抗日战争爆发后，陈独秀逐步告别激进主义，向现代主流文化回归。随着政治实践的进展，特别是苏联政权残暴本质的暴露，他逐步认识到，托派“这样一个关门主义的极左派小集团……当然没有发展的希望；假使能够发展，反而是中国革命运动的障碍。”“所谓‘无产阶级专裁’根本没有这个东西，即党的独裁，结果也只能是领袖独裁，任何独裁制度都和残暴、蒙蔽、欺骗、贪污、腐化的官僚政治是不能分离的。”因此，他断言：“‘无产阶级民主’不是一个空洞名词，其具体内容也和资产阶级民主同样要求一切公民都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罢工之自由。特别重要的是反对党派之自由，没有这些，议会或苏维埃同样一文不值。”²⁹二十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初，中国许多著名文化人（如郭沫若、茅盾）和大批热血青年把苏联看作

²⁶ 连战：《坚持和平 走向双赢》tw.people.com.cn/GB/26741/47107/47312/3359544.html

²⁷ 胡平：《阅尽沧桑之后——李慎之一代知识份子的反思》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网站 16-09-2004

²⁸ 转引自袁伟时：《从陈独秀到顾准、李慎之》《二十一世纪》2003年6月号

²⁹ 转引自李慎之：《革命压倒民主 - 〈历史的先声〉序》，《当代中国研究》2001年第4期

理想世界的化身和中国的明天，在这种情况下，陈独秀的这些言论可谓石破天惊的棒喝！

1940年前后，中国的知识分子在看到三十年代初期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衰退，苏俄提前完成五年经济计划和号称社会主义的纳粹德国的日益强大之后，不少人开始怀疑西方自由主义的民主政治信念，并向往共产主义理念构筑的“人间天堂”。陈独秀正是在这个时期，“根据苏俄经验二十年，深思熟虑了七八年”并通过苏俄托派友人了解和认识了斯大林政权残酷血腥的专制极权本质。

1940年陈独秀在病中给友人的信写道，“你们错误的根由，第一是不懂得资产阶级民主政治之真实价值（自列宁，托洛斯基以下均如此。）把民主政治当着这是资产阶级的统治方式，是伪善，欺骗，而不懂得民主政治的真实内容是：

法院以外机关无捕人权；无参政权不纳税；非议会通过，政府无征税权；政府之反对党有组织，言论，出版之自由；工人有罢工权；农民有耕种土地权；思想，宗教自由，等等；

这都是大众所需要，也是十三世纪以来大众以鲜血斗争七百余年来，才得到今天的所谓‘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这正是俄，意，德所要推翻的。

所谓‘无产阶级的民主政治’，和资产阶级的民主只是实施的范围广狭不同，并不是在内容上另有一套无产阶级的民主。

十月（革命）以来，拿‘无产阶级的民主’这一个空洞的抽象名词做武器，来打毁资产阶级的实际民主，才至有今天的史大林统治的苏联。意、德还是跟着学话。现在你们又拿这一个空洞的名词做武器，来为希特勒攻打资产阶级民主的英美。”³⁰

在去美国船上奋笔疾书的胡适，在为急剧变化的中国痛心疾首的同时，不觉感叹十年前陈独秀的真知灼见和大彻大悟。

胡适评论说，“独秀最大的觉悟是他承认‘民主政治的真实内容’，有一套最基本的条款——一套最基本的自由权利，——都是大众所需要，并不是资产阶级所独霸而大众所不需要的。”胡适并认为“‘特别重要的是反对党派之自由’在这十三个字的短短一句话里，独秀抓住了民主政治制度的生死关头。”由于胡适的大力推介，才有更多后来人认识“大彻大悟”回归自由主义的陈独秀。可惜的是，“‘五·四’运动总司令、第一个把‘德先生’和‘赛先生’请进中国的陈独秀，当他经过二十年的磨练阅历而重

³⁰ 陈独秀：《给连根的信》www.housebook.com.cn/2k04/7.htm - 31k

新觉悟的时候，已是‘刑余之身’，贫病衰老，僻处江津小城。他的话连死水微澜也已引不起来了”。³¹

大半个世纪过去之后，我们回头望去，看到的正是一个噤若寒蝉的无声中国，一个长时期法院之外乱捕人的中国，我们看到的是悬浮于现实生活之上完全“符号化”的“社会主义民主”，是“反对党派之自由”的遥遥无期，真不免为历史上思想先行者们的真知灼见而唏嘘不已。

（四）、殊途同归的陈独秀和李慎之

到九八年才读到陈独秀的“最后见解”的李慎之，在给舒芜的信中指出，“前两年读了陈独秀在一九四二年逝世前的言论，我更是恍然大悟，根本没有什么资产阶级民主和无产阶级民主的不同，也没有什么旧民主与新民主的不同，民主就是民主。人类经过二十世纪这一百年的历史经验，经验了从法西斯到法东斯各式各样社会改造的理论。现在也已经可以明白什么无产阶级、资产阶级，其实都只是在极其狭窄而短暂的‘时空条’中存在，只有极相对的意义，归根结底，人就是人。”³²

历史常常有惊人的相似之处。陈独秀是在“走过一段‘亲手扼杀五四的民主启蒙’的道路以后经过多年的反思才觉悟”（李慎之语）到什么是真正的自由民主。李慎之也是跌跌撞撞走了一圈弯路之后，才在生命的最后十年见到自由主义的亮光。

陈独秀“根据苏俄经验二十年，深思熟虑了七八年始做出今天的决定”³³。李慎之从四九年后风雨苍黄五十年的所见所闻，在去官后也是深思熟虑了七八年才揭竿而起，公开亮出自由主义旗帜。

陈独秀经由自己推介出版、苏俄托派朋友撰写揭露残暴斯大林政权的书籍，认清了什么是专制独裁。李慎之通过自己亲手编辑的大小参考资料认识了西方自由主义民主政治理念。虽时空不同，但九九归一，殊途同归，达于如此相似之共识。

历史也常常开捉弄人的玩笑，1942年陈独秀临终前写下的文字要到1998年才让另一个老人读后“恍然大悟”。而历史对人最残酷的捉弄莫过于让人在生命临终时才成为“明白人”，而又不让他有更多的时间来诉说。

³¹ 李慎之：《重新点燃启蒙的火炬》，《李慎之文选》，香港明报出版社

³² 李慎之：《回归五四，学习民主——给舒芜谈鲁迅、胡适和启蒙的信》
www.zijin.net/get/zt/zt5/2005_08_19

³³ 《陈独秀晚年书信三十八封》《书屋》2000年第11期

在给舒芜的信中，李慎之痛惜“我们都是近八十的人，能活在这个世界的日子已经不多了。我们不幸而历尽坎坷，吃了自己曾经十分宝爱的‘理想’的苦头，然而幸而又能活到还能反思，或许可以有做个明白人的机会。”

人等到能活得明白时却所剩时间无多，这是短暂人生之不幸，而更多的人至死仍然糊涂，这是更深一层的不幸。

陈独秀和李慎之的殊途同归让我们相信，自由主义思想价值体系是人类迄今所能认识到的“最不坏”的思想价值体系，这种思想价值体系经得起时间和实践的检验，必将在未来广为国人认可接受，成为安排新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生活指导方案的最佳选择。

三、 半个世纪的断裂：顾准与陈寅恪

(一) “我们有顾准”

顾准和李慎之可算是同龄人和同路人。1949年人民共和国成立，一个34岁，一个26岁，都是年轻的老共产党员。1956、57年间，他们同在北京并不相识，却分别提出两个事关历史发展全局的重大问题：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

顾准的基本思想是：“从全部国民经济生活上说，不让价值规律既调节流通，又调节生产，结果必将割裂生产与消费之间的联系，因而将发生有害的结果。”他认为应该“使劳动者的物质报酬与企业盈亏发生程度极为紧密的联系，使价格成为调节生产的主要工具”。一定不能忘记“价值规律在客观上是制约着经济计划的”。透过当时历史条件下必然带有的烙印和语言，实质是要求把市场作为整个国民经济运行的基本机制，推动我国经济向现代经济靠拢。³⁴正如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所说：当时在中国，“只有顾准鲜明地提出让价格的自发涨落、即真正的市场规律来调节生产。所以，顾准是中国经济学界提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实行市场经济理论的第一人。”³⁵

顾准长期思考“民主社会主义”或“社会主义民主主义”问题。他清晰地说明：“第一个问题是政治—哲学问题。”“最不重要的问题才是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个必须正视的政治问题是恐怖主义。“罗伯斯比尔式的恐怖主义是夭折的，社会主义的罗伯斯比尔主义并没有夭折。法国大革命造成了一个拿破仑，社会主义造成了斯大

³⁴ 转引自袁伟时：《从陈独秀到顾准和李慎之》《二十一世纪》2003年6月号

³⁵ 邢小群：我与顾准的交往——吴敬琏访谈录 www.d9com.com/zhuanjilishi/zhuanjigzrj

林与毛泽东。”到了70年代，他终于彻底清算了导致暴政的“直接民主”，毫不含糊地指出：“奢望甚么人民当家作主，要不是空洞的理想，就会沦入借民主之名实行独裁的人的拥护者之列。”“两党制的议会政治的真正意义，是两个都可以执政的政治集团，依靠各自的政纲，在群众中间竞争取得选票……这是唯一行得通的办法。”

“当今人们以烈士的名义，把理想主义转变为反动的专制主义的时候，我坚决走上彻底经验主义、多元主义的立场，要为反对这种专制主义而奋斗到底。”³⁶

李慎之认为，当顾准表示中国的问题只能“经验主义地解决”时，他实际上“放弃的是专制主义，追求的是自由主义”。³⁷

顾准独立特行的思想和品格和李慎之有惊人相似之处。他们一样执着对中国人苦难追根朔源，一样与自己血肉相连的中国共产党有着斩不断的感情，一样在1950年代认清斯大林残暴统治的真相，觉醒后又一样勇于直谏犯上。袁伟时指出：顾准和李慎之这对双子座出现在东方地平在线并不是偶然的。他们都在古今中西上下几千年的历史中反复比较求索，从中西历史差异中寻求民主与专制的历史渊源。一致肯定专制是东方社会发展的结果，自由、民主、法治则是西方社会各种历史因缘际会的产物。顾准认为自治城市、法治、民主、个人权利这一套“只能产生于航海、商业、殖民的民族中”，“城市及其自治，是中国历史上所绝对不会发生的，甚至是东正教文明的俄罗斯沙皇统治下所不允许存在的。”李慎之先生则痛斥倡导中国传统文化和所谓亚洲价值可以“为万世开太平”等虚骄之气，就是察觉如此“对全人类的（也就是全球的）主流文化（市场经济、民主、法制）故意唱反调，因而有阻碍中国现代化的危险”。³⁸

袁伟时这样解答为甚么恰好是顾准和李慎之先后在共产党内举起自由主义的大旗：一是两人都生性耿直。他们都是由于多次对权势说不，而铸造了自己的苦难和辉煌。更重要的是第二个因素：他们都是中国共产党内受过自由、民主洗礼的知识分子党员，并且有机会继续接触外来先进思想。他们年轻时是满腔热血、志在救国救民的理想主义者，因不满国民党、蒋介石的独裁专制和对外软弱而参加共产党。经过重重挫折后发现自己参与缔造的竟然也是一个专制体系，理想破灭后的苦痛催促他们奋起。不过，光是受苦还不足于造就一个思想家，还要有新鲜的思想养料，而在新华社国际部工作的李慎之恰恰站在眺望外部世界的窗口上。顾准1955、56年间在中央党校

³⁶ 《顾准文集》，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24页

³⁷ 参阅 陈敏之等编：《顾准日记》，李慎之序，经济日报出版社，1997年版

³⁸ 袁伟时：《从陈独秀到顾准和李慎之》《二十一世纪》2003年6月号

学习和其后的岁月里，在接受思想灌输的同时，居然从缝隙中找到了外来先进思想的养料。我们细观顾准的知识结构，一是外语，二是数学，这两个支撑缺一不可。他依靠外语，跳出了当时大陆知识分子的思想樊篱，顽强掘通与西方第一流思想家如海耶克等人交接的思想隧道；他依靠数学思维训练出的逻辑力量，而不是人文激情，一砖一瓦地建立他思想反思的地基，是那样坚实，以致我们今天都惊讶：他何以那么彻底地跳出了当时大多数人文知识分子的思维局限，将当时的红色词语从根部一直撕裂到表象？³⁹

同样通过良好的外语知识了解世界的李慎之十分推崇顾准，认为顾准无疑是他那一代共产党人中最早、也是最深刻地反思过自己走过的革命道路的人。“我对顾准估计是很高的……顾准是在毛泽东的绞肉机里几乎走完全过程的，因此他的觉悟特别可贵，对今日中国的意义也特别大。这二十多年来我也接触过党内不少‘思想解放’的老同志，但是没有一个达到顾准的标准的，从胡耀邦到孙冶方到王若水。事实上顾准已经成为民主派或者自由主义者的一面旗帜。我是相信传统的力量的。就是所谓‘莫为之前，虽美而不彰；莫为之后，虽盛而不传。’民主思想正式引入中国不足百年，根子还没有扎下就被灭绝五十年，现在也还说不上再生。所以即使以后一定会出现以民主为目标的思想家，也必须要高扬顾准承前启后，存亡续绝的作用。……不嫌狂妄地说，我的第二次觉悟（一次觉悟是马列主义觉悟）大体上与顾准是同步的（我是1960年看穿毛泽东式的社会主义而重新确立新民主思想的，也可能比顾准晚了两三年）。但是我的斗争意识远远比不上顾准，我的心情灰到‘他生未卜此生休’的地步，书倒是不断地看，像哈耶克的《到奴役之路》，熊彼特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主义》，几乎在‘内部’一出来，我就能看到。但是我一来从青年时就没有做过学问的训练，二来是根本没有觉得自己还能有著书立说的可能，当时对自己的最高要求就是做个明白鬼算了。到‘改正’以后也有好几年还是这个心情，只是做官做事大体倒还能做到按自己的原则行事。近几年才想到还有可能发挥些余热，但是又觉得晚景干不了多少事了，就一年写几篇文章，最长不过万字，自认为想通一个问题就写一个问题。”⁴⁰

李慎之指出：顾准从一经济学家转而钻研西洋历史，看似奇怪，其实理由倒也不难索解。他不但是一个经济学家，更是一个革命者。他出身贫寒，十七八岁便投身

³⁹ 同上

⁴⁰ 李慎之2002年10月30日致许良英信，转自傅国涌《李慎之晚年的悲凉——与许良英43封通信的解读》www.chinatopnews.com/MainNews

革命，既干过地下工作，也干过政权工作，甚至狂热的理想主义者，但是五十年代以后个人的遭遇，国家的命运，不可能不使他要努力弄懂“民主”是怎么一回事。当他意识到民主起源于古希腊与罗马的城邦国家以后，就下定决心要用十年的时间，先研究西文的历史，后研究中国的历史，进而在比研究的基础上对人类的未来进行探索。可惜的是癌症不容他完成这个计划。……顾准再三慨叹于中国人太聪明，太善于综合，是“天生的辩证法家”，因而不肯像希腊人那样去建立文法学、逻辑学、几何学之类的笨功夫，对事事物物分门别类，深钻细研，因而发展不出科学来。……在所知道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中，只有顾准注意到狄慈根把辩证法看作“革命的无产阶级的神学”却从来没有受到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批评。而且只有顾准从马克思所强调的“历史的和逻辑的一致”中看到了作为其底蕴的“神”、“道”、或“逻各斯”，也只有顾准看到“人是世界的主体、神性寓于人性之中，这个世界是一元地被决定的，真理是不可分的，（这些观念）于革命的理想主义确实都是不可少的。”对于古今中外的大智慧人来说，思想的探索达到这种程度，就已经可以算是参透天人之际而究竟涅槃了。但是顾准却不肯停留在这样的境地。因为如他所论证的，对所谓普遍的客观规律的绝对肯定会导致极其危险的后果。……写这些话的时候，他已是孑然一身而且病入膏肓去死不远的人了。他自己想必知道他的“奋斗到底”其实不会有什么人理睬。他明明白白说自己是在“喃喃自语”。但是他还是要写，要用他自己说的“用鲜血做墨水的笔杆子”写，一直写到死。⁴¹

“自古圣贤多寂寞”，顾准是在极为艰难困苦的情况下求索的。他被迫与爱妻离婚，妻子以自杀来告别这各荒诞和悲惨的人世，子女与自己划清界限，而自己还得签具脱离父子、父女关系的声明，1975年顾准在凄风苦雨中孤独地告别人世的，儿女都不愿或不敢见他最后一面。他“形单影只、独处斗室，以啃冷馒头、钻图书馆度日以至于死，除了挨批挨斗挨骂挨打以外，连一天都没有能直起腰来松一口气的人也可算达到苦难的极致了。他甚至被孤立到这样的地步：永远不会与他划清界限而且日夜想念他的九十老母会面，虽然与他同在北京，也因为他的身份而始终被阻至死未能一面；真是‘人生到此，天道宁论！’但是这样的苦难也并没有把他压倒，他始终为祖国的命运，人类的出路而默默地思考，偷偷地写作。在顾准去世十年之后，他的大女儿才读到父亲的遗稿，写下了这样的一段读后感：‘我逐年追踪着父亲的一生。一九五七年以后，他是一步一步从地狱中趟过来的呀！’……小时候的初中国文教科书上

⁴¹ 李慎之：《点燃自己照破黑暗的人》，《风雨苍黄五十年》，香港明报出版社，第28页

选得有泰戈尔的一首诗，还记得其中有一节说：‘如果你在黑暗中看不见脚下的路，就把你的肋骨拆下来，当作火把点燃，照着自己向前走吧！’当时这话曾使我幼稚的心灵震颤难已。六十年过去了，我看到了这样的人，他就是顾准。”⁴²

朱学勤这样评道：顾准当年，黑暗如盘，一灯如豆，是在思想的隧道中单兵掘进与当代自由主义思想可以对话的程度。相比海耶克（Friedrich·Hayek）四十年代于西方知识界普遍向左转之狂潮中闭门写作，前者研究的是如何“从奴役走向自由”，后者研究的是如何防止“从自由通向奴役”，异曲同工，相反相成，对人类如何摆脱同一类极权诱惑，做出了同等价值的思想贡献。如果考虑两人所处环境不啻天壤之别，那么前者得到的尊敬，还应该超过后者。⁴³

“相比今日尚还活着的许多人，他们中不少人确实是卓有学识却陷溺于那种新蔽障而不能自拔——为“左”为“右”争执不休，热泪长流，顾准二十年前即提出了“娜拉出走”的问题，两者差距，何止以道里计。如果连这样的人都不值得我们纪念，我就不知道学界还要纪念怎样的人才好。如果连这样的人都不是思想英雄，还有怎样的人才可算思想英雄？八十年代养成的一代新人，今天已经学会以点数海外新学理新概念为能事。但是，无论就知识规模的全数气象，还是见识兼胆识的锐利目光，乃至为走出蔽障承当了那样深重的牺牲，我们当中又有谁敢于说——‘我超越了顾准’？”⁴⁴

李慎之先生在《顾准日记》的序中写道：“千千万万的中国人有过与顾准相似的经历。然而，许多人甚至不敢如实地感受，更少有人敢于秉笔直书，给历史留下一点记录。这是中国的耻辱，更是中国知识分子的耻辱”。……在人家问起20世纪下半期中国有没有独立的、创造性的思想家的时候，我们可以没有愧色地回答，‘我们有顾准’”。

⁴⁵

顾准和李慎之原来都是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革命的信徒。五十年代中期的几件事——苏共二十大和波匈事件、中国反右派运动的遭遇、大跃进失败促使他们走上独立思考的不归之路。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的思想又是对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那

⁴² 同上

⁴³ 朱学勤：《“常识”与“傲慢”——评曹长青、仲维光对李慎之、顾准的批评》
<http://www.ncn.org/asp/zwginfo/da.asp?ID=53328&ad=6/22/2003>

⁴⁴ 朱学勤《愧对顾准》<http://www.ncn.org/asp/zwginfo/da.asp?ID=64597&ad=7/3/2005>

⁴⁵ 李慎之：《智慧与良心的实录——〈顾准日记〉序》《风雨苍黄五十年》，香港明报出版社，第288页

一蜚自由主义者的继承和深化。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这些老自由主义右派和顾准、李慎之这些共产党员右派因反右而殊途同归。

遗憾的是，1949年之后的数十年中，在十亿神州，象顾准这样的自由主义“思想者”廖若晨星。直至九十年代才有李慎之带领一班人马，重新抗起自由主义的大旗。

（据丁东先生向笔者透露，李慎之原想推费孝通出来为自由主义领军，费未应允，李只好自己义无反顾地站了出来。）

（二）、“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发现陈寅恪，是二十世纪末中国人的另一个重要发现。

九十年代前，人们还极少听到陈寅恪的名字。直到二十世纪末，中国人才真正发现了陈寅恪，发现了陈寅恪的价值。于是有了所谓“陈寅恪热”。

陈寅恪早在青年时代就以卓绝的才能成为国学大师、史学大师和才调绝伦的诗人。据李乔《发现陈寅恪》一文介绍，梁启超在推荐陈寅恪为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时这样说：“我也算是著作等身了，但比不上陈先生寥寥数百字有价值。”毛泽东访苏，斯大林曾问起陈寅恪的行踪，状甚关心。原来是他的著作《中国革命问题》中引用了陈寅恪著作中的一些材料。陶铸曾对一些认为给陈寅恪的待遇过高的人发脾气：“你们要是有陈先生那样的水平，也一样待遇！”⁴⁶但是，在几十年前狂热的文化浩劫中，他属于阶级异类，被那些当道的愚昧红小将视为象牙塔中之“迂”人，长期被置于“如死囚牢”（陈寅恪语）般的境地，最终忧郁悲愤地死去，留下的四部专著近百篇论文千余条读书札记，绝大部分堪称不朽的传世之作。

李乔《发现陈寅恪》一文中有几个排比段，勾画出学问博大精深的陈寅恪身影——

人们发现，陈寅恪并不像以往有人说得那样，只是个单纯的考据家、资料家，而是一位识见卓绝的思想家型的学问家。陈寅恪是我华夏民族“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伟大弘扬者和传播者，他的《柳如是别传》等“颂红妆”之作，寄托着他深挚的爱国之心和博大、圣洁的文化情怀。金明馆、寒柳堂里，涌动着独立自由的民族精魂。学界曾有一种微辞，叫做“思想家淡出，学问家凸现”，把陈寅恪划为单纯的学问家。其实，陈寅恪是学问家不假，但他却是思想家型的学问家。

人们发现，在现代中国儒林中，陈寅恪真正称得上是一位特立独行、风骨极硬的

⁴⁶ 李乔：《发现陈寅恪》www.booker.com.cn/gb/paper18/8/class001800001

耿介之士。日寇临门，他面斥之；蒋介石重金请他写《李世民传》（蒋自比李世民），他坚拒之；学界低眉入时，他绝不曲学阿世。他说：“我写文章，违反我的本意的我绝不写。”晚年他盲目、臆脚，却以惊天泣鬼的毅力完成了煌煌巨著。他一生重气节，不但重民族气节，也重士人气节。他有屈原的品格，是孟子说的大丈夫。

人们曾误解陈寅恪是个纯粹象牙塔中人。但后来渐渐发现，他极富政治睿智，是一位对国家民族的兴衰极其关切的学人。对于腐朽的清朝，他深厌之，曾说，“我家三代（陈宝箴、陈三立、陈寅恪本人），对清朝都没有感情，没有好印象”。他曾任蔡锷的秘书，参加过讨袁之役。中印边境争端，他为了使我国在谈判中不失领土，向我国政府提供了珍贵的历史证据。文革前夜，造神运动渐成气候，他写下了“一自黄州争说鬼，更宜赤县遍崇神”的诗句，表现出极敏锐的政治洞察力。

人们又痛心地发现，陈寅恪晚年的境遇，是我们民族悲剧的一个特别突出的片断。陈寅恪一向被称为“国宝”（他通晓 15 种文字，仅此也是一个学术奇迹），但在文革中，“国宝”成了“废物”。世纪末，人们又找回了这件“国宝”，并从中发现了更多更宝贵的价值。人们开始叹惋这件“国宝”的痛失，反思这件“国宝”是怎样被当作废物抛弃掉的。陈寅恪死前三个月，曾作一联：“涕泣对牛衣，卅载都成断肠史；废残难豹隐，九泉稍待眼枯人。”这就是“国宝”最后岁月的悲惨心境。一个旷代奇才，晚景竟至于此，这实在值得我们民族永远反思。⁴⁷

陆健东在《陈寅恪〈论再生缘〉的出版风波》一文中说：章士钊独具慧眼，在陈寅恪相赠的数种近著中，觉《论再生缘》“尤突出”，于是诗兴大发，“酬以长句”。一年后章士钊在香港印了一本《章孤桐先生南游吟草》诗集，以纪念 1956—1957 年广州、香港之行，诗集收录了这首七律。诗云：

岭南非复赵家庄，却有盲翁老作场。
百国宝书供拾掇，一腔心事付荒唐。
闲同才女量身世，懒与时贤论短长。
独是故人来问讯，儿时肮脏未能忘。⁴⁸

“闲同才女量身世，懒与时贤论短长。”突显了陈寅恪在一个荒诞的时代不同流合污、独立特行的本色。

⁴⁷ 同上

⁴⁸ 陆健东在：《陈寅恪〈论再生缘〉的出版风波》中华读书网(7/30/2002)

中国那场“共产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将中国几千年来积累下来的士绅阶层给灭了，将中国与西方通关后成长起来的现代工商阶层给灭了，同时也无情的“横扫”了中国所积累下来的儒雅文化及自由思想。陈寅恪的重要价值之被发现，乃是二十世纪中国学术文化的一大收获，也是我们民族愈加成熟和理智的一个表征。发现陈寅恪，实质上是对科学和民主的发现，是对科学和民主的肯定，是对“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伟大民族精神的发现和肯定。

李慎之在与许良英通信时推许陈寅恪对自由、思想自由、学术自由的追求，“还有陈寅恪，他是我的老师，浑身可称浸透封建士大夫的气味，因此连胡适也称之为‘文化遗民’。但是‘气味只是气味’，细究他的生平志业，几次大声疾呼‘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不自由，毋宁死耳！’连五四时代的陈独秀也没有喊出这样简洁明了，可以作为口号的话。……陈本人即一生不向北洋政府与国民党低头，尤其是不跟共产党合作。我以为在文革结束前，他是中国最干净的一个人，比俞平伯、沈从文都更干净，更不要说巴金以下的人了。”⁴⁹

李慎之不同场合多次反复强调我们需要“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是因为他痛感到在有悠久专制主义传统的中国，这种精神和思想是那么的稀缺，那么的宝贵。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是对极权控制的反叛和抗争，是对个人价值的捍卫和肯定。

四、当代中国自由主义的困境

（一）、从胡平到李慎之

“中国的近代史，其实是一部自由主义的理想屡遭挫折的历史。”⁵⁰

自由主义引入中国至今历尽百年艰辛，在军阀战争、抗日战争、国共战争的炮火硝烟中无处安身立命。加之孙中山、蒋介石等政治强人不同程度的拒斥，上世纪前半叶的自由主义只在胡适、陈独秀等少数先贤的思想中存有一丝血脉。1949年中国由国共分割党治，台湾岛上有雷震、殷海光等人的强撑苦掌，自由主义的婴啼虽孱弱仍未绝声。大陆语境下的自由主义声响则很快随储安平的肉身一块“失踪”。尽管李慎之

⁴⁹ 转引自傅国涌：《李慎之晚年的悲凉——与许良英 43 封通信的解读》成
www.blogchina.com/new/display/69432.html

⁵⁰ 李慎之：《智慧与良心的实录——〈顾准日记〉序》《风雨苍黄五十年》，香港明报出版社，第 289 页

说过顾准的“所谓现实主义，其实就是自由主义”，⁵¹但这明显带有拔高的意味。实际上，1949 至此 1976 年的大陆如果说有自由主义尚存的话，也只在少得可怜的陈寅恪、顾准等未与新政权合作的异类身上可看到奄奄一息。

直至 1976 年大陆的宫廷政变给思想界带来了新的躁动，中国自由主义才由此再次获得一线生机。

在自由主义得以在一定程度和范围内的公开言说和讨论的今天，如果我们不把吃饱肚子的感觉归于后面的馒头，我们便应该记住在前头为这一言论平台做出铺垫的先行者，实事求是给予他们应有的评价。胡平，便是早期这一平台构筑者中的佼佼者。

1976 年中国进入“新时期”的思想“解放”头几年，知识学人擦着眼泪欢呼获得新生，舔着伤口庆幸赶上新时期的好时光，之后便忙起了“拨乱反正”。至于什么是“乱”的根源？何谓未来中国的“正”途？认真思考者尚为少数，沉思自由主义作为未来中国出路可能性的人更是凤毛麟角。

1984 年，在胡耀邦儿子胡德平的支持下，《青年论坛》在武汉问世。创刊号上胡德平《为自由鸣炮》一文在自由主义之石上擦出了一朵火花，而划亮当代中国自由主义的则是胡平发表于该刊 86 年 7 月号的《论言论自由》。

个人权利是自由主义的基石，言论自由是个人最基本的权利。在全面系统地阐述和论证自由主义的条件和可能性均不存在的时期，胡平选择言论自由作为思考的理论基点，既切近中国的现实，又点中了自由主义的关键。“极权主义的致命就在言论自由这个问题上。一方面它借助于全面地控制思想而变得无比强大，另一方面，它又由于不能公开否定言论自由原则而暴露出自己极为虚弱的一面。一旦失去了对人们思想言论的严密控制，极权主义就丧失了自己的全部力量。”“假如言论自由不存在，一切荒唐事，一切坏事都是可能的。”⁵²

胡平的论文，两章约十万字。一章详尽论述了自由的含义与价值，二章论述了言论自由的力量与实现过程。

前者以假设问题逐一反驳对言论自由的误解和疑虑，比较实行与不实行言论自由的利弊；后者从各国实现言论自由的经验，中国专制主义的特点，论述以法规宪政确立和保护言论自由的重要。

⁵¹ 《李慎之、杜维明对话录》，《风雨苍黄五十年》，香港明报出版社，第 162 页

⁵² 胡平：《自由，对中国前途的展望》www.beijingspring.com/bj2/2003/huping/2003920162710。

全文气势恢宏，视野开阔，其严密的逻辑思维，充分的论证论据，在近二十年后的今天重新读来，都令人啧啧赞叹。

十月，北京举行了《论言论自由》座谈会，其时已有不同程度自由主义思想倾向的黎鸣，甘阳，孙立平，王军涛，陈子明，王润生，李盛平，闵琦等学者高度评价论文的启蒙和现实意义，将之视为“是中国新型知识分子的人格逐渐形成、新的知识分子的典范逐渐形成的一个标志。”（陈子明）⁵³

在寻思李慎之先生晚年自由主义思想的来源之时，重读胡平二十年前的《论言论自由》，笔者最大的感慨是，“在没有言论自由时”（胡平语）胡平能如此严密成功地论证言论自由实在是当代中国思想史上一大奇迹。

不要忘记，胡平的论文酝酿于1970年，五易其稿定于1980年，之前曾于1979年刊登在民办刊物《沃土》上，至1986年在所谓的“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机遇中始得已公开发表，全文是在资讯受到空前全面的控制和封锁之中成文的，是在“没有言论自由时”论证言论自由。作者过人的胆识，是显而易见、难能可贵的。

2002年“吾五五悟”的胡平不同于1923年出生的李慎之。李慎之亲历“五四”之后的思想启蒙时期，鲁迅、胡适、陈独秀等人早年发出的自由主义先声多少有入耳入脑，又曾就读于有自由主义传统的燕京大学。1949年后官至新华社国际部副主任负责大小《参考消息》的编辑，也是中国少数可以接触倾听境外另类声音的人士。

当李慎之在天安门城楼观看开国庆展时，胡平才是蹒跚学步的二岁之童。成年的胡平成为上山下乡的知青、临时工，直到1977年始有机会到北大学习，在他心头有了《论言论自由》的构思之前，可供他阅读的书籍除马恩毛选外，只有《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少之又少的域外文本，50年代直到文革时期的“灰皮书”。

就算1986年已有少量具有自由主义内涵的书籍引进，假设胡平据短短几年的外域理论修养对1980年成稿的论文作了补充修改，该文也仍然是一奇文。

不久前胡平写有《恐惧、残酷与自由主义》一文谈到了当代中国自由主义的“自发性和内生性”，可看作上述奇迹发生的一个注解。

胡平指出，当代中国自由主义的新生一大原因是源于人们对无所不在恐惧的直接经验感受，出于本能的自身安全考虑而不自觉踏入自由主义的领域。“我强调，我的自由主义信念并非直接来自抽象的自然法理论，因为中国本来就缺少自然法一类的文

⁵³ 陈子明等：《首都各界人士座谈〈论言论自由〉》，《青年论坛》，1986年11月号

化传统，而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垄断又使我们无法直接从西方那里获得这一精神资源。我们的自由观念是产生于我们自己的经验，产生于我们自己对自身经验的思考。我想，这恐怕是当代中国自由主义者的共同历程。”⁵⁴

老年李慎之不经意成为自由主义领军人物，实际上也与胡平所说的“内生性”相符。李慎之自被钦点为右派后，曾经在恐惧中惊吓得“连树叶掉下都怕砸了脑袋”。正是这种恐惧的经验驱使李慎之开始了自由主义的思想历程。当代中国极权主义作为专制主义的顶峰，其无处不在的特别恐惧不能不是直接催生当代自由主义的重要原因之一。

当代中国自由主义由此而具有天然的“原创性”，如同它天生营养不良一样。

在自由主义养份极为贫匮的中国土壤上，如胡平在论文序言中估计一样，当他“提出这个极为重要极为敏感的课题时，很多人以为那是令人厌倦的老生常谈，是无济于事的书生空论。”

胡平未能估计到的是，不少人还把这一理论课题看作洪水猛兽。

其后的“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使胡平开始了流亡之途，中国的历史和现实均未为他和他的同路人准备有更广阔的活动平台。随着早期有自由主义倾向人士的入狱和出走，刚刚划亮的中国自由主义也慢慢重归暗淡。

“八九”的悲剧再次让中国人为缺少自由的理念和空气付上血的代价。

悲剧的成因是双向和两面的：极权政府继续着反自由的惯性运作，极权治下的人民并未普遍具有自由主义基于看重个人生命权益的理性——这种理性包含了必要的宽容和暂时的妥协。

之后，经济大潮掩盖了自由主义本来就十分微弱的声响，勃发的利欲一度将政治自由主义的诉求挤到时代的边沿角落。

在境外的自由天空下，没有免费的午餐等待着陌生的外来者，即便原来你在中国声名卓著。自由的流亡者按不同的生活经历感受，不同的知识结构、精神信仰发出不同的声音。但自由者不是自由主义者，在谋道又谋粮，忧道又忧贫的双重困扰之中，自由者之中有足够的精力和时间来调整原有就残缺不全的知识结构而成为自由主义者的不多。

⁵⁴ 胡平：《恐惧、残酷与自由主义》，《北京之春》，2004年3期

在海外各种嘈杂的声音中，胡平等自由主义者很长一段时间并未占有强势的话语权，这种情势下，他们的声音对大陆的影响如果有也只限于一个小范围。

近几年互联网的快速发展改变了这种状况。随着后极权政府对舆论控制一定程度的放松，境内外中国人交流的密度增加，全球化的迅猛趋势，胡平等人的名字和他们孜孜以求的自由主义信念正在被愈来愈多的国人知晓。

作为一个坚定的民主斗士，胡平偶尔也发出一些情绪化的尖刻话语，而我更为欣赏和敬重的是作为沉着思索、冷静分析、富有创见的思想者和学者的胡平。

大陆方面，市场经济的发展需求引入了包括哈耶克等自由主义者的经济观念，利益集团的分化引发社会公正的危机也使得自由主义宪政理念开始慢慢被中国法学界重视。在分化的执政党内，一批早年受过五四自由民主氛围熏陶的老共产党人开始反思和认可自由主义的价值。

在早年《青年论坛》时期的自由主义者失踪多年后，中国大陆正静悄悄等待着另一个应运而生的自由主义领军人。

1998年，在纪念北大一百周年的日子，这个人物登场了，他便是前社科院副院长李慎之。

没有证据显示胡平的自由主义理念构成李慎之晚年自由主义信念的思想资源。但毫无疑问，胡平的自由主义思想影响了影响李慎之的一批中年学者。

他们之中直接影响李慎之的有：徐友渔由对法兰克学派的研究率先对自由主义的重新诠释，朱学勤由法国大革命的剖析对自由主义理念的大力宣扬；刘军宁由自由主义宪政设计的研究对个人主义的强调；秦晖由社会公正的关注对奴役和强夺的抨击。⁵⁵除此之外，知识界胡适、陈独秀研究的新成果；陈敏之对顾准、谢泳对储安平、陆建东对陈寅恪、冯崇义对罗素的重新发现以及崔卫平对东欧哈维尔等自由主义者的推介；王毅对皇权专制主义历史的见解；刘晓波对极权主义的痛斥；余杰对谎言的鞭挞……加之与许良英、李锐、王若水、吴祖光等挚友的思想交流都各在某些方面影响和促成了李慎之从共产主义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彻底转换。

在李慎之直接交往的三个人际圈子里，中青年是他汲取自由主义资源最多的一群。在广泛汲取和仔细消化之后，李慎之以自己丰厚的学识和过人的眼力将这些资源养分化为自己独特的思想见解，使自己得以站在更高的高度来审视和阐述专制主义和自由主义而成为当代中国自由主义的领军人。

⁵⁵参阅徐友渔：《简论李慎之自由主义思想的形成》www.chinayj.net/StubArticle。

早年的胡平因传播言论自由而浪迹天涯，李慎之因反对六四开枪而丢官。作为一介平民，胡平连回大陆为老母送终的自由都被剥夺；作为长期主管意识形态的高官，李慎之连发表自己的文章都要化名。最看重自由的人无法享有最基本的权利，他们内心的重负可想而知，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坎坷命运更是一目了然。

从胡平到李慎之，活着的，逝去的；承前的，启后的，他们的人生轨迹应可在海内外外国人的心头划出一个大大的问号——以理性和宽容为明显外部特征、已在全球范围内被实践证明是“最不坏”的自由主义理论体系何以在中国如此步履维艰？在置身于急剧转型的时期，在极权专制与自由民主的两端，我们的角色位置如何？我们将往何处去？中国将往何处去？

（二）、批判“新自由主义”剑指何方？

2004年下半年以来，中国官方理论界和学术界集结力量批判“新自由主义”，这是中国官方理论宣传部门和新左派联手对自由派知识分子的一次围剿。《光明日报》2004年11月9日整整一版的长篇报道中，“新自由主义”被一些官方学人归纳为“在经济理论方面主张自由化、私有化和市场化；在政治理论方面强调三个‘否定’，即否定公有制、否定社会主义、否定国家干预；在战略和政策方面极力鼓吹以超级大国为主导的全球经济、政治、文化一体化，即全球资本主义文化”。“新自由主义”被定性为国际垄断资产阶级以及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新自由主义的目标是建立以国际垄断资本为主导的全球新秩序和资本的世界积累制度，是为国际垄断资产阶级的扩张政策服务的”。⁵⁶

对此，中国具有自由主义理念的人们深感忧虑和不安，纷纷撰文反击。本文有必要转述笔者学位论文冯崇义就今日中国自由主义与西方新自由主义之间的一些重要论述，以批判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

冯崇义指出：他们在批判“新自由主义”时，指涉范围甚广，几乎将上世纪五十年代以来西方世界顶尖经济学家和经济理论囊括无余。但他们对世界级经济学大师们所创立的经济学理论，不是平心静气地在学理上分析其成败得失，而是武断地贴上阶级和政治标签而大加挞伐。例如，哈耶克反对任何形式的社会主义、根本不能接受国家对经济生活的任何干预、根本不能接受“社会正义”这样的概念，确实不足为训，

⁵⁶ 李瑞英：《警惕新自由主义思潮》，《光明日报》2004年11月9日。这些观点更详尽的阐述，见何秉孟主编：《新自由主义评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

只有对自由主义采取教条主义态度的人才会赞成他的这些极端观点。但是，这些极端观点应该被理解为在特定环境下矫枉过正的言论。在上个世纪三十到四十年代，几乎整个西方知识界举世滔滔对“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如醉如狂的时候，哈耶克依据自己学术上对人类知识局限性和信息不对称的真知灼见，以黄钟大吕的声音指出依赖国家权力强制推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是一条“通向奴役之路”，无疑是大智大勇的壮举。又如，“新制度学派”的产权理论，远不是简单地为“私有制”辩护。这一学派论证，明确的产权是高效率的生产和贸易的根本保证，这是精当的见解，对中国目前的改革很有指导意义。上世纪四十年代末吉拉斯在《新阶级》一书中就非常精辟地论证了“社会主义国有制”是荒谬的“官府所有制”（Office Ownership），只会带来官僚们的特权，绝不会带来效率，也绝不会带来公平。这种精辟见解已被“社会主义”各国的经验所反复证明。中国的产权制度改革已颇有成就，很多方面与“新制度学派”的产权理论不谋而合。

冯崇义阐明西方的思想史上两种大异其趣的“新自由主义”：一是从十九世纪开始吸纳社会主义的养分而主张通过社会立法等方式扩张政府职能的“新自由主义”（New Liberalism）。例如边沁所提出的“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的功利主义原则、密尔关于放弃“放任主义”（Laissez-faire）而通过立法和公共政策来规范产品分配的主张、杜威等人关于“社会民主”和经济平等的主张，以及后来主张政府积极干预的凯恩斯主义、罗尔斯关于“公平的正义”（Justice as Fairness），等等。这种自由主义实际上已经与社会民主主义形成诸多交叠共识，成为当代西方主流文明的重要一翼。⁵⁷社会民主主义是在西方自由主义传统中发展起来的社会主义，自由主义和这一思想流派形成诸多交叠共识，顺理成章。恩格斯早就说过，“就其理论形式来说，现代社会主义开始时表现出只是十八世纪法国伟大启蒙学者们所提出的诸原则之往前的、表面上更为一贯的发展”。⁵⁸自由主义本来就不是一个封闭系统，而是一个开放的、不断发展的思想体系。

另一种是当代西方政治中作为社会民主主义的对立面的“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除了个别左派人士，西方政学两界对“新自由主义”的指涉范围局限于右翼政治当局，只是偶尔会提及个别与这些右翼政治有思想联系的经济学

⁵⁷参阅冯崇义：《第三道路世纪梦：社会民主主义在中国的历史回顾》，载冯崇义：《从中国化到全球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45-70页。对于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的交叠共识，秦晖有很多精彩论述。

⁵⁸恩格斯：《反杜林论》，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3页。

家。从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到七十年代，西方世界的主流话语是社会民主主义，连美国这一自由资本主义的堡垒也受到具有强烈社会民主主义色彩的“罗斯福新政”及其余波的强大冲击。西方世界在这段时间内已被不同程度地改造为社会民主主义社会。由大多数穷人和少数富人组成的金字塔型社会结构被打破了，代之而起的是以职业中产阶级为主体的橄榄形新社会结构，产业工人成为人口的少数。“福利国家”等社会民主主义的新成果有效地消灭了赤贫，而在相当程度上实现了共同富裕。然而，社会民主主义的辉煌成就也给自身造成了一系列棘手的难题，而且在日益加速的经济全球化的冲击下捉襟见肘、焦头烂额。随着日益加速的全球化进程而愈演愈烈的资本外流和产业空壳化，使本来就已严重的就业压力雪上加霜；靠增加公共开支、增加货币发行量、扩大内需等措施来刺激经济和保证充分就业的政策已导致高通胀和高失业率交相为患的“滞胀”而难以为继；“福利国家”由于财政压力、广泛的滥用和人口老化等因素的侵蚀而春光难再；产业工人、特别是蓝领工人所占人口比例的急剧下降使传统社会民主主义的社会基础（选民人数）日渐消失。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以来兴起的“新自由主义”，可以称为“市场主义”，其核心内容是将市场提高到至高无上的地位，强调自由交易、个体合同等“市场机制”的决定性作用，甚至于主张将“市场机制”应用到社会的所有领域。在实践中它不断将本就为数不多的国有企业私有化，削减公费医疗、教育经费等公共开支和失业津贴等社会福利开支，维持低通胀率的紧缩财政，降低税率，削弱工会组织的势力以增强企业人事制度的“灵活性”，将市场机制引进公共服务领域和社会保障体系，等等。这些措施由于短期内带来资源配置方面的“效率”、以及其政治对手社会民主党人往往对经济财政问题显得束手无策而获得颇为广泛的社会支持。但是，“新自由主义”对社会民主主义的反攻倒算也带来了一些严重后果，例如使贫困人口的生活进一步恶化、因激烈的竞争而毒化人际关系、因工会集体谈判能力的下降而在整体上削弱公民社会的力量、严重冲击公费教育及一些其它公共设施等。因而，新自由主义便理所当然地受到西方世界的左派、特别是社会民主主义者的抵制和批判。

一番论证之后，冯崇义认为：在今日中国大批特批“新自由主义”，意义何在？说轻点是不得要领，往重处说是别有用心。根本原因就在于，西方世界早就是高度成熟的市场经济，任由“新自由主义”继续发展，会危及“福利国家”这一人类历史的伟大成就，因而应该有批判的声音；中国则处于从指令经济、“权力经济”或“官场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自由主义的基本平台尚未建立，“新自由主义”的

“祸害”也还无从谈起。目前中国经济生活中所面临的种种严重问题，诸如结构性的贪污腐败和以权谋私、城乡失业人口已成汪洋大海、贫富悬殊的鸿沟日益扩大、弱势群体问题日趋严重、农村经济严重衰败、资源配置效率低下而不合情理、众多国有企业严重亏损而靠举债度日、国有资产以各种形式大规模流失、国有银行死帐呆帐高居不下随时都有可能引发金融危机等等，与“新自由主义”或正常的市场经济几乎没有任何关系，而是“权力经济”或“官场经济”带来的祸害，唯有完善市场机制才可医治。结构性的贪污腐败，根本原因就在于“权力经济”或“官场经济”在制度上为以权谋私创造机会；城乡失业人口的汪洋大海成因复杂，但户口制度等不合理的制度安排和“官场经济”不合理的资源配置应负主要责任；贫富悬殊鸿沟日益扩大和弱势群体问题日趋严重，主要不是源于市场竞争，而是源于弱势群体在现有权力格局中的完全无权状态；国有企业的普遍低效率、国有资产的大规模流失和国有银行死帐呆帐，更是直接导源于行政权力对市场秩序的干扰和破坏。此外，西方左派指责“新自由主义”的“华盛顿共识”在开放自由贸易、金融市场的旗号下加速经济全球化进程，主要目的是要阻止资金外流、保护本国劳工阶层的就业机会。中国是经济全球化的受益者，近年来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就在于中国已成为接受外来直接投资的头号大国、已成为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产品的主要出口国，国内那些官方学人猛烈攻击“华盛顿共识”，又意欲何为？中国坚持对外开放，不正是中国经济能够高速发展、比尽管实行民主制度但相对封闭的印度那类国家还要快的重要因素吗？

很显然，在今日中国批判“新自由主义”其深意就是打压主张在中国建立市场经济的中国自由主义人士，并延缓中国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使部分官场中人及接近权力资源的人士得以继续利用制度上的漏洞谋利。当然，“抢来本钱做生意”是犯罪行为而绝不是“市场化”或市场经济。在中国自由主义者看来，完善的市场经济与自由主义民主宪政密不可分。因为，只有这种政治制度安排能够维护自由交易、公平竞争等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能够提供市场经济正常运行的法律框架、能够保证所有合法的经济主体享有平等的国民待遇以进行公平竞争。按照这样的理解，象俄罗斯那样全面推行私有化的国家也不能算是完全建立了市场经济，因为俄罗斯与自由主义民主宪政还颇有距离、市场经济正常运行的法律框架还远未建立起来。而且，当代中国自由主义者比中国任何思想派别都更重视平等和正义，而他们与其他派别不同之处在

于，他们将自由主义民主宪政和市场经济的建立视为通向平等和正义的必由之路，这种思路在自由主义者秦晖、徐友渔、朱学勤、任剑涛等人近年的著述中论之甚详。⁵⁹

徐友渔在《为什么是自由主义，什么样的自由主义？——与石勇先生对话》一文中，也以简练的文字精辟地总结和表达了中国自由主义者对当前中国改革的立场：“一、坚决主张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改革，以形成最终能防止权力参与掠夺的机制；二、批判现行改革中严重的不公正，要求规范市场经济体制，排除权力的干预；三、认为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和当务之急是立即把政治体制改革提到议事日程上来”。⁶⁰

徐友渔、冯崇义等学者的论述，厘清了罩在“新自由主义”之上的迷雾，有力地反驳了批判“新自由主义”者对自由主义的无端指责。⁶¹

⁵⁹ 他们这方面的文章，参阅李世涛编：《自由主义之争与中国思想界的分化》，时代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公羊编：《思潮：中国“新左派”及其影响》，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

⁶⁰ 徐友渔：《为什么是自由主义，什么样的自由主义？——与石勇先生对话》，<http://www.ncn.org/asp/zwginfo/10/5/2004>

⁶¹ 有关对批判“新自由主义”的反驳，参阅冯崇义《今日中国的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和自由主义学派》一文，www.zhenhuanet.com/wangzhan/lever%203/level3

第二章 后极权中国社会与李慎之现象

一 极权与后极权

(一)、政权类型特征比较

中文“极权主义”(Totalitarianism)一词至今在中国大陆仍是忌讳的字眼,对于“后极权主义”(Post-Totalitarianism)的研究辨识也一直无从展开。西方学者上世纪四十年代起对极权主义对后极权主义的学术研究成果,至今绝少通过译介进入中国大陆,个中原因不是难理解之事。

以研究政权类型闻名于世的美国学者林兹(Juan J. Linz),在与人合著于1996年出版《民主社会转型与巩固的困境》一书⁶²中用表列出了民主、专制、极权、后极权和苏丹式政权的不同特征,现将表中极权与后极权社会特征对比部分罗列如下:⁶³

⁶² *Problems of Democratic Transition and Consolidation*,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Baltimore and London, 未有中译本

⁶³ *Problems of Democratic Transition and Consolidation*, Juan J. Linz and Alfred Stepan,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Baltimore and London, 1996

| | Totalitarianism 极权主义 | Post-totalitarianism 后极权主义 |
|------------------|---|--|
| Pluralism 多元化 | <p>No significant economic, social, or political pluralism. Official party has <i>de jure</i> and <i>de facto</i> monopoly of power. Party has eliminated almost all pretotalitarian pluralism. No space for second economy or parallel society.</p> <p>基本上不存在经济、社会、或政治领域的多元主义。执政党在法律上和实际上都全部垄断了公共权力。这个党消灭了极权主义统治之前所存在的几乎所有多元主义。不存在可供极权控制之外的第二经济和平行社会生存的空间。</p> | <p>Limited, but not responsible social, economic, and institutional pluralism.</p> <p>Almost no political pluralism because party still formally has monopoly of power. May have “second economy.” but state still the overwhelming presence. Most manifestations of pluralism in “flattened polity” grew out of tolerated state structures or dissident groups consciously formed in opposition to totalitarian regime. In mature post-totalitarianism opposition often creates “second culture” or “parallel society”.</p> <p>在经济、社会和制度方面存在有限的、不稳定的多元主义。但由于一党专政依旧，政治多元化几无可能，“第二经济”可能出现，但国有经济仍占压倒优势。具有多元主义特征的“并列政治”可能随着国家结构的松动或反对极权统治的持不同政见团体的形成而出现。在后极权成熟期，反对派常常创造与极权对峙的“第二文化”和“并列社会”。</p> |
| Ideology 意识形态 | <p>Elaborate and guiding ideology that articulates a reachable utopia. Leaders, individuals, and groups derive most of their sense of mission, legitimating, and often specific policies from their commitment to some holistic conception of humanity and society.</p> <p>存在一种严密的、作为社会指针的意识形态，宣扬可以实现的乌托邦。领袖、个人和社群从一种关于人类和社会的整体观念中得到使命感、合法性和政策依据。</p> | <p>Guiding ideology still officially exists and is part of the social reality. But weakened commitment to or faith in utopia. Shift of emphasis from ideology to programmatic consensus that presumably is based on rational decision-making and limited debate without too much reference to ideology.</p> <p>官方仍然维持作为社会指针的意识形态，而且意识形态仍部分地在现实中发挥作用，但是，人们对乌托邦的信念已经减弱。对...意识形态的执着为实用主义的共识所代替。这种共识大体上是经经理性的考虑和不太参照意识形态的有限争论来形成的。</p> |

二战期间及二战后的冷战时期。西方自由主义者最大的收获和成绩之一便是对极权主义的认识和抨击。他们将法西斯纳粹主义和斯大林主义并称极权主义——一种与传统压迫性政府迥然不同的全新政府形式的代表。这种极权主义的最大特征是意识形态的特殊地位和国家恐怖紧密结合。恐怖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消灭反对派，而是为了实现极权主义的意识形态，实现对内全面控制，对外征服的目的。

1951年，美国德裔政治学家韩娜·艾伦特（Hannah Arndt）发表的《论极权主义的起源》为自由主义者开拓了新的视野和理论思路。她不把恐怖视为极权主义统治最本质的特征，而是特别强调意识形态在极权主义统治中的首要地位。随后，美国另一位同是德裔的政治学者弗里德里奇（C.J.Friedrich）在与后来担任美国国家安全顾问的布热津斯基（Z.K.Brezinski）合著的《极权主义专制与独裁》中对极权主义作了如下的

界定：①无所不在的官方意识形态；②以单一的党和集团控制全国；③强烈干预经济；④垄断大众传播媒介；⑤以军警暴力恐怖手段对付异议分子和控制国民身心。⁵⁴

两位学者对极权主义的上述定义在后来成为世界范围内知识界（不独是自由主义者）的一种普遍共识，越来越广泛地被应用于对发生了变化的世界的观察和分析。

极权主义有左右之分，在右者为法西斯主义，在左者为共产主义。“极权主义”一词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出现时本是个自吹自擂的词汇，墨索里尼及其党徒用这个概念来表明他们要对社会进行完全彻底的整体改造以实现国家与社会的有机统一。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具有自由主义理念的人们开始使用“极权主义”一词来分析纳粹德国和斯大林统治下的苏联，这个词便成了贬义词。极权主义概念涉及政治学界对世界政权类型(regime types)的分类界定，使用这一概念的政治学者们将世界各国的政权分为民主主义政权、威权主义政权、极权主义政权、后极权主义政权和苏丹主义政权等五大政权类型。他们做出这种分类，所依据的是四项指标，即社会、经济、文化和政治多元化的有无及其发展程度；意识形态在政权和社会中所具有的功能；政权领导层的产生方式及挑选范围；社会动员在政权运作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多元化”这项关键的指标为例，民主主义政权表现为社会、经济、文化和政治多元化的全面发展；威权主义政权是社会、经济、文化方面比较发达的多元化和政治方面有限的多元化；极权主义政权是党国一体，多元化被消灭殆尽；后极权主义政权是在一定程度上开放社会、经济和文化方面的多元化但阻止政治方面的多元化；苏丹主义政权中社会、经济、文化和政治多元化都可能存在，但因为缺乏法律保障变化无常、飘忽不定，地位和行为模式近似古代帝王（苏丹）的最高领导人可随意干涉一切。⁶⁴

饶有意味的是，法西斯主义国家和共产主义国家曾经是不共戴天的仇敌，法西斯政权立国所依据的种族主义和军国主义与共产主义政权立国所依据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特别是阶级斗争学说），也有天壤之别。但是，这两种政权在反自由、以一个群众性政党对全社会实行全面专政等方面则惊人地一致。国人将 Totalitarianism 译为极权主义，实为传神之笔。“极权”一词的传神之处在于，它准确无误地揭示了这种政权将国家对权力的垄断、国家对社会的控制、以及国家对个人自由的剥夺推到极致。正如林兹和史蒂芬所说，极权主义政权同人类历史上其它形式的专制主义政权最本质的区别恐怕还在于，它有效地消灭了政治反对派并严密控制了个人和民间社会生

⁶⁴参阅 Juan J. Linz and Alfred Stepan, *Problems of Democratic Transition and Consolidation: Southern Europe, South America, and Post-Communist Europe*, Baltimore and London: Th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6, p. 40-52. (Antithesis)

存发展的空间。极权主义的反题是多元主义。相比之下，现代威权主义 (Authoritarian) 政权在社会、经济、文化和政治各方面都保留有多元化的空间。

在中国首先起步奔向极权主义的是国民党。孙中山在民国初年作为一位被挫败的革命家，在很大程度上放弃他原来“以美为师”的理想目标，开启了“以俄为师”的迷途。蒋介石国民党在 1927 年统一中国后确实执行了孙中山“以党治国”的遗愿，尽管他们已不再“以俄为师”，而是师从德、意、日法西斯。不过，蒋介石国民党将中国法西斯化的目标远远没有完成，蒋介石国民党政权至多只是具有极权主义（法西斯主义）倾向的威权主义政权。而且，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法西斯主义在全球范围内全面失败，蒋介石国民党又被迫同民主宪政调情。⁶⁵倒是早期中国共产党在苏联的帮助下得到左翼极权主义之真传。中国共产党人和大批左翼青年当年厌弃自由主义，拥抱具有更大动员能力、具有整齐划一的美感、许诺地上天国的左翼极权主义目标模式，兴奋不已，却未料正是这一转向将中国导入迷途，使中国向着邪路狂奔，也使无数国人生灵涂炭。

（二）、1949 年后 30 年中国社会的极权主义性质

我们暂且延用以 1949 年划线区分现当代中国，“现代中国”向“当代中国”的“发展”从政权形态的角度说是具有一定程度的多元化的威权主义政权被更为专制的极权主义政权所取代。参照上述极权主义定义即不难看出八十年代以前中国社会的极权主义性质。即便是五十年代中国与前苏联发生了一系列冲突，八十年代前当代中国的政体基本上还是斯大林主义政府模式的“克隆”。在这种政体模式中，“权力中心”也是“真理中心”，谎言便是“真相”，当权者“既是社会资源的实际管理者，也是政治控制的实施者，还是意识形态的权威诠释者”。³

一个非自由主义的国家，就是一只巨大的怪兽。⁶⁶ 走过这段历程的李慎之一辈人，回头望去，看到的正是浸入骨髓的极权专制主义意识形态，一党之外鸦雀无声的“民主党派”，国家对经济的长期“计划指导”，统一论调的大众传媒和在石缝里枯萎的顾准、陈寅恪等所坚持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在极权主义造成的精神废墟上，在无所不在的“恐怖”中，李慎之曾经“连树叶掉下来都怕砸了脑袋”。⁶⁷

⁶⁵ 参阅冯崇义：《社会民主主义与中国四十年代的宪政运动》，冯崇义、朱学勤编：《宪政与中国》，香港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年版，第 82-104 页。

⁶⁶ 霍布斯《利维坦》www.jc.gov.cn/personal/ysxs/zzy

⁶⁷ 李慎之：《风雨苍黄五十年—李慎之文选》，香港：明报出版社，2003 年版，第 65 页

与一般人不同的是，李慎之曾置身于这个政权的上层，深谙其运作内幕，又因编大小参考的职业原因，不间断的接触最新的西方文化，了解其发展动向，加之自身渊博的中外古今知识，从而对“法西斯”（李慎之语）中国极权主义的面目和根源有更入里的认识，对自由主义的价值有更深层的感悟。

李慎之认为二千二百年中国专制主义的峰巅是四九年政权换界后的五十年，正是因为这一政权将专制主义发展到极致变成极权主义，“世界上最最最革命的理论最最最专制的传统相结合，使中国形成了最最最黑暗的毛泽东思想三十年的统治。中国传统的专制变成了极权主义。”⁶⁸极权主义对人身心的控制比专制主义更为全面更为酷烈。这一政权治下的文革十年浩劫与法西斯集中营、波尔布特大屠杀并列为二十世纪极权主义的三大“杰作”。

胡平诊断中国“犬儒病”时指出：中国历史，大灾大难总是周期性地发生，但总体而言，中国民族的精神和道德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糟糕，过去怎么乱也还有孔孟的延续，就是水浒梁山也还有“忠义”。但现在中国，种种文明正值都被颠覆了，唯坏是好。这是一种什么状态？是怎么形成的？⁶⁹

中国古代的专制主义统治，虽曾号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但王室的控制能力和“行政吸纳能力”毕竟有限。历代王朝由官俸的“天朝命官”只到县一级，县以下就是乡村自治。自中共统治以来，“党支部建到连”、建到乡村，党的领导控制了中国的任何一个角落，控制了人的头脑、心灵。直到最近，迫于民间和国际社会的压力，才稍微放松对人对社会的控制，才允许乡民选举村干部，而这些村选干部仍受党支部的直接领导。

蒋介石国民党统治时期搞的一套，可称为威权主义。这就是为什么国民党统治大陆时期有那么多分享政权的“军阀”，那么多独立的大学和校长，这也是为什么李敖在台湾岛上目空当世，唾沫横飞，墨花四溅，敢于批评蒋介石和国民党。因为他窥破蒋介石“搞民主无量，搞独裁无胆”的秘密，即使得罪了蒋，最多无非是把他关上几年，既不会终生监禁，也不会被活活整死，乃至在狱中，他还可以遥控出版他的《千秋评论》、《万岁评论》，继续他的嬉笑怒骂。用储安平的话说：国民党治下是自由多少问题，共产党统治下是自由有无的问题，覆盆之下岂有完卵？⁷⁰

⁶⁸ 许良英：《痛悼挚友、同志李慎之》www.sinoliberal.net/lishenzhi/xuliangying。

⁶⁹ 胡平《犬儒病——当代中国的精神危机》）<http://www.observechina.net/info/artshow.asp?ID=36049>

⁷⁰ 樊百华《宋楚瑜为党国背书？》）<http://www.boxun.com/hero/fanbaihua>

李慎之对二十世纪为祸世界的极权主义有极深刻的认识，对斯大林极权主义给中国的灾难性影响，李慎之更有切肤之痛。由此他一直有为中国人编撰一本苏俄、东欧二十世纪史愿望。李慎之是《第三帝国的兴亡》这本深刻影响一代中国人的历史巨著的主要策划人和主要译者之一，目的是要使中国人从极权主义浓黑的阴霾中再次惊觉。“哈维尔很少研究和分析前期极权主义社会的结构和运作情况。在那个时期，生活的逻辑是‘我思想，所以我存在；我开腔，我一定灭亡’。例子多到不胜枚举，布哈林、季诺维也夫、还有哈维尔本国的斯兰斯基都是。哈维尔应该认识到，从那个时代转变到人们多少可以争取‘说真话’，‘从小处着手’，桥下流过的水（不，是血）已经很多了。”⁷¹

十分遗憾的是，中国知识学人公开反思极权主义较迟，未能将 1949 年后屡屡发生在中国的悲剧纳入极权主义的理论框架中来达到更为深刻的认识。人们更多的是在极权意识形态给定的思想框架中思想如何重新解释和界定马克思主义，绝少意识到正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史观和认识论构成当代中国极权主义的理论基础。即便是自由主义自九十年代浮出水面后，知识界的许多精英们仍然对最大限度限制“自由”的极权主义表现出有些淡漠和疏忽。

这是一个严重的疏忽，因为这不仅仅是疏忽一个重要概念——“极权主义”，而是疏忽了对究竟是什么机制、因素、手段构成了对自由价值和生活的致命摧毁，暴力何以能规定真理，美好的理想和以同时又是绞肉机，强权如何得以控制思想等等这样一些应有的追问及其自身的反省。极权主义概念的重要在于它准确描述和概括了一种严酷的生存状态。

关于 1949 年后中国极权主义社会的成因，任剑涛在《中国现代党化国家形态的历史 - 理论分析》一文中较好的描述：在毛泽东的论述中，中国共产党具有比中国国民党更有利的将国家党化的道德资源。因为中国共产党既建立在“最正确最革命的科学思想”的基础上，又“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因此毛泽东强调中国革命与共产党宗旨的内在吻合，因此“离开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任何革命都不能成功”。所以，毛泽东信心十足地宣告“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努力，没有中国共产党人做中国人民的中流砥柱，中国的独立和解放是不可能的，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也是不可能的。”故而在 1949 年中国共产党取得全国政权之后，毛泽东在政治上实践党化国家的“党的一元化领导”也就水到渠成。至于邓小平，他一方面将中

⁷¹ 李慎之：《无权者的权力和反政治的政治》《风雨苍黄五十年》，香港明镜出版社第 150 页

国共产党定位在五四以来唯一一个联系群众的政党位置上，另一方面则将中国现代化的成就与中国共产党直接连接起来，再一方面更认定“全国人民把他们对于前途的一切希望寄托在党的领导上。”1949年之后的中国国家形态，便日益明确地走向党化国家的定格境地。

定格了的中国党化国家形态，乃是一个中国共产党完全彻底地垄断中国社会所有资源的形态。这种垄断，不惟是对于社会政治资源的垄断，也是对于社会经济资源的垄断，更是对于精神的、制度的与日常生活绝对统治的垄断。达到这种垄断，一方面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对于异己思想与异在政治力量的成功挤压。另一方面则在于中国共产党成功地控制了各种统治资源。就前一方面来讲，不论是1949年前的思想运动，还是1949年以后的思想镇压，都使得中国人可以选择的政治理念日益陷入一个逼仄状态。1949年以前的延安整风运动，使得中国共产党党内练习了党化国家的运作。1957年的反右运动，使得中国社会、尤其是潜在的政治竞争力量——知识分子习惯了对于中国共产党的惟命是从。而这种党化的政治意识形态一旦掌控了整个社会，提升为国家意识形态，它就具有了“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唯一正确性。以此为基础展开的政治控制、思想教育，便成功地将约束在党化国家的政治意识形态“跑马圈地”里。与这种思想控制相关，党化的军队、党化的警察、党化的政府，党化的经济、党化的教育、党化的文化、党化的日常生活，构成为党化国家的严密控制体系。26从存在上讲，党在国家之上、党在国家之外。但是从党的作用方式上讲，党又在国家之中。党化国家的成熟形态终于在中国共产党手里成功地建构起来。⁷²

二、 后极权中国社会的主要特征

（一）、极权社会与后极权社会的分界

严格界定极权主义社会与后极权主义社会的界限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当极权主义意识形态已不再能完全镇住民心，当党国已不能完全控制社会的一切方面，这就意味着极权主义社会已发生了变化。这种衰变后的社会无法归入其他的政权类型或社会形态，因而学者们便称之为“后极权社会”。从极权社会到后极权社会的转变，大多是自发的演变，但也可能源自党国自身的改变。一般认为，1953年斯大林死去之后，共产主义阵营中的一些国家便开始向后极权社会转变。

⁷² 参阅任剑涛《中国现代党化国家形态的历史 - 理论分析》www.zisi.net/htm/wwzh/2005-04-06-

李慎之曾认为，后极权社会应理解成“后期（或晚期）极权社会”而不是极权主义之后（post）的社会，因为“极权主义社会与后极权主义社会，在道统与法统上并无改变，在性质上也没有本质的区别”。⁷³李慎之对后极权主义本质的把握无疑是正确的，但他显然没有机会读到西方学者对后极权主义的界定，也不熟悉“post”在英文语境中既表示时间在后，也表示前后连贯的双重含意。至于中国后极权社会的起点究竟是文革结束后，或“真理标准大讨论”后，或“六四”后，自可见仁见智。更重要的是如何界定中国后极权社会的本质特征，值得深入探讨。

鉴于意识形态是极权主义的主要特征和支撑，大规模的政治迫害和清洗运动是极权主义的突出表现，我个人倾向于将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和民主墙运动作为中国进入后极权的共同标志。从那以后，极权意识形态的根基已动摇，大规模的“阶级斗争”（政治迫害运动）基本结束，国家权力从个人和经济空间逐渐收缩。

划分极权与后极权的界限，辨认极权与后极权的特征，有助于我们在与极权对抗时选择好不同的策略和方法。

后极权中国社会留有明显的极权社会印迹，同时也存留着悠久的皇权主义的历史胎记。后一点不同于上世纪末东欧的后极权社会。后极权中国社会知识学人负有多重的历史使命——对于历史沉淤的清理，对于强权的拒斥和在后极权社会新出现的权力模糊地带中对一些策略技巧的灵活运用，后者因为没有现成的经验参照而更需要智慧而不仅仅是勇气。自由主义者不受制于他人的强制，但不会凡不同自己的观点必反，更不会将他人逼向死地，自由主义者要建立的是法律之外无强制的多元化自由秩序，在确立自由秩序多年的西方国家中，至今也仍留有让共产主义者自唱自娱的空间。权力边界的模糊和含混造成后极权社会多变的不确定性和新旧钟摆对错伸缩之间的难以把握，当极权死灰复燃时需施于重拳搏击，而当有利契机出现时则应双手迎接。

李慎之在因撰写《风雨苍黄五十年》而声名鹊起时，曾有一些异见人士上门请他牵头组党并出任党魁，没有答应他们的请求，因其时当权者正展现其柔性可塑一面，声称要用新思维与时俱进。“既如此就无需重拳出击。”这是自由主义者不惧强权大勇之后的大智，更是自由主义圣徒不图一己私利虚名的大仁大善。

⁷³ 李慎之：《风雨苍黄五十年》，香港明镜出版社，第105页

总之，后极权社会的基本特征决定了自由与反自由的博弈需在多条阵线和不同层面上展开。每个人以自己合适的方式行动，同时，理解配合其他人的方式。在此共识之上，一个既广泛又强大的自由主义者联盟才能结成并将极权主义更快的送进历史。

（二）、后极权中国社会的基本特征

我以为，概括起来，中国后极权社会的主要特征是：①极权主义意识形态因其乌托邦属性的显现而失却对社会全面强控制的能力，以至于掌权者不得不将之虚置和淡化，如“不争论”敏感理论问题，不问姓资姓社等。②失去意识形态支撑合法性的极权权力的边界开始出现可以伸缩的不确定模糊地带，从而使原本极为狭窄的个人和社会团体活动空间有所拓宽。③迷信经济能提供政权的合法性的权力执掌者开始有选择的放松对经济的控制，以发展经济作为维护自身合法性的主要手段和资源（辅之以民族主义和国情论），同时以刺激消费欲望消弭对其权力合法性的怀疑和追问。④不再以大规模社会动员方式强制人的思想言论，但仍以行政、警察、技术、黑帮等手段控制大众舆论，如勒令停刊、封杀网站、殴打和逮捕异见人士等。⑤逐步完善一些法制但仍然拒绝任何政党在宪法范围内竞争活动的法治。⑥机会主义和务实的新官僚作风以寻求权力稳定的新秩序，如亲民、扶贫、允许资本家入党等。⑦基于利益算计，各利益集团的博弈加剧。

后极权社会仍然保留着极权社会的很多特征，特别是一党专政和舆论控制。中国二十余年市场化改革所带来的也不过是“有官场少公开政治，有市场少公平竞争，有社会少伦理共识，有媒体少舆论作用”（金克木语）的社会。⁷⁴后极权政府为继续维持自己的统治地位而让出的部分权力随时可以“收复失地”，私人暂得的部分权利未有明确的法律保证。极权政府虽然不再以赤裸裸的暴力恐怖手段控制思想，但在表面的“无恐怖”中，人们仍普遍感到昆德拉（Milan Kundera）所说的生命“不可承受之轻”（The unbearable lightness of being）。

后极权时代的改革只能是“政治铁腕统治与经济自由开放并行”的“半吊子”经济改革，这一点从改革走到市场经济和加入“WTO”便陷入停滞可以看出。⁷⁵这种经济改革给社会带来的变化不只是正面的，在经济活力增加，个人私有领域放宽的同时，因为权力边界的模糊，出现了“权力寻租”和“权力黑帮化”；因为法律处于虚位而使私有产权随时被侵犯；因为市场没有规范准则而使竞争没有公平起点。

⁷⁴ 转引自徐贲《后极权和东欧知识分子政治》，《二十一世纪》2000年12月号

⁷⁵ 卞悟《二十世纪末中国的经济转轨和社会转型》，《二十一世纪》，2002年8月号

已有论者指出，经济改革原本上就是迫于极权控制需要庞大的经济开支，而日益僵硬的极权计划经济再无力满足这笔开支的无奈之举。⁷⁶

这种改革已经陷入了“改革的悖论”：改革为国人带来部分好处，也因带来腐败不公而被国人抱怨——富者抱怨财富没有法律的安全保障，贫者抱怨失去原有的国家依靠，仁者抱怨物欲横流道德沦丧，智者抱怨学术艺术的庸俗化和低级趣味……

后极权时代的改革之所以陷入这样的困境，根本原因是这场改革不是要改变当代中国社会极权主义本质的改革，而仅仅是从实用主义出发来修补和加固原有的极权统治。

明确了当代中国的极权主义本质，我们便不难理解真正的改革必须是：把私人领域还给个人，把市场领域还给经济，把自治领域还给社会，把公共权力还给人民。而由于改革仅仅是后极权政府“一厢情愿”的“改革”，我们能看到的只是，部分私人空间还给个人，部分经济领域还给市场，而最为关键的后半部分改革则前路茫茫，遥遥无期。

后极权社会权力执掌者实际上处于一种失语的状态，他们无法提供一套比较完整的、经得起辩驳的和有说服力的措辞。现有那些理不直气不壮的勉强说辞都很难为广大民众认可，更谈不上让民众通过这些表述与执政党产生共识。“不争论”、“闷声发大财”与各个财团和利益集团的各行其是就成了这一时期“财神政治”的时代特征。

后极权社会理想之火熄灭，乌托邦激情不见了，一个权力和金钱相结合的社会代替了原先那个崇尚“高尚信仰”的社会，剩下的便是赤裸裸的利益算计。吴思近期的《潜规则》、《血酬定律》等论著对此有很到位的出色描述。胡平先生批评吴思的历史写作暗含 1990 年代以来的社会思潮，即只顾欲望和理性算计的犬儒思想，而忽视人的精神气魄，这多少有点难为了吴思。

后极权社会焦虑的人们个个都是蒙着黑布走钢丝、担心掉入莫名的深谷的人。失地农民焦虑于如何得到“补偿”，民工到处寻找谋生落脚点，病患者再不敢奢想在医院里有一个床位，父母为子女愁学费，大学生未雨绸缪担心毕业则失业，官员深愁“调查调查就是罪犯”（对应的是“总结总结就是模范”）……

后极权社会权力执掌者只要西方国家的“肥马经济”（trickle down economics 里根经济学的“肥马经济”意思是富人的财富将浸润穷人，合中国古语：马有夜草则肥，马肥对吃马粪的鸟儿有好处），不要西方国家的“宪政民主”，是政治财神们的如意盘算。“财神政治”不愿正视和承认，正是后者建立了公平竞争机制和真正稳定的社会秩序，甚至于只顾利益集团的算计而罔顾“浸润穷人”。

⁷⁶ 萧寒《后极权时代的改革困境》，《二十一世纪》，2002年9月号

后极权社会权力执掌者将“交易”当成“市场”，无视市场经济最基本的“平等竞争、公平交易”原则，也无愿通过民主宪政来确立和保护这种原则。

极权政治失灵后，后极权社会权力执掌者开始寻找新的合法性借口。蒋庆和康晓光应此一需要各捧出方案。但蒋的读经倡导如果不是“迂”了点，至少也是远水救不了近火。想想要等到读经儿童长大听话，至少也要等个十至二十年。相比之下，康的“仁政”、“精英散盟”的主意就“现实”得多。

实际上，康氏是后极权当代政治的“王者师”，他的“学说”在维护后极权政治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萝卜”（蔬菜）和“大棒”的搭配是康晓光们为后极权社会权力执掌者提出的管治治术。

以卢雪松被“停课”事件为例，卢雪松不与大多数大学里好好吃着甜“萝卜”（蔬菜）的教师一样教课，却偏要在课堂上放映胡杰导演制作的“不符合中央对历次政治运动的书面决议，不符合教育部对高校教师授课的要求，我们不认可”的纪录片《寻找林昭的灵魂》。那么，“思想逾界者”卢雪松就该受到“大棒”的处罚——离职、离岗、停职反省、不准外出所居住城市、劳教结束后由教师变为教辅，尽管这种处罚是“悄悄的”。

为太石村村民维权请命的郭飞雄的情况更糟，在牢里饿得体重下降几十斤。令人忧虑的是，尽管社会失序的危机正在迫近，因缺乏公平竞争机制导致的贫富矛盾正在激化，对经济能提供政权合法性执迷不悟的后极权社会权力执掌者仍无意（至少未有迹象）要通过在政治体制上这一节骨眼上的改革来避免危机的爆发。

（三）后极权社会的深层危机

后极权社会权力执掌者相比毛时代少了些“邪气”，但仍然延续着毛的“霸气”。这种“霸气”正在引发和积聚“怨气”、“淚气”。后极权社会权力执掌者们正忙于四处“扑火”，但后极权社会权力执掌者不是“千手佛”，无法压下此起彼伏的社会动荡。

孙立平《利益博弈的一年》一文指出：观察 2005 年几次涉及重大利益关系，并对社会生活有重大影响的利益博弈事件，我们可以发现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现象：一系列以前在我们社会生活中不曾存在过的利益博弈手段在开始使用。比如，在房地产博弈中，要挟、挟持、绑架，这样几个过去很少用到现实经济政治生活中的名词，不止一次被提及。这些名词不仅表明利益博弈新手段的出现，同时也表明这种利益博弈的程度之激烈……⁷⁷

今日之中国，不愿好好吃着甜“萝卜”的维权者以及演化到流血的维权事件日多，既然是“哄”和“利诱”也不灵光了，政治财神们也就开始花钱买打手看他们的

⁷⁷孙立平博客：<http://blog.sociology.org.cn/thslping/>

权力（特权）这个“场”。“打手”打出人命来，他们也用钱来买命消灾。这种案例近期大增，也是早前余世存提出“次法西斯社会”和近期徐贲提出“新极权主义”概念的原因。

余世存说：后极权社会更多是哄骗式、诱导式的统治，次法西斯社会是抢劫式、打压式的统治。从这个角度看，我同意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的说法儿，六四后第一次大规模地公开枪杀平民的广东汕尾事件，跟六四是有差别的。六四事件是领导人的决定，是选择的；汕尾事件是这个次法西斯社会必然的、经常的表现形式。⁷⁸

以“汕尾事件”为例，广东当局给汕尾东洲坑村血案中的每位遇难者家属20万元人民币，几乎是用强迫的办法让难属签字画押。在官方公布的三位死者中，两户难属接受了这笔钱，一户难属拒绝接受。遇难者妻子袁秀丽对记者说：这笔钱，官方不叫“补偿”或“赔偿”，而叫“救济”。

显然，20万“救济”是为了购买难属们的沉默。

刘晓波对此的评论是：这笔“封口费”，是更冷酷更卑鄙的谋杀。这对于冤死的年轻生命来说，是多么可怜的补偿！政府有责，官权开枪杀人的罪错，绝非单凭金钱就能摆平，只要政府依然不肯公开承认罪错，即便再多的金钱也摆不平民怨民怒。这20万元的“封口费”，是强制性买断冤魂和难属的沉默，也想买来官方处置血案的正当性和合法性。

如果说，文革结束后，以邓小平为首的政权为“走资派”们、“地富反坏右”们的平反，是一次杀人者对被杀者、加害者对被害者的单方面政治定价，是用平反冤假错案来购买奴隶对主人的感恩戴德，也为摇摇欲坠的政权购买道义合法性，那么，中共现政权给予大小人祸中的冤魂们以可怜的经济补偿，就是杀人者对被杀者、加害者对被害者的单方面经济定价，是用金钱来购买冤魂和难属的沉默，进而向全社会购买政权的稳定，也就是“花钱买稳定”。⁷⁹

金观涛、刘青峰曾对二千多年中国社会周期性动荡——回归原态——动荡的状况进行过的历史沉思和深刻反省。尽管中国的改革走过了二十几个年头，两位学者概括的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并未打破，今日经济表面繁荣的背后仍然潜伏著可能动荡的深层危机。我的危机感基于三个方面的思考：

1、执政党的极权性质未变

中国社会从极权社会转入后极权社会，执政党为了渡过合法性危机，避免政权崩溃却执政地位，不得不在经济领域有限度向民众开放，不得不收敛自己以往无边界扩张的权力行为，把部分私人空间和自由还给民众。但由于执政党不愿启动危及自身

⁷⁸ 余世存《你何时才愿政治？》[www.ncn.org/asp/zwgInfo/ da.asp](http://www.ncn.org/asp/zwgInfo/da.asp)

⁷⁹ 刘晓波：《中共给镇压杀人标价》www.peacehall.com/news/gb/pubvp/2005/12/2005

利益的政治体制改革，不但民众的私人财产权、选举权、知情权、结社权、言论自由权至今无法以法律宪政予以确立保护，而且民众已经拥有的少量的自由空间随时也可能被重新剥夺。近日，中国政府不断镇压维权运动，加紧控制网络异见言论，正说明中国社会仍远离法治，仍以执政党意志主宰社会的后极权本质特征。

中国执政党和政府的这种后极权性质，还直接导致经济私有化进程中权力与资本的相互勾结，进而对公有资产的大量侵吞。政府官员的权力行为在不受反对派和传媒监督的“黑厢”操作，同时，政府用强权继续剥夺公民民主监督的参与权与知情权，控制垄断和封锁公共资讯，这就等于筑一条新路时在下面埋下了火药。执政党和政府是在竭力寻求自身持续执掌权力合法性的新路径，但只要执政党和政府的极权性质不改，权力资本就将不断毫无顾忌地蚕食公有资产和纳税人的血汗，蓄势待爆的火药就将越积越多。一旦经济停滞不前或危机来临，一旦真相无法掩盖遮蔽，愤怒的火药就将引爆。

2、执政党和政府与人民的“内在紧张”无法消解

在良好的宪政国家，政府和公民之间有一个由独立司法、自由传媒、民间社团、公共服务机构和教会等组成的公民社会缓冲区（Civil Society），有效地缓和协调著政府和人民之间出现的紧张关系。这个缓冲区的最大作用便是防止政府利用掌握的国家权力机器非法损害公民利益，同时也疏导民间对政府的不满情绪。当公民利益被国家机器非法侵害时，可以通过代表自身利益的团体，通过传媒回应政府，向政府施加压力，直至通过法院状告政府讨回公道。但中国的法院和报社、电台、互联网都在执政党和政府的严密控制之中，传媒遵照中宣部规定定调，法院大案要案办理以党的意志为准绳，以党的批示为依据。民众事实上无结社的自由，连在网上发表自己观点都会引祸上身。面对新权贵任意侵吞民脂而愤怒情绪无疏通渠道，积久便会以“恶”的形式喷发。这便是中国进入建国后第三次犯罪高峰期、黑手党蓬勃发展甚至于“肉身炸弹”频现的根本原因。而在目前看来，中国执政党和政府仍未能明白到靠强控制无法真正消解人民和政府的紧张关系。

3、后极权中国社会不具有应对经济危机的良好机制

几乎所有发达国家的早期都经受了多次的经济危机，中国也将不能幸免。问题是，市场机制比较健全政治体制比较完善的国家，在选择和出台新的国家政策，甚至于部分或整个更换政府内阁来应对危机时，社会也能保持大体的稳定。中国则不然。首先，极权统治排除多党轮流执政，也就排除了不同国策政纲多种选择的可能性；其

次，强控制下压抑著其他诸多方面的危机，都将在经济危机的触发下一并爆发，造成难以收拾的局面。所以，极权统治者应对危机和愤怒民众的办法通常只有一条，即出动坦克，铤而走险，从而将国家民族拖向灾难。

但无论如何，后极权时代极权政府对社会全面控制在一定程度上已无可奈何地放松，如万润南所说：“今天的共产党，还是原来的共产党吗？一方面，它还是原来的共产党，甚至比原来更共产党；另一方面，它已经彻底蜕变，完全不是原来的那个共产党了。套一句李敖堪称经典的流氓话来比喻今天的共产党，除了该硬的部分硬了，其余的部分都软了。”⁸⁰

更为重要的是，因为这“软”，被禁闭了半个世纪的自由主义终于“挤出门缝”浮上水面。

三、 李慎之的人生道路

（一）、“两头真”与“三朝元老”

李慎之 1923 年 8 月 15 日生于江苏无锡。1941 年至 1945 年，先后在北京燕京大学经济系、上海圣约翰大学经济系和成都燕京大学学习，1944 年 11 月在四川成都参加党的秘密外围组织“民主青年救亡协会”。1945 年至 1946 年，先后在四川自流井蜀光中学任教员、成都天风杂志社任编辑。1946 年至 1949 年，在重庆新华日报国际版任资料员，参加上海新华日报馆的筹备工作，后到延安新华通讯社国际部任编辑，1948 年 11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9 年起，在新华社国际部任编辑组组长、副主任。1952 年 9 月至 1953 年作为中国政府代表团成员赴东欧六国考察文化教育。1953 年曾参加朝鲜板门店军事谈判工作。1954 年至 1957 年上半年，随同周恩来总理参加过多次外交活动，包括 1954 年的日内瓦会议、1955 年的万隆亚非会议等重大国际会议和国事访问。在新华社期间，写过大量的国际新闻与评论，参与许多外交文件和政治文件的起草工作，撰写并发表过《亚非会议日记》、《日内瓦会议日记》、《日内瓦会议最后的报导》等著作。

1978 年底至 1980 年初，李慎之参加了中央成立的国际问题写作小组工作。其间，陪同邓小平出访美国，担任代表团顾问。1980 年调中国社科院工作，负责美国研究所的筹建工作。1982 年任美国研究所所长，1985 年后，他担任副院长兼美国研究

⁸⁰ 万润南：为什么共产党“气数未尽”及与共产党“分道扬镳”
<http://www.peacehall.com/news/gb/pubvp/2006/04/200604050504.shtml>

所所长，负责社科院外事和国际片的领导工作。1988年任院党组成员。1990年被免去副院长和党组成员职务。1995年离职休养。李慎之4月22日在北京的“非典”时期因肺炎去世。⁸¹

戴晴接受美国之音采访(2003年4月23日)时的简短发言准确勾画出李慎之的人生轨迹：李慎之的一生代表了一代有良知和自尊的中国革命知识分子抛弃激情与轻信，反省和批判中国政治现实的过程。

在为新政权而奋斗的年代，他是豁出了性命去宣传、奋斗的；在毛泽东时代，他是本著执政党党员的党性克尽职守（那个年头唯一可看的大小《参考》都是他的成果）；到了邓小平时代，他褪去了青年人的激情与轻信，帶著成熟的智睿和深深的忧虑，依旧以专家身份，在决策的最高层帮闲。

他依旧没有动笔，无论是1970年代末的思想解放运动中，还是“清污”、“反自由化”等闹剧之后。直到后来读了他对王若水的悼念文字，我们才知道，这位博闻强记、思路清晰、下笔乾净利落、还曾是几代领袖爱将的才子，那一阵其实已经快要摆脱掉他“先进工作者”，一贯“模范”，“很有党性”的身段，把该讲的讲出来……但还是顺从积习，选择了沉默。正如他自己所说，那时“心中不是没有倾向，不是没有分辨是非的能力，但是被连续几十年的运动吓破了胆，树叶掉下来都怕打破了脑袋，因此还是噤若寒蝉……”。⁸²

但人还在，心未死，观察与思维无法停止；终于，到了1999年，在他亲历了新领袖极度夸饰、花钱如流水、只有极权者才爱玩和玩得起的五十年庆典后，《风雨苍黄五十年》问世。以历次庆典目击者和国家磨难亲历人的身份，以“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一生的欢乐与痛苦、希望与失望”，李慎之痛斥当道“掩盖历史，伪造历史”；痛斥“中国人对自己折腾自己的错误不知后悔”，痛惜对难得的历史机遇“视若无睹，轻轻放过”；而“进一步改革的条件不但已经成熟”，而且已经“烂熟”，政治改革的步子却依旧不肯迈出。

⁸¹ 刘军宁2003年5月14日在华尔街日报发表评论文章说，中国政治改革和民主运动最勇敢的战士虽然不是被非典型肺炎夺去生命，但这并不能减轻对北京的谴责，因为他的死正是政策之过。李慎之是因为普通肺炎去世，但那是由于不负责任的政府造成的。他的病是由于家里没有暖气、多次感冒引起的。根据政府规定，北京的集中供暖系统3月15日关掉，不管天气如何。尽管3月15日之后经常出现零度以下的气温，北京人别无选择，只能被动忍耐寒冷，毫无疑问每年都有很多老人由于这一政策而死亡。关于李慎之生平请参阅那小群对李慎之的采访：《李慎之叙往》personal.nbnet.nb.ca/stao/xingxq

⁸² 李慎之：《风雨苍黄五十年—李慎之文选》，香港：明报出版社，2003年版，第65页

那一年，他 76 岁。或许痛惜为党业浪掷过多心力？或许已经感到来日无多？他开始甩去绊羈，以独立的身份，发表独立的见解，“在后极权主义社会尊严地生活，做一个真正的人”。⁸³

（二）、触拊“逆鳞”的专业户

李慎之因为生性的耿直，不断的直言犯上。单少杰称他为触拊“逆鳞”的专业户：李先生数度遭贬，大都因直接触犯龙颜而遭打压。他对中共三代领导“核心”都有触拊“逆鳞”之举：“反右”时，被打成“右派”；“文革”时，又被视作“牛鬼蛇神”；“八九风波”后，被免去党内外一切职务；“五十年大庆”后，又被列入官方传媒予以封杀的黑名单。

当第一代“核心”因“波匈事件”而对社会主义国家要不要搞民主这一问题疑神疑鬼时，李先生提出“我们应当搞大民主”、“应当成立宪法法院”等建议，让这个骨子里最不喜欢民主的人——毋宁说是二十世纪中国最敌视民主的统治者——感到不快。不久，这些建议便被此公拿到中共八届二中会上予以贬责：“就是采用西方资产阶级的国会制度，学西方的‘议会民主’、‘新闻自由’、‘言论自由’那一套。”

84

当第二代“核心”把隆隆坦克开向滚滚人潮后，李先生愤言：“决不在刺刀下做官”，向呼腥风唤血雨者表明决绝态度。

当第三代“核心”登上天安门俯临万众而最感得意时，李先生发表《风雨苍黄五十年》，竟在某些方面将此人与那个跨世纪国际小丑金某某相提并论，给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者泼了一盆冷水，泼得龙颜震怒，泼得天下士子一片喝彩声。吴稼祥先生有言：仅此一文，李慎之先生就足以不朽。⁸⁵

可能李慎之生前都没有想过，自己这大半生竟有意无意地做了中共政权下的一个触拊“逆鳞”的专业户，同时也成了透显着共产中国的血色黄昏的一道十分夺目的风景线。

（三）、剔肉还母，剔骨还父

⁸³ 戴晴在美国之音评李慎之 <http://64memo.com/b5/8116.htm>

⁸⁴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 1977 年版，第 323 页，

⁸⁵ 转引自单少杰：《纪念李慎之先生——兼谈子路人格》
www.observechina.net/info/artshow.asp?ID=23748 - 35k

如胡平所说，“在现今七十岁以上、自早年即参加共产革命的老一代知识份子中，李慎之无疑是一位极具代表性的人物。所谓代表性，意义有二：一、李慎之的个人经历在同代人中具有相当的典型性。二、李慎之对他的个人经历、从而也就是对他那一代人的共同经历具有相当深刻的反思。”

李慎之从自己的亲身经历省悟到：“那时我们这些‘进步青年’其实也分不清什么最高最低，反正最高的就是最好的。一般‘进步青年’糊涂的地方就在于，居然认为美式民主与苏式革命是可以互相包容而平行不悖的。所以党在政治协商会议上为争取实现民主宪政、组织联合政府而努力时，我们拥护；当谈判破裂、政协失败，中央一再传达说‘国民党不肯跟我们搞联合政府，我们就单独打天下，省得拖泥带水’，我们也拥护。”⁸⁶

明察了专制与极权如何给“新中国”带来的灾难之后怎么办？李慎之说：“1958年3月8日，支部通知了我，你已经不是共产党了。真好像是离开娘的孩子。我给毛主席写了匿名信：‘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署名一个党内右派分子。说明我对党的感情吧。我当了右派，降了六级。以后，大约有一两年多的时间，一想起来就会掉眼泪。自己给自己做工作，总是从内心说服自己：就假设你错了。王蒙写的《失态的季节》，说的就是那时的右派整右派，真是左得厉害。一直到“大跃进”，我觉得没有必要再在心里做假戏了。我就对自己说了八个字：削肉还母，剔骨还父。”⁸⁷

李慎之要“剔肉还母，剔骨还父”，要说出中国最深刻的疾患和刻不容缓的救治疗方。他要以曾经革命、并靠革命取得了政权的胜利者的身份坚决否定革命。他要以“说真话”来戳破谎言。他要尊严地做人，并“从小处着手”去推进中国的制度民主化和子民公民化。他要做竭力促进中国极权主义结束的思想家和实践家。

李慎之对公民社会有深情的憧憬，他生前说，如果一个人还能有下一辈子，那么他的最高愿望是当一辈子公民教员。因为我认为在我们这个国家，要养成十来亿人民的公民意识，即使现在马上着手，也至少得要五十年到一百年才能赶上先进国家。⁸⁸

可惜在专制统治的漫漫长夜，李慎之这一“卑微”的愿望都难以实现。

四、 李慎之现象

⁸⁶ 胡平《阅尽沧桑之后——李慎之一代知识份子的反思》www.bjsjs.net/news/news.php?intNewsId

⁸⁷ 邢小群《李慎之回忆往事》www.zzhf.com/detail.asp?id=1034-26k

⁸⁸ 李慎之：《无权者的权力和反政治的政治》www.chinaelections.com/readnews.asp?

（一）、“李慎之现象”的界定

在李慎之的带头和努力下，自由主义话题在后极权中国社会成为公开的公共话题。围绕着自由主义话题的言说在报刊、网络甚至在官办的电视上熙熙攘攘，由李慎之领军的自由主义者，队伍日益壮大。人们把这一现象概括为“李慎之现象”。

笔者认为，“李慎之现象”的发生有其深刻的历史和现实的动因，特别是与自由主义在中国近百年历史的延伸有一种内在的联系。观察和分析“李慎之现象”当然有多视角可以切入。但同时笔者更认为，要准确把握“李慎之现象”必须首先把握当代中国的后极权本质特征，依据上世纪四十年代以来人类对极权主义（Totalitarianism）的认识来分析考察近期中国社会的新变化，可以使我们对“李慎之现象”有一个较为清晰的认识。

笔者在先前发表的《后极权中国社会与李慎之现象》一文中将“李慎之现象”概括为：知识学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自觉进行知识结构的调整和重组，这种调整和重组具有鲜明的自由主义指向，并且不屑于隐瞒自己新的思想倾向，勇敢争取和捍卫自由言说等个人基本权利的现象。⁸⁹

（二）“李慎之现象”的意义和对未来中国的影响

在对当代中国社会的极权主义本质、后极权主义特征和自由主义价值观念一番描述之后，我们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看出“李慎之现象”的意义和对未来中国的影响。

一是以真话对抗消解极权意识形态。

极权意识形态以一套动听的话语为极权主义披上迷人的漂亮外衣。真理、规律、人民、国家、历史、社会等是典型的极权话语，这些模糊笼统无法量化的话语把一个个个体生命的价值消弭于无形。正是这些话语驱使无数被迷惑者“理直气壮”去践踏人权和人的尊严，误导他们怀着崇高的理想和善良的愿望去构筑“人间地狱”（波普）。极权话语的“假、大、空”为基本特征，而且强制极权社会中的所有人都说假话、大话、空话。久而久之，习惯成自然，说真话反而成为禁忌和怪异。

⁸⁹ 丘岳首：《后极权中国社会与李慎之现象》
<http://www.ncn.org/asp/zwginfo/da.asp?ID=55159&ad=10/30/2003>

讲真话是“李慎之现象”的突出特征，以真话对抗谎言以消解极权意识形态，以个体言说对抗总体话语以彰显自由主义个人价值，正是“李慎之现象”意义的一个重要方面。

二是为改革向政治体制深层的推进注入新的动力。

遭受 1989 年那场打击，中共党内民主派一度溃不成军。一段时间内，社会上弥漫着一种看不到推进改革的新的内在动力的悲观情绪。似乎各利益集团已经安稳于既得的利益之上，知识精英也乐于为新的权贵效命，极权统治下的经济并没有像预料那样濒临崩溃，相反它在填饱腐败贪婪的胃口之外，也勉强可以解决下岗工人和贫困农民的温饱，社会的改革与转型陷于停滞或临近终结。

作为“李慎之现象”主要内涵的自由主义思想观念的传播漫开，给了中国改革新的方向指引。自由主义者显然不停留在经济层面上改革的诉求，而是从人的全面需求上，为获得人的自由权利的根本保证上要求改革纵深伸展，进行新的政治体制安排。

由李慎之率领的“李军”从党内公开打出自由主义这面大旗、向共产党人特别是中共党内民主派和在不同程度上具有自由主义民主倾向但未必完全认同自由主义民主的“半民主派”指明了彻底转变为自由主义者的唯一正确出路。

三是为困惑的理论界引入新的进路指引。

“六、四”后中国理论界还弥漫着一种思想的混乱。在三大派系中，保守主义要求在原有体制框架下进行改良的小修小补或回归中国传统儒家方略；新左派喋喋不休于资本的罪恶和社会不公，绝少论及极权与专制对人权的践踏，此两种理论的论者虽具有人道情怀却未能切中时弊，因而在极权主义面前显得苍白无力。

自由主义者在表明自己鲜明的反极权专制立场的同时，拒绝非理性的暴力革命，也因为将人的生命和财产置于首位而极力防止社会的剧烈振荡。注重理性和建设，理性地抗争，妥协中建设，是自由主义理论不同于其它主义的显著特征。

无论中国民族主义情绪如何浓重，国情如何特别，“李慎之现象”蔚为大观这一事实已经表明自由主义理论体系必将在中国的土地上证明自己的普世价值。

四是“李慎之现象”将加速知识学人思想文化结构的重组和转换。

民族主义、社会主义、自由主义是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学人思想文化结构的主要构成，而自由主义因先天不足和后天失调而在这三块板块中面积最小。“李慎之现象”的出现将促使这种格局的改变。

知识学人思想文化结构的重组工程是一项不可能短时间“完工”的艰巨工程，只有自由主义的价值观念占据国人思想文化结构的主要位置，极权主义的阴魂才能真正消散于无形。

五是自由主义学理落实于实践。

自由主义的学理再好，若束之高阁，禁于书斋也将失去其意义。

无疑，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坎坷命运，也造成了中国知识学人对自由主义学理认识的贫困。就此一点，书斋中学者对自由主义学理深入细致的研究不但无可指摘而且应大加鼓励。但同时更应倡导的是实践自由的精神。自由主义学理本身就要求接受者一点一滴实践自由，因为这种学理无意炫耀自身的高深，相反它具有浓重的世俗平民色彩。自由主义既是一种学理，也是一种生活方式，归根结底，这种学理是要让每个个人在生活行为上从极权主义的束缚中“自由”出来。

“李慎之现象”正是崇尚自由主义的知识学人将学理推向实践的一种可喜现象。他们不再自我萎缩，躲躲闪闪，开始用自由的言说来向极权公开说不，勇敢争取和捍卫自己最基本的权利，在行动上从中共内部积极推进中国的民主化政治改革。

（三）、“李慎之现象”的忧思

后极权时代的“李慎之现象”是一道夺目的曙光，它预示着中华民族的全面觉醒和告别极权专制的临近。但这道曙光能否引来磅礴的日出，仍是未知数。以二千多年专制主义作为基础而又与西来的极权主义嫁接的当代中国极权专制主义虽是强弓末弩却尸魂未僵，其“刚性”力量仍未丧尽。相比之下，先天不足（“存天理，灭人欲”漫长的专制传统）后天失调（政治强人的拒斥、战乱等）的中国自由主义仍是大病初愈后面黄肌瘦步履蹒跚的弱者。已有论者指出，聚集在李慎之旗下的队伍只是“一种松散的精神联系”。¹⁷

弱者如何成为强者？个人自由与自由群体关系如何摆正？笔者认为这是当下中国自由主义者急需思考的问题。

上个世纪末以来，西方自由主义开始对自由群体（Liberal Society）的重视应该给我们有所启示——自由人不同于鱼群，因为鱼群永远不会结队与“网”抗争，而只是想从网眼穿过去。

在市场经济在中国已有近二十年的长势之后，一些适应于商品市场的游戏规则也开始渐渐引入文化、政治等其他领域。经济学家对企业的研究表明，组织资本对于企

业的成功经营至关重要。“所谓组织资本是成员之间的相互熟悉、默契、信任、责任感和不计得失。由此形成众多成员目标行为的合力，使企业具有很强的战斗力。”⁹⁰

在寻思当代中国自由主义如何从弱者变为强者、“共同底线”是否可能时，我以为，经济学这一原理可以给我们有益的启示。

从某种意义上讲，当代中国自由主义正如一个初创（尽管已有“停业”多年的历史）的“企业”，开始（再次）踏入关系成败的竞争场所。就算乐观的自由主义观念价值体系终将主导未来中国之说成立，急剧转型的中国形势也要求十分缓慢爬行的自由主义列车“提速”，在资源上做好更充分准备，以便于尽快进入良好的竞争状态。

当代中国自由主义虽是“草创”，却是一个快速发展的“企业”。经济学家发现：快速发展时期的企业由于新来的陌生成员加入，原有管理规则适时的大调整，组织资本会下降。“旧人与新人合不来是快速成长期的企业的一个典型特征……只有成功渡过‘磨合期’的痛苦，新的更有竞争力的组织资本才可能建立起来。”（同上）这种状况的形成有中国传统“家文化”的深层原因，这种文化使得中国人常常只在血缘、亲缘的家族关系中只信任依赖“自家人”，形成与西方社会团体格局迥然不同的华人社会“差序格局”。⁹¹

樊百华描述过中国思想界的“差序”状态：“中国思想界是很散漫的，不注重合作的开发，造成许多让人焦虑的资源闲置、浪费。‘一己的事情’忙得太多，却因为种种限制忙得很偏、很畸形、也很低效，颓唐的颓唐、招安的招安、经营的经营（余世存讽刺为“体制外的体制”）、谋生的谋生（例如我自己）、沽名的沽名、钓利的钓利，其言煌煌，其行戚戚，过当的惶恐、过分的精明，到头来不过是名相、文字贩子。”⁹²樊文中的“中国思想界”实际上指的是中国自由主义者，这当中原由有自由主义者基于看重个人自由而对“集体”“国家”等可能侵犯个人的天然防范，也很难说没有封闭和排外的“家文化”心理积淀的作祟。

深受存在主义观念影响的汉娜·阿伦特曾指出人在三类活动中显示自己的本质力量。一是与生活资料相关的“劳动”，二是区别于自然的“制造”，三是与人交往的“言行”（speech-act）。这三者各有其内在的价值，在一个健全的生命中不可偏废。但就政治生活的层面来考虑，行动居于最崇高的地位。因为劳动或制造两者都可以由

⁹⁰ 储小平《权利与组织资本》<http://info.news.sinobnet.com/HTML/001/002/009/003/8636.htm>

⁹¹ 参阅费孝通《乡土中国》www.law-thinker.com/wenji.asp?subid

⁹² 樊百华《“秦晖底线”：当今中国的道义权威》，《改造与建设》网 www.bjsjs.net 17/02/2004

人孤独进行，而行动产生于人际之间，由人们言行的交换来构成。⁹³虽然社群主义者引述阿伦特的观念挑战自由主义，但自由主义因其宽容和理性的本质从不封闭自己拒绝对合理因素的吸纳。在自由秩序尚未建立的当今中国，群己关系是自由主义者必须多加思考的问题。

自由主义事业不同于“企业”之处，正在于“企业”以产品至上为目标而满足于“制造”，而自由主义者却须经由“言行”把自己与他人联系起来，从而体现自己更显著的“存在”。

李慎之在条件未具备时拒绝“组党”的游说，但李慎之以自己的“言行”建立了与中、青、老年人三个经常交往的“圈子”，在这种交往中彰显了自己的思想。

在公民意识和维权运动有了长足发展的今天，自由主义者“单子化”的现象已有所改观。在愈来愈多的公共场所，我们已经看到了自由主义者以团队的态度出现（如联署签名），在一些分歧的理论观点上，我们也看到了体制内外、境内外界限的打破（如朱学勤与仲维光，秦晖与温铁军的思想交流）。

与参与竞争的企业一样，当代中国自由主义必须解决“资金资本”和“组织资本”两个根本问题。

从1986年《论言论自由》的公开发表算起至今，当代中国自由主义可以说在学理上已积累丰厚的足以支撑自身存在和发展合法性的资源（本金）。虽然当年的火苗旋即被“反资产阶级自由化”之手捻灭，但《论言论自由》、《新自由论》等文本却已随风传播，成为推动第二波自由化浪潮的强劲动力，并在上个世纪末催生了一批言说自由主义的新军。

1998年因了在党内有特殊位置的李慎之的大智大勇，自由主义再次一发不可收，至今已在宪政、政治、新闻、法治建设等领域取得了一定的话语权。

但需要指出，当代中国自由主义的组织资本积累仅是刚刚开始且存诸多问题，这种资本的从无到有，从少到多，需要自由主义者至少尽快在如下几个方面做出努力。

一是建立和扩大一个泛自由主义者阵营。

如同一个企业要善于融合社会资本使之成为现代意义的企业，当代中国自由主义需要与社会民主主义者，新左派中反极权专制人士，体制内有自由主义倾向的开明民主派有更多的善意的沟通和友好对话，需要“融合”各种社会力量增加自己的竞争

⁹³ 转引自江宜桦《自由民主的理路》，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01年出版，第212-213页

“资本”。当面的主要对手只有一个：极权专制。“所有在行为上能够对专制展开权力抗争且不以获得权力为目的的人们，都是最低意义上的自由主义者。”⁹⁴

由于极权长期对社会各个领域的全面控制，今天自由的抗争必定是全方位多层次的，每个人在以自己合适方式行动之时应当理解和配合他人的方式。

二是运用善于妥协的智慧拓宽自由主义在中国的进路。

如同一个企业要善于开拓自己的产品出路，中国自由主义者面临的急迫任务是把脚下狭窄坎坷的路拓宽拓平。一方面要尽量开通更多直达权力高层的谏路，另一方面又要注意不能堵塞极权权力的“体面”退路。

东欧前极权国家的经验表明，妥协艺术、对弈技巧在转型社会的运作中至关重要，这种艺术技巧包含必要的宽容和暂时的妥协。

基于理性和智慧对形势准确把握的“提速”，才不是盲目的、鱼死而网不破的“冒进”。

三是增强“团队”意识以积极态度争取“消极自由”。

如同一个企业要善于“磨合”新旧人员，中国自由主义者要尽快“磨合”成能相互协作彼此配合的无形“团队”。

自由主义者聚集纪念李慎之、网上签名、悉尼谈宪政，《中国自由主义论丛》的出版等以团队的态度出现的活动都已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果，这些实践证明了“团队”意识并不与自由主义者看重的个人主义观念相冲突。

维护个人权利的“消极自由”必须以积极的态度来争取，这一方面李慎之是典范。具备这种积极态度，不仅要求我们重燃理想之火，而且要求我们增强（如无条件组织的话）“团队”意识。

我们知道，逝去先贤的遗愿只能由现实中活着的人来继承担当，活者之间有更多的“相互熟悉、默契、信任、责任感和不计得失”，先贤的遗愿才能早日化为可以触摸得到的实在。

⁹⁴ 樊百华 《初述 1980 年代中国的自由主义》 《新世纪》网 www.ncn.org 25/09/2003

第三章 破题：

大陆五十年来中国自由主义思想体系公开亮相

一、“毛毛雨”与“冒叫”

1997年，李慎之做出他一生中所做过的最重大的决定：公开亮出自由主义的旗帜。

朱学勤在《1998，自由主义的言说》中指出：1998年中国思想学术界最值得注意的景观之一，是自由主义作为一种学理立场浮出水面。他又在《危城别慎之》中回忆：

1997年春在北京见他时，他在为一本书作序，下决心说破顾准生前的思想探索，聚焦到一点，就是自由主义的突破。凡读过顾准者，都知道这一要穴所在，迫于形格势禁，却是众人心中皆有，笔下却无。我见慎公欲捅破，当时还有顾虑，问他是否言之过早？他大声说：

“下点毛毛雨，没关系。我先说破，你们才能接着说。”1997年春慎公破题，是自由主义在大陆五十年来第一声。可以说，没有慎公破题，就没有此后自由主义在大陆的公开言说，尽管艰难，但坚冰毕竟打破。我体会他当日苦心，实在看不过知识界万马齐喑，坐而谈心性，不如起而行，剑及履及；他也知道还有一点党内资历，所谓‘老资格’，但那‘老资格’不是用来做筹码，向特权阶层讨价寻租，而是拿来作人梯，为冲破思想禁区，为后来者排难除险，甘为前驱。

1999年深秋的一个早上，我打开电脑，突然看到慎公那篇震撼海内外的长文，如受电击。事先没有听说他要写作此文，也从来没有看到我们中国有这样的文字，如霹雳划破夜空。我内心煎迫，与妻子说，‘从今天起恐怕会有事，你要有个思想准备。’然后给北京的徐友渔打电话：‘这么大的风险，不能让一个七十多岁的老人独自承担，要说我们一起说，大家来分担，不要使慎公远远地一个人冒在前面。’友渔毫不犹豫答应，应该有个配合与支持。再给慎公打电话，他却断然拒绝：‘不行，这事只能我一个人说，你们有你们的事！’言语之坚决，容不得半点商量。此后事海内尽知，不断有坏消息传来，他独自承受，没有半点退缩，见面时却从不言语一句。知识界以资历以名望进政协进作协，如过江之鲫，披学者之华袂，享各界之谀词，却从

从来没有一个老人如此决绝，视虚衔如粪土，什么部级、副部级，乾坤一掷，我只要这一点说真话的权利！

朱学勤感慨：为宪政而争，谁非后死者？为自由而鸣，公真第一人！⁹⁵

1998年3月4日李慎之在写给许良英的一封信中说：“我所以要冒叫一声，是为了要让人注意到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根本差别，西方（以希腊为代表）从源头上就重视求真，中国从源头上就重视求善，这个差别经过几千年的发展，差别实在太大了。这些话其实是老生常谈，不过中国现在已经成了市侩社会，已没有多少‘老生’了。”2001年9月28日，他在接受法国国际广播电台采访后写信给许良英：“中国共产党可称根本无学者无思想家，此外，中国又有几个人？中国的人才实在太少了，因此我现在总倾向于‘在矮子里面拔长子’……我所以这样叫一叫，当然不是考虑为当局鸣锣喝道，而是希望能给国人一个概念，我要向你表白，我的最高纲领，仍然是‘和平演变’。不过由于当局一动不动，我觉得如果能先实行私有化，也可为未来的政治改革打下一点社会基础。至于政治上当局正在不断收紧，我的文章大概已无在大陆发表的可能，我当然是清楚的。不过，我们已经老了，物质地讲，我们是最少可怕的人，现在老人都越来越衰退，我胆量有限、作用更有限，能叫一声就是一声而已。”⁹⁶

时至今日，李慎之洪钟般的声音已在国人心间引起强烈的共鸣。历史再次证明了关键人物在关键时刻的行为，对人类的命运是多么的重要。如若没有李慎之的敢为人先，自由主义这一人类思想的瑰宝，还不知要押后多长时间才在广为国人所知所识。有李慎之，确是中国人民之大幸。

二、“起而行”：自由主义难在实践

笔者以为，对于自由主义实践难度的感知和论证，无人在秦晖之上。

在2006年2月于悉尼科技大学举行“政治文明与和谐社会国际学术讨论会”其间，秦晖对笔者谈到在非自由秩序下实践自由的艰难和做一个自由主义者的不易：别的主义者可做的事如“抢来本钱做生意”和“掌勺私分大锅饭”自由主义者不可做，而别的主义者不必做的事如“高调律己，低调律人”和“反对他人之间的强制”自由主义者就必须去做。

⁹⁵ 朱学勤《危城别慎之》www.frchina.net/data/personArticle.php?id=257

⁹⁶ 转自傅国涌《李慎之晚年的悲凉——与许良英43封通信的解读》www.chinatopnews.com/MainNews

中国不是基督教国家，但是中国文化如果仍然富于生命力，它必然有自己的超越性与终极关怀资源。秦晖试图以“穷则兼济天下，达则独善其身”来描述这种资源。这也可以说是中国式的圣徒精神：穷则兼济天下，为无权者之权利，知其不可而为之；达则独善其身，以有德者之德行，己所不欲勿施人。秦晖认为，李慎之先生正是这种精神的代表——“反右”以后，90年代以来，慎之先生无疑是“穷”者。但他善其身而不“独”，为“济天下”而勤于思考，奋力呼吁，岂是那些“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独善其身的聪明人”（朱自清语）所能比？而50年代初，尤其是80年代大部分时候他官居高位，可谓“达”者，这时的慎之先生固有“济天下”之心，但更有律己容人的襟怀，倡导宽容与自由，反对借“兼济”之名对“天下”滥用强制。

在《实践自由——再祭李慎之》一文秦晖论道：

在自由秩序之下，只要不想强制别人的人在广义上就是自由主义者……但在存在着奴隶制的条件下，自由主义者不仅自己不当奴隶也不做奴隶主，而且应当积极推进废奴运动，他也许可以不反对别人“自愿当奴隶”，但他绝对不能容忍别人强掳或强卖他人当奴，最简单的理由是：容忍了别人强迫他人当奴，就难免有一天别人会强迫自己当奴。

不“迫使他人自由”并不等于不反对“他人”之间的强制。这一点在自由秩序已存在（即“他人之间的强制”已不是问题）的条件下也许无须特别强调，但在未有自由秩序时是怎么强调也不过分的。自由主义者必须反对“你对他的强制”，即反对任何人对任何其他人的强制，而不仅仅是“我不强制你也不受你强制”。他必须帮助那些希望自由而不可得的人（而不是“自愿当奴隶”者）。因为这时的自由主义者首先必须争取自由，然后才谈得到如何维护自由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真正的自由主义者就不能只是“消极自由主义者”。他还必须有“积极自由”的实践，这就是自由主义实践的第三层次……而正是这一层实践，具有极大的难度。因为这是一种真正利他主义的斗争，一种需要真正的无私奉献的真正理想主义实践。

争取自由常常要付出巨大代价，而自由主义者既然要尊重别人的自由，就不能强制别人去支付这种代价（这与别的“主义者”可以以“革命纪律”、“理想主义目标”的名义强迫别人付出代价是不同的），而只能自己去付出代价。然而作为斗争成果的“自由”又是一种最具“公共物品”性质的东西。财产可以专有，权力可以专有，唯独“自由”不可专有。“劫富济贫”的好汉们可以以“革命需要”的名义多留一些“劫富”所得然后才去“济贫”，即使对财产毫无所留而全部“共产”，也可以

在“打江山者坐江山”的游戏中得到权力这一报酬，唯独为自由而斗争者可能比别人付出高得多的代价，却不可能比别人多得任何东西：斗争的结局不可能使他比别人享有更多的“自由”，也不会使别人享有比他更少的“自由”，而斗争若失败他则可能失去一切，甚至连名字也被人遗忘。

秦晖的结论是：做一个自由主义者比作别的主义者要难得多：不是难于论证，而是难于实践。自由主义并不是犬儒主义（尽管有些人往往把自由主义描绘为犬儒主义），恰恰相反，自由主义是一种真正的理想主义，说他是“真正的”，是因为自由主义的理想是一种只能律己而无法律人的理想。他与某些主义的“理想”长于律人却决不律己形成了鲜明对比。一句话，自由主义者不能指望别人是理想主义者，甚至它应当假设别人都是庸人而且完全有权理直气壮地当庸人，但他自己却必须是理想主义者，他必须准备为“庸人们的权利”付出牺牲，而且不能指望“庸人”们有任何回报。——还有什么样的理想主义能基于此呢？⁹⁷

读秦晖文，笔者深深感叹：李慎之拆下肋骨当火把“能叫一声就是一声”地身体力行实践自由，为的就是启当权者之“蒙”，促使中国社会早日转型，让每个人拥有免于强制的低调自由。这是何等的“圣徒”情怀！可惜当今中国，无权者的“民”智已开而当权者的“官”智未启，使得“自由民主”还悬浮于中国人的现实生活之上。

如果说由于党国历史上若干重大决策错误的缘故导致将自由民主付诸实践一再遭到延误，那么，在市场经济持续 28 年发展后的今天，已再没有任何理由可以作为当权者拒绝实践自由民主的托词了。按照当今世界的国际标准，实践自由民主是任何政党的先进性的体现。但在中国，主权在民、政治协商、言论自由等等这些已入宪的民主政治普世价值却一直悬浮在中国政治的上空，没有落定化为中国人民政治生活的实在。究其原因，正是党国当权者对实践自由民主一而再的顽固拒斥。中共在野时曾对国民做出了诸多美丽而庄严的承诺，那些掷地有声的铮铮之言仍在历史的“回音壁”上轰响，听一听那些信誓旦旦，曾有力撞击国民心钟的诺言，党国领导真应该为今日中国的不文明政治而无地自容。

今天，我们将实践自由看成是衡量一个政党先进与否的基点和底线，是因为实践自由民主是历史和现实的双重急迫要求。从纵向上看，中国实践自由民主的历史记忆是一种痛苦和失败的记忆。晚清中国人实践自由民主的第一次尝试，很快就被军阀武人扼杀；民国时期的第二实践也被两种党国理念和体制的左右夹击而流产；1980 年代

⁹⁷ 秦晖《实践自由——再祭李慎之》www.ncn.org/asp/zwginfo/da.asp?ID=53433&ad=6/27/2003

的第三次实践刚刚准备起步便被坦克的野蛮履带所碾碎，后又以发展生产为由“不争论”而被回避搁置。眼下千年未遇之“大变局”的历史（战略）机遇，实不可再失之交臂。从横向上看，以自由民主促进发展已是全球大趋势。在印裔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描述的促进发展的五种最重要的工具性自由：政治自由、经济条件、社会机会、透明性担保以及防护性保障之中，“政治自由”放在首要位置。⁹⁸民主化的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青山遮不住。苏联东欧地区、我国周边的亚洲地区、阿拉伯世界的阿富汗、伊拉克、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乌克兰以及吉尔吉斯斯坦等国家人民都相继走上了通向自由民主的道路。党国领导真心要为其党保有先进性，就要勇敢承认共产党人的社会主义政治设计已归于失败，果敢地迈出实践自由民主的步伐。

按照当代的标准，实践自由民主是任何政党执政资格的底线，连这一底线都没达到，“先进性”就根本无从谈起。从这种意义上说，中共在目前无“先”可保。避免中共成为没落的“夕阳党”的唯一途径不是“保先”，而是先开承认传媒“不党不私”品格的报禁，再开舍弃“唯我独尊”的党禁，通过实践自由民主将自身改造成名副其实的、与在野党平等相处公平竞争“执政党”。

实际上，中共追随世界文明潮流的道路尚未完全堵死。从对“商品经济”无端恐惧和残酷打击到对“市场经济”深情爱恋和热烈拥抱，从对“人道主义”的打压封杀到将“以人为本”确定为大政方针，从对“人权”的全面批判和拒斥到“人权入宪”，都证明中共并未完全丧失与时俱进的能力。但是，机会与时间确实所剩不多，一任矛盾危机累积、激化、爆发而继续以一党之私忙于保权、保位，到头来中共的“落后性”既给中华民族带来灾难，也将使创建了近一个世纪的大党彻底被中国人唾弃。后极权社会矛盾和危机越积越多的今天，留给党国领导可以从容来布置实践自由民主从而刷新自己的时机或许只有眼前这最后一次。

三、勇气有时比见识更重要

（一）“子路型士人”

按照单少杰的说法，子路型士人之所以在历代中国人中都显得很“另类”，一个根本原因，就在于历代中国专制统治者都奉行一种姑且叫做“除悍禁暴，摧阳折刚”

⁹⁸ 《以自由看待发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4 页

的执政原则，即对其治下臣民的性格类型做出“留取柔弱而排斥刚强”的选择。⁹⁹的确，中国久远的“留取柔弱而排斥刚强”专制统治造就了怯懦恭顺、畏首畏尾的“理想臣民”，形成了中国人在社会生活中一种活得十分乖巧，能进能退，游刃有余的圆滑处世世风。在此世风中，那种直言骨鲠、敢做敢为、刚勇且强悍、遇有不平则拍案而起的人，就自然显得十分“另类”。

在单少杰看来，李慎之先生就正属这种“另类”子路型士人。他像子路那样伉直，那样较真、认死理：子路认死理，为此不惜顶撞自己所服膺的孔夫子，不惜惹得老师生气；李慎之先生辈亦认死理，为此不惜质疑自己曾献身于其间的革命事业，不惜批评自己曾加盟于其间的政治组织。

他也象子路那样无畏，那样见义勇为、不避风险：子路不避风险，“利其禄，必救其患”；李慎之先生辈亦不避风险，借用古语说，“立于淫乱之国而好尽言”，并且是接二连三地“尽言”、迫不及待地“尽言”。

所以，李锐先生要给老友改名，改“慎之”为“慌之”。被改名者则坦言：我要“慎”也“慎”不了多久啦，还不如“慌”下去。

慎之先生这一“慌”，一直“慌”到不能再“慌”时：公元2003年4月22日10时。¹⁰⁰

李慎之等“另类”前辈，历经数度挨整“虽九死而未悔”，举目国中，确是屈指可数，寥若晨星。从子路到彭德怀，多少“愤世嫉俗”被磨成“玩世不恭”？多少“激烈壮怀”最后知趣的按灭理想之火？无理想之后是看穿一切，看穿一切之后是物质主义的泛滥。象李慎之这样“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善养吾浩然之气”的大勇者又有几多？

（二）、“虽千万人吾往矣”

为数不少有文化、有良知的国人，由于过分专心经营自己的小生活，苟安于犬儒人生，自以为告别了专制社会与文化却对潜移默化于脑际心底的专制统治者的思维逻辑以及一些极权文化的积淀，习焉不察，为其所愚而不自知。少数有心反对他人之间的强制者也由于大步难迈小步不愿迈而干脆停步不前，只剩下喊喊简单的口号骂骂娘

⁹⁹ 单少杰《纪念李慎之先生——兼谈子路人格》<http://www.observechina.net/magazine/artshow.asp?>

¹⁰⁰ 同上

的气力。更有一些“民主斗士”由于“狼奶”、“马毒”的作祟，互骂相残不能包容尊重他人异见。这一切使的中国社会向自由宪政的转型步履艰难。

李慎之在给许良英的信中说：“十年来，我几次去美国，住的时间将近十（月），跑了几十个城市，十几所大学，竟没有看到一个可与胡适相比的留学生，虽然博士倒不少。我自己说自己孤独，其实是‘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¹⁰¹“国内外现在都没有‘爱国志士’，有的只是利禄之徒。你说我关于哈维尔的文章‘对当前的中国会产生冲击力’，但是我却看不到会有什么影响。从中国到外国，再从外国到中国，感到的只是极度的孤独。我写过一篇要搞公民教育的文章，只有两个人响应，其中一位是与我同年76岁的老先生，真教人难受，然而也还是只能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干下去。”¹⁰²

傅国涌有这样一段评论：“悲凉之雾，遍披华林”，在曾经自认为是共产党“孤臣孽子”的李慎之身上，特别在他生命的黄昏就一直笼罩着这样的悲凉之雾，身历反右运动、大跃进、“文化大革命”、“六四”等一系列灾难，虽然偌大的中国“呼吸而领会之者”并非李慎之一人，但他无疑是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人物之一。如果说1999年秋天那个孤独的夜晚，他在一盏孤灯下写下的传世之作《风雨苍黄五十年》的文本中，我们还能读出他对这个少年时就向往不已的革命党抱有一线幻想的话，那么在他内心深处，其实已经完全清醒，彻底失望、进而绝望，他一而再地说“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一再向知己之交的同代人许良英透露心曲，悲观之情毕露无遗，悲凉之雾逐渐将他的身体乃至生命淹没，但他的思想在雾中升腾，以“精卫填海”、“夸父逐日”般的神话精神，重新开启了一扇通向未来的门。¹⁰³

应该说，李慎之是一位悲观的积极行动者。他没有知难而退，而是勉为其难，奋力疾呼。他喊出的可能只是一些“常识”，但这些“常识”的喊出却需要非凡的勇气和胆略。

四、 自由主义旗帜下日益壮大的队伍

在李慎之直接交往的三个人际圈子里，中青年是他汲取自由主义资源最多的一群。他们之中直接影响李慎之的有：徐友渔由对法兰克学派的研究率先对自由主义的重新诠释，朱学勤由法国大革命的剖析对自由主义理念的大力宣扬；刘军宁由自由主

¹⁰¹ 1999年9月6日李慎之与许良英通信

¹⁰² 1999年8月22日李慎之与许良英通信

¹⁰³ 傅国涌：李慎之晚年的悲凉——与许良英43封通信的解读
www.blogchina.com/new/display/102676

义宪政设计的研究对个人主义的强调；秦晖由社会公正的关注对奴役和强夺的抨击。⁵除此之外，知识界胡适、陈独秀研究的新成果；曾敏之对顾准、谢泳对储安平、陆建东对陈寅恪、冯崇义对罗素的重新发现以及崔卫平对东欧哈维尔等自由主义者的推介；王毅对皇权专制主义历史的见解；刘晓波对极权主义的痛斥；余杰对谎言的鞭挞……加之与许良英、李锐、王若水、吴祖光等挚友的思想交流都各在某些方面影响和促成了李慎之从革命党人到自由主义者的角色转换。

自由主义浮出水面后，迅速形成了一个人数不多但影响深远的中国自由主义思想界。除上文提及的自由主义人物外，陈永苗、崔卫平、丁东、郭飞熊、焦国标、秋风、樊百华、傅国涌、蒋泥、刘晓波、季卫东、吴稼祥、王怡、单少杰、余世存、谢泳、笑蜀、萧瀚、肖雪慧及海外的胡平、陈奎德、吴国光等都对自由主义有较好、较多的论说。

在广泛汲取和仔细消化之后，李慎之以自己丰厚的学识和过人的眼力将这些资源养分化为自己独特的思想见解，使自己得以站在更高的高度来审视和批判专制主义，阐释和弘扬自由主义而成为当代中国自由主义的领军人。

在海外各种嘈杂的声音中，自由的流亡者按不同的生活经历感受，不同的知识结构、精神信仰发出不同的声音。但自由者不是自由主义者，在谋道又谋粮，忧道又忧贫的双重困扰之中，自由者之中有足够的精力和时间来调整原有就残缺不全的知识结构而成为自由主义者的不多。胡平、陈奎德等自由主义者很长一段时间并未占有强势的话语权，这种情势下，他们的声音对大陆的影响如果有也只限于一个小范围。但近几年互联网的快速发展改变了这种隔阂状况，无疆界国界的博客论坛上海内外准自由主义者熙熙攘攘，吵架中不断的放大自由主义的声响。大陆市场经济的发展需求引入了包括哈耶克等自由主义者的经济观念，利益集团的分化引发社会公正的危机也使得自由主义宪政理念开始慢慢被中国法学界重视。在分化的执政党内，一批通过现代传媒接触到自由主义思潮和早年受过五四自由民主氛围熏陶的新老共产党人的也开始反思和认可自由主义的价值。

可以预见，在李慎之等人的努力下，一支中国自由主义的队伍将很快兵强马壮，在未来的转型社会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第四章 李慎之晚年思想的主要内涵

一 重新认识中国文化传统

(一) “传统文化”与“文化传统”

李慎之曾借哈维尔之口批判当代中国的后极权主义现实，控诉“这个社会的最高原则是‘稳定’。而为了维持稳定，它赖以运转的基本条件仍然是：恐惧和谎言。弥漫的、无所不在的恐惧造成了弥漫的、无所不在的谎言”。¹⁰⁴但是，李慎之毕竟并不熟悉极权主义的分析框架，在中国那种语境下也没有机会采用极权主义的分析框架来进行现实批判。因而，李慎之将批判的矛头集中于“中国专制主义”。长期以来，李慎之面对一个大困惑：中国专制主义为何会在二十世纪下半叶“借尸还魂，变本加厉”，全面复辟且至今犹如“百足之虫，死而不僵？”怎样才能最终消灭专制主义？一番深思熟虑之后，李慎之在生命最后几年对中国专制主义发动了一场猛烈的进攻、一次严正的审判：

“经过近几年的观察与思考，我现在认为，所谓‘固有之血脉’或者‘本民族之地位’必须分清是传统文化还是文化传统。如果是前者，可继承发扬的当然是极多的；如果是指后者，那末，我认为无论如何不能继承作为顽固的意识形态的专制主义。专制主义是只能否定，谈不上继承的。”

“只要拔除了专制主义这个毒根，中国传统文化中不但不受意识形态污染的广大部分，从文学艺术到科学技术，可以而且应该继承发扬，即使是儒家与法家的学说，也都有应该继承的因素。比如儒家的‘民本主义’固然不等于民主主义，但它并不难转化出民主主义来。”¹⁰⁵

善除恶者察其本，善理疾者绝其源。李慎之把批判锋芒指向中国专制主义“老祖宗”秦始皇，将公元前 221 年秦嬴政自称“始皇帝”“立定”为中国专制主义的“元年”，指认王夫之“郡县之制垂二千年而弗能改”、李卓吾称秦始皇为“千古一

¹⁰⁴ 李慎之：《无权者的权力和反政治的政治——后期极权主义时代的人生哲学（〈哈维尔文集〉序）》，李慎之：《风雨苍黄五十年——李慎之文选》，香港：明报出版社，2003 年版，第 151 页。

¹⁰⁵ 李慎之：《中国文化传统与现代化——兼论中国的专制主义》
www.zijin.net/get/zt/zt5/2005_08_19_

帝”、谭嗣同“两千年之政皆为秦政”以及毛泽东“百代多行秦政制”之谓，“实在千真万确”。“秦始皇是第一个统一中国这个大帝国，确立中国专制皇权的人。秦始皇一统天下以后，中国实行的就是皇权专制主义，我杜撰了一个英文名词，叫做Emperorism。二千年间虽有损益，但是基本上没有变化，在中国一直由皇帝统治。”

106

从毛泽东“我是马克思加秦始皇”这句极度概括、极端坦率的表白里，李慎之领悟到了“以最最最革命的形式来实现中国历史上、也是人类历史上最暴最烈、最黑暗、最野蛮的专制主义”就是自由主义的死对头——极权主义。李慎之深刻指出：共产党以“人民解放”、“当家作主”、“反专制、反独裁”、“争自由、争民主”相号召，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秦始皇所建立的一套制度已经不折不扣地是落后而且反动，而他的伟烈丰功却还是压在中国人民的心头，而始终不敢改弦更张，……而以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文化大革命中的‘全面专政’达到高峰”。自秦一统天下以来，中国文化传统的“主脉正流”已转向为“一种政治的文化、权力的文化”，一言以蔽之，专制主义的文化，“一种强烈的意识形态文化”。“世界上最最最革命的理论和最最最专制的传统相结合，使中国形成了最最最黑暗的毛泽东思想三十年的统治。中国传统的专制变成了极权主义。”¹⁰⁷

我们知道，广义的文化或民族文化包括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三个部分，狭义的文化则特指精神文化。关于中国文化，李先生认为有“传统文化”与“文化传统”之分。他解说，“文化传统”显然贯穿于杂多的“传统文化”之中的一以贯之之“道”。那么这个“道”是什么呢？是专制主义——“中国的文化传统可以一言以蔽之曰‘专制主义’”¹⁰⁸

曾自诩“半个新儒家”的李慎之对中国文化有深厚的感情，他身上流淌着中国文化的血液，影响着他的思考、行为和言说。同时，在极权专制之现实的强烈刺激下，李先生又心怡并决意要在中国弘扬西方自由主义思想。两种谱系相异的思想文化在他心中的不同层面，此起彼伏地、此强彼弱地、或自觉或不自觉地在心灵中搅合着起作用，因此即使在自觉的言说层面，他的思想也显现出许多复杂矛盾之处。

¹⁰⁶ 李慎之：《新世纪 老任务》www.housebook.com.cn/200101/9。

¹⁰⁷ 许良英：《痛悼挚友、同志李慎之》www.peacehall.com/news/gb/pubvp/2003/06/20

¹⁰⁸ 李慎之：《中国文化传统与现代化——兼论中国的专制主义》www.zisi.net/html/wzzh/2005-05-24

“作为一个中国人，我原则上相信，作为中国文化的核心的中国哲学，能够给当今中国的文化危机和全球的文化危机开出一条最好的解救的道路来。”¹⁰⁹“作为中国人，我天然地认为中国哲学最符合未来的全球价值，比如‘道’的概念就比‘神’的概念更好。”¹¹⁰另一方面，李先生又认为中国哲学是专制主义的帮凶：“一部中国哲学史或者中国思想史怎么样也脱不了专制主义统治一切的模式”。¹¹¹

对李慎之面对中国文化的复杂矛盾心境，王瑞昌《李慎之先生试论》一文有较好的分析：

关于李先生，有“道义英雄”，“知识分子的良心”，“纯粹的知识分子”，“精神贵族”，“真正的理想主义者”，乃至“名士气节”、“硕儒典范”等等说法，这些说法都可涵盖在“士大夫”这一名下。

孔子“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孟子“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乃至王阳明的“无声无臭独知时”¹¹²等儒家思想他不仅常言之，而且也是他真正的精神支柱。具体说，李先生属于儒者中的“狂者”人格，与孟子以下心学中的人物的气味很接近。不仅李先生的人格是儒者型的，而且其某些观点也与儒学观点一脉相承。如他相信灵魂是不死的，认为“宇宙是永远进化的过程，而人是宇宙之心，人贵为宇宙之心。人心与天心是相通的。

“士大夫”是中华文化滋哺孕育中的精英人物，可以说中华文化的托命者，代表者，体现者。李慎之先生既是中国士大夫式的人物，按常理他应是中国文化的坚定的护持者。但是，我们都知道，李先生，特别是晚年的李先生，从其发言著论看，几乎是个中国文化的彻底否定者，西方文化的全盘拥抱者。何以会如此呢？这其中的原因可能比较复杂，但最根本原因的当是当代极权政治的刺激和切肤之痛。

由于自由民主等实际上是西方文化中的产物，中国传统中没有这些，所以把传统文化视为当代极权专制的母体而施以不遗余力的挞伐，一言以蔽之曰“专制主义”。李先生曾自称：“我的文章影响最大的是《风雨苍黄五十年》，但真正有所贡献的是《中国的文化传统和传统文化——兼论中国的专制主义》。”¹¹³的确，这两文可说是李先生最具影响力的文章。前文痛心疾首，字字血泪，表达了李先生对几十年来的

¹⁰⁹ 李慎之：《全球化与中国文化》www.boxun.com/hero/lisz/4_1.shtml

¹¹⁰ 袁伟时：《从顾准到李慎之》www.chinaaffairs.org/gb/detail.asp?id=30803

¹¹¹ 李慎之：《中国文化传统与现代化》www.boxun.com/hero/lisz/4_1.shtml

¹¹² 李先生的朋友林孟喜在《自许高才老更刚——忆慎之》中提及李曾把阳明的此句诗作书斋之横匾。阳明原句作“独知时”，林在文中引作“独识时”。此据阳明本文。

¹¹³ 段跃：《永远的尊严——痛悼李慎之先生》www.sinoliberal.net/lishenzhi/liszmemorial.htm

“最最专制”的痛切感受和愤懑之情，后文所表达的反传统观点则是此种痛切感受和愤懑之情所催化出来的产物。其间有一定的逻辑联系。在李先生眼中，眼下的“最最专制”不是突然刮起来的黑旋风，而是渊源有自。它来自秦始皇以来两千余年的“皇权主义”专制文化，有其源远流长的历史文化根源。在李先生眼中，现实中这种目击而遇的极权专制不啻为传统文化发展之极致，所达到之顶峰，是两千年来中国专制文化的集大成者。李先生又是富有世界眼光的人，一生读中国书的同时，也博览西方文籍，闭关锁国几十年后，并有机会周游西方诸大国，对西方近代自由思想，民主政治，开放社会知之颇深。而西方是代表着人类社会发展的光明前途，是世界潮流之所向，是人类进步的康庄大道。中国文化则是黑暗蒙昧专制奴役的渊藪，不可疗治。中国要有救，只有去此取彼这一条路。

李先生的人格精神是中国传统“士大夫”式的，其“身上所流淌的传统文化血脉显而易见”，因此在心灵深处他对传统文化不可能全无认同，但是由于对现实的专制感受太深，受现实刺激太烈，所以最后还是不顾一切，义无反顾地拥抱西方近代以来的自由主义文化。

李先生向往西方自由主义思想，这则是他精神生命的外层、表层，即言说的、自觉的层面。他目击极权专制，意识到自由主义是极权专制的克星，因此而呼喊、号召、“高谈阔论”自由主义。民主可以克专制，自由可以克极权，个人主义可以克铁板一块的集体主义，法治可以克长官意志，这些显而易见，黑白分明，所以他认得真切，看得准确，所以就信心而行地、义无反顾地为民主自由个人主义和法治而抗旗领军，勇猛前驱。¹¹⁴

李慎之在生命的最后几年明白不误的将中国“文化传统”与“传统文化”区别开来，对自己的内在矛盾作了一个妥善的了结。他将中国的“文化传统”归结为统治两千多年的专制主义政治结构和专制主义意识形态，当然要站在自由主义的立场进行全面的批判。而中国的“传统文化”则是中华民族在源远流长的历史长河中所创造的和留下的文化积累，包括以天下为己任的士大夫精神，即傲视权贵有谦和待人的儒者风范等等个人道德方面的瑰宝，当然值得中国人继续发扬光大。

（二）、中国专制主义的支撑与特点

¹¹⁴ 参阅王瑞昌《李慎之先生试论》www.confuchina.com/03%20lunlizhengzhi

李慎之先生在《中国文化传统与现代化——兼论中国的专制主义》一文中这样论述中国专制主义的支撑与特点：“意识形态”一词，据《汉语大辞典》的解释：“指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上形成的对于世界和系统的看法和见解，包括政治、法律、艺术、宗教、哲学、道德等思想观点。”这个解释大概受到日本人的影响。事实上，“意识形态”这个词也正是日本人藉与中国人共用的汉文，对西文 ideology 的翻译，其实不但文理欠通，意思也不确切。据英国的牛津字典，ideology 的解释是：A system of ideas and ideals, especially one which forms the basis of economic or political theory and policy. 照美国的韦伯斯特字典的解释是：A Systematic body of concepts especially about human life or culture. 另一个解释是：The integrated assertions, theories and aims that constitute a socialpolitical program. 三者大意差不多。如果用中文简单地横述，就是一整套关于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的教条和理论。中国的专制主义恰好符合这个解释。海外华人学者有把 ideology 按声音译成“意底牢结”或“义谛牢结”的，倒也尚能传神达意。它真是牢牢地固结在一起，不用极大的力量，不经过长期的冲激，不经过内部的腐烂，确实是攻不破的。

在外国的专制主义下，老百姓都称为“臣民”（subject），现在有的学者也把这套到中国人身上，说中国人只有臣民心态而没有公民意识，中国的出路就在让臣民社会演化为公民社会。其实说中国老百姓是“臣民”还是不够确切，中国老百姓的实际地位是无法翻译成洋文的“子民”。历来说“天子抚育万民”，皇帝是上天的儿子，又是百姓的严父，百姓对皇上的依附关系因此又比外国的臣民对君主的依附更深一层。

在专制主义统治下，中国人并没有“公民”的觉悟，只有“子民”的顺从。

所谓专制主义，只是用一个名词来说。它也可以一分为二地说，那就是在上的另一方面是专制主义，而在下的一方面是奴隶主义。专制主义就这个意义上说是一个合二而一的结构。它决定了中国的政教礼俗，也因之而决定了中国的国民性。在这方面迄今为止看得最深最透的是鲁迅，他所创造的阿 Q 就是长期的专制主义统治下中国国民性的典型。

笼而统之，对中国的专制主义也勉强可以说出一些特点来。

第一是资格特别老。从秦始皇称帝算起，专制主义已有二千二百多年的历史，这个历史比起世界上的大宗教如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已经长得多了。

中国专制主义的第二个特点，也是最可恶、最黑暗的一个特点，就是思想统制或日愚民政策，其实它本来就是政治上的大一统必有的一个组成部分。

1980年代，胡绳在中国学术界权倾一时，在中国近现代史学界几乎可以说是一言九鼎。作为中国官方史学的代言人，胡绳所著《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正是根据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教条论证中国在经历了“封建社会”之后，从鸦片战争开始进入相当于资本主义阶段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这个阶段的历史以太平天国、义和团运动和辛亥革命三个“革命高潮”为主线，交织着半封建半殖民化的过程和中国人民的反抗的过程这“两个过程”的较量；结果证明“旧民主主义革命”和“资本主义”的道路走不通，最后便让位于后来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的胜利。

胡绳曾力推李慎之复出，但李慎之坦言与胡绳有不只是对近现代史一些具体观点的分歧，而是整个历史观与历史体系方面的差别的“道不同”。李慎之认为，胡绳笔下的中国近代史，如果不是捏造、至少也属歪曲。因为，中国的“封建社会”最迟到秦始皇统一中国的时候便结束了，从那以后便是人类各民族历史上最漫长的“专制主义社会”，一以贯之直到今天，“半封建”说无从谈起。按鲁迅的说法，古来中国只有“吃人”（吃和被吃）的历史，只有“做稳了奴隶”和“求做奴隶而不得”这两个时期。之所以是“吃人”，之所以是所有中国人都做奴隶或求做奴隶，原因就在于专制主义的统治。在“专制主义社会形态”之中，不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而是“专制主义”这一上层建筑决定经济基础。专制主义的邪恶力量不断地扼杀对该社会形态构成威胁或可能构成威胁的新经济因素、封杀对这种社会形态构成威胁的新观念、残杀对新制度进行试验的机遇和活力。中国专制主义是使中国社会长期停滞、妨碍中国社会向现代转型的黑暗力量。专制主义的天敌是自由主义，专制主义在西方被自由主义击溃了。因而，真正有意义的中国近现代史，只能是专制主义和自由主义对抗消长的历史。

李慎之在历史观上彻底摆脱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决定论和人类社会五个发展阶段论，认定中国最迟从秦始皇统一中国时起便已进入“皇权专制主义”社会。长期的“皇权专制主义”统治使中国形成了根深蒂固的专制主义文化传统，“深到不易认识清楚，深到不能真的触动的程度”，因而即使形式上的帝制被葬进了历史的坟墓，专制主义的传统仍然变相延续下来。较早提出这一观点的有中国古代思想史著名专家刘泽华等人，而且已形成新生代历史学者的基本共识。

为此，李慎之专门著文《‘封建’二字不可滥用》，因为“封建”与“专制”不

只是概念的不同，更是历史观的差异。“封建”是一种特定的社会形态，在中、西方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但都早就成为历史。“专制”则依旧存在于当今社会，阻碍着社会的进步、破坏着人们的幸福，与政治民主化、经济市场化、贸易自由化等世界潮流背道而驰。

据笔者的学位论文导师冯崇义回忆：在2003年三月份近三个钟头与李慎之的长谈中，除了对美伊战争和世界局势聊了几句，其余时间全部集中在“中国专制主义”的话题上。慎之谈到当年胡绳出版《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一书，一时洛阳纸贵，且分派党内高官人手一册，这对其时已自觉“道不同”的慎之前辈刺激极大。因为这个缘故，当慎之前辈意识到他的思想体系已经形成时，便计划以改写中国近现代史的方式来全面展现他的体系。他逐渐成熟的“思想体系”，也就是他对中国专制主义的系统认识、以及清除“中国专制主义”的自由主义方案。¹¹⁵

二 自由主义：瓦解专制极权社会最有效的思想力量

（一）、自由主义是“最不坏”的主义

正是基于深刻的史识和一生对“革命吞噬自己的儿女”的刻骨铭心的体验，李慎之于耄耋之年义无反顾地举起自由主义这面大旗。

专制主义的长期统治使中国人“几乎无所逃于天地之间”，心灵备受扭曲。李慎之指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专制主义与蒙昧主义的遗毒仍然根深蒂固，由此而来的极端主义的心态，深深地埋在中国人民的心底，随时可以复苏而反扑过来，一个世纪以来都有反复表现，真是所谓‘心中贼难除’”。“中国人确实如胡风所说，是浑身带着精神奴役创伤的人，要冲决中国几千年专制主义传统的罗网是何等困难”。“专制主义在中国是一种生活方式，要一个十几亿人口的社会整个地换一种‘活法’，这的确不是一件容易事，也不是一件小事，这是有世界意义的大事。”“中国的传统文化自从秦始皇称帝一统天下的两千二百年以来，一言以蔽之，就是专制主义。救治专制主义的唯一出路，就是启蒙，就是以近三百年来作为人类历史主流正脉的自由主义取代专制主义。”¹¹⁶

李慎之认为，西方经过二百年的试错，自由主义已经长成参天大树。中国不必从

¹¹⁵ 参阅冯崇义《李慎之：冲决专制主义传统的中共党内自由派领袖》，思想评论网站 www.sinoliberal.com

¹¹⁶ 李慎之：《重新点燃启蒙的火炬》 www.chinaaffairs.org/gb/detail.asp?id=12026

头构建自己的自由主义价值体系，却必须大力践行自由主义的道路。

“我们已经有了了一百年的传统。……中国儒家和道家这样的主流文化中也可以找到与自由主义相容、以至相互促成的资源。

我们正在转向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必然发展经济的自由主义，而经济的自由主义正是其他各种自由主义的基础。

我们现在正处在全球化的时代。经济市场化已成为全球性的潮流，自由和自由主义也越来越成为一种全球性的价值。

世界经过工业化以来二三百年的比较和选择，中国尤其经过了一百多年人类史上规模最大的社会试验，已经有足够的理由证明，自由主义是最好的、最具普遍性的价值，……自由主义传统在今天的复兴，一定会把一个自由的中国带入到一个全球化的世界，而且为世界造福增光！”¹¹⁷

李慎之认为，政治可能比经济更是评判文明的指标。经济自由是政治自由的基础。但仅仅发财不行，中国人是有发财能力的，这在世界上可能还领先。但中国人不追求政治自由。中国的企业太软弱，中国的企业家太软弱。要大胆地提。中国的全球化进程，中国的改革实际上是从晚清开始的，但大规模的改革是邓小平时代开始的，这20年取得了很重要的成果。但邓小平只搞经济改革，政治还是老样子。在这点上，邓小平就是毛泽东。毛泽东不懂民主，是真不懂。他给黄炎培的谈话是因为真不懂。

严复写了一篇文章，认为西洋之所以发达，中国之所以落后，“自由不自由异尔”。中国全部文化的弱点，应在于“不自由”上。中国五千年文化的特点，就是“专制主义”。自由主义是中国唯一的出路。知识经济为什么在美国兴起？根本问题就是自由，我们缺少的恰恰是这个东西。¹¹⁸

李慎之也将思考的触角伸张到人性层面。在他看来，人的本性可善可恶，自私与利他，贪婪与慷慨兼有，使人类对社会制度永远只能在两利相权取其大，两害相权取其轻之间作选择。尽管历史上历来善行与恶行连绵不已，但是他所见到的二十世纪是历史上集大恶与大善之大成的世纪。一方面是极权专制空前规模地残害人类的罪行，一方面是正义得到伸张，人权得到提高，民主得到推广，同样规模空前的世纪。人类毕竟在进步，他愿以民主价值确立为全球价值来祝福二十一世纪。¹¹⁹

¹¹⁷ 李慎之：《自由主义传统在中国的发轫和复兴》www.sinoliberal.net/lishenzhi/lisz2003043409

¹¹⁸ 全球化与全球价值 www.sinoliberal.net/lishenzhi

¹¹⁹ 李慎之：《全球化有赖于全球价值的确立》www.chinaaffairs.org/gb/detail.asp?id=34133

（二）、“制度民主化”与“子民公民化”

制度的现代化与人的现代化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两个方面。从世界各国政治民主化的进程和基本历史经验来说，通常是少数“先知先觉”先形成了自由民主思想，然后对朝野进行民主启蒙并推进制度上的民主变革。全民性的公民意识和民主意识往往是进行民主启蒙，政治民主化的成果而不是政治民主化的前提。原因也很简单，对于芸芸众生而言，专制主义政治所造就的，是充满奴性的臣民或子民，自由民主政治所造就的才是独立自主的公民。不过，在中国这种后发民主化的国家完全可以借鉴先进国家的经验，在推进政治民主化的同时大力推进公民意识，以增强政治民主化的内在动力，基于这种认识，李慎之在晚年对公民教育极为重视，他认为，中国要赶上先进国家，要实行现代化，最重要的就是解放被专制主义所扭曲了的人性，发扬每一个人的本真人性。换言之，就是要培养人的公民意识，使在中国大地上因循守旧生活了几千年的中国人成为有现代意识的公民，有人的觉悟的公民，成为一个一个独立的、自由的、能主动追求自己的幸福、创造物质财富与精神文明的公民。

从不随地吐痰、不乱抛果皮纸屑到坐公交车要礼让老弱妇孺，都是公民课最起码的内容，一直到懂得什么是政党制度、文官制度，懂得什么是对权力的制约平衡，什么是司法独立，懂得什么是市场经济、法治国家、宪政国家，懂得以法律保护自己的权利和权益。

为什么中国的现代化一百年来成就不大，以致被称为“九死一生的中国现代化？”第一个原因就在于中国始终没有能培养出够格的现代化公民。没有能培养出不但能自尊而且能自律、不但能自强而且能自胜的独立自主的个人，没有能培养出既能伸张自己的权利、也能担当自己的责任的独立自主的个人。

公民教育实在是刻不容缓的事情。实际上这也是四个现代化以外的更重要的“人的现代化”。它不但为四个现代化提供前提，也是为四个现代化设立目标。

李慎之甚至还放言，如果一个人真的还有下一辈子的话，那么，他的最大志愿就是能在下一辈子当一辈子的中学公民教员。他想编一套12册（备6年12个学期用）的中学公民课本。分两个层次：头6册是供初中用的，也就是每个上九年义务教育的人的必读课本；后6册是供高中用的，也就是有条件上高中的人的必读课本。有循环加深的特点。只是年已老迈，心有余而力不足。在我们这个国家，要养成十来亿人民的公民意识，即使现在马上着手，也至少得要五十年到一百年才能赶上先进国家。

李慎之先生更深感“千差距、万差距，缺乏公民意识，是中国与先进国家最大的差距”，因而衰年发心，致力中国公民教育。“他的一生，可以说是时时都在为唤起人们的公民意识而努力。可惜，慎之先生走了，中国失去了一个最优秀的公民老师！”¹²¹

大概是1999年8月，慎之从美国归来，立即找李郁询问公民教育进展情况，得知已有人着手开始公民教材的准备工作，感到极大的安慰。

当年国民党掌权的时候，认为中国人民的素质太低，实行不了民主；而共产党的反论则是，要学会游泳只有跳到水里去才能学会，不实行民主，人民的素质永远不会提高。奇妙的是半个多世纪过去，国民党的论点现在成了共产党的论点，而大批的知识分子，从当年的国民党人和党外人士到今天的共产党人和党外人士，虽然身份变了一个个儿，但是论点却完全一致，都是认为中国人素质太低，短期内不能实行民主。这个观点是康梁以来的中国知识分子的百年痼疾，中国要有前途，必须打破这个只能引人走入死胡同而且永远转不出来的论点，历史是人干出来的，不是抠书本，讲死道理抠出来的。¹²²

（三）、“创旧”：回到“五四”、重新启蒙

李慎之于耄耋之年义无反顾地举起自由主义这面大旗，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勇敢地“创旧”，追求原本意义上的自由主义。而李慎之的原创性的意义，恰恰就在于他不是赶时髦去“创新”，而是“创旧”，追求原汁原味的西方自由主义和中国本土经验的完美结合。¹²³

李慎之认为，中国要否定专制主义只有两条路：一条是制度的改革，一条是进行启蒙教育。前一条如果机缘凑巧也许可以速成。后一条则必然是一个长期的耐心的过程，要急也是急不得的。超越体制给定的思想高度，寻求在妥协中进步的新思路，慢慢的着急，避免革命和非理性的社会动荡。

如果机缘凑巧中国能够迅速民主化了，可以预言那个民主大概也是很不如人意的民主。然而我们只能以此为起点，认认真真地进行公民教育，既是大刀阔斧地也是一点一滴地剔除中国人灵魂里的专制主义的毒素，使中国的民主逐步健全起来，正规起

¹²⁰ 李慎之：《修改宪法与公民教育》www.chinaaffairs.org/gb/detail.asp?id=10527

¹²¹ 何家栋：《未了的心愿——怀念慎之》www.china-village.org/ReadNews.asp

¹²² 李慎之：《中国文化传统与现代化——兼论中国的专制主义》www.zijin.net/get/zl/zl5/2005_08_19

¹²³ 冯崇义：《李慎之：冲决专制主义传统的中共党内自由派领袖》，思想评论网站 www.sinoliberal.com

来，再在大体上实现了民主，亦即人民已取得了基本自由的条件下，完成完全的法治。¹²⁴

为此，李慎之多次强调，所谓“超越五四”是荒谬的，必须回到“五四”、重新启蒙。进行持久的公民教育，培育出一个符合民主化要求的公民社会。

需要指出的是，今日中国之现状是“民智初开，官智未启”，启蒙的主要任务是启中国执政党之蒙。中国民主化的主要障碍，既不是中国民众的民主觉悟不高，也不是中国民众不懂得实践民主，而是中国执政党垄断政治权力、阻止中国民众享受正常的自由民主权利。只有以自由民主思想启执政党及党国官员之蒙，这样的启蒙才是对症下药。否则，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继续弘扬奴役人类心智的马列主义（更确切的解读是“斯大林主义”或“毛泽东主义”）歪理，便会象几十年来的实践所证明的那样，越“启”越“蒙”。

就党国当代主要领导人的成长历程而言，因为时代造成的价值观念和知识结构方面的严重缺陷，他们对毛泽东的认识非常肤浅，他们在执政中所体现出来的“毛泽东情结”表明他们对自己作为“党文化”的牺牲品这一事实尚未有大彻大悟。胡锦涛等人较早进入中共高层，有机会接触最高层次的内部文献，对毛泽东及中共党史的了解应该不至于停留在当时教科书的水平，就像苏共高层领导人都不会轻信斯大林钦定的《联共（布）简明历史教程》一样。但是，胡锦涛这一代党国领导，很有可能在思想上已定格为斯大林主义和毛泽东主义的牺牲品而无力自拔。与胡锦涛同属一代人的学界领袖李泽厚认为，在辛亥的一代、五四的一代、大革命的一代、“三八式”的一代、解放的一代和红卫兵的一代这六代中国知识分子中，“解放的一代”最为不堪，以“虔诚驯服”为典型特征而最缺乏原创精神和气魄。¹²⁵

这一代人根深蒂固的“毛泽东情结”来源于他们在 1950 年代思想成型期所接受和定格的斯大林主义和毛泽东主义思维逻辑。这种思维逻辑的主要物件包括：马列主义是人类最先进的意识形态，毛泽东是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实践完美结合起来的光辉典范，党国社会主义是“历史的选择”，毛泽东是在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建立了丰功伟绩的一代伟人。但这种思维逻辑早就被“党国社会主义”的实践

¹²⁴ 李慎之：《中国文化传统与现代化——兼论中国的专制主义》，《战略与管理》，2000年第4期

¹²⁵ 李泽厚：《中国近代思想史论》，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70-471页。李泽厚本人就属于这一代（中央现主要领导人基本上属于这一代），对这一代人价值观念和知识结构方面的严重缺陷，深有体会。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以富有批判精神自诩的李泽厚，也未能跳出历史唯物主义教条的窠臼泥坑。

和吞噬几千万条人命的试验推翻了，只是部分党国领导人还没有机会接受新的知识来更新他们原有的思想定格、中“马毒”太深的人们还执迷不悟。

平心而论，中共通过一场颇得民心的革命而得天下，中国民众在一定时期里默认了中共政权的合法性。但是，“无数革命先烈的鲜血”所换来的是党国领导人及那些得宠的积极分子的江山，而并不就是人民大众的江山。时至今日，共产主义党国体制的荒谬性已被所有奉行这种体制的所有国家的实践所证明，而且这种体制也已在全球范围内土崩瓦解。因为历史的机缘而暂时还侥幸生存下来的共产主义党国，对自身政权的合法性已经不能自圆其说，而且受到公民权利意识日益觉醒的民众的严峻挑战。

中共近期提出的“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口号，试图以此来维护自身的所谓“先进性”。早年信奉“天下为公”的孙中山后来也转向“立党为公”，一再强调立党与立国的一致性：“吾人立党，即为未来国家之雏形”。¹²⁶“一切军国庶政，悉由本党完全负责。”¹²⁷“本党一面以保姆的资格，培养社会的元气；一面以导师的资格，训练人民的政治能力”。¹²⁸现代中国的党国体制就是由此而立，并在1949年后被转变为最极端的形式，给国人和中国社会带来无穷祸害。

在现代文明的视野内，政党是一群人为竞选政权而组成的政治组织。在“家天下”的时代，中国“古圣先贤”献给主子们的权谋秘计是“唯名器不可以与人”，需将国家权力掠为一己之有。到了现代，国家权力才成为社会公器，任何人都不能将之据为私有。各路英豪想要在社会公域内获得国家权力这种社会公器，就必须拉帮结党去与其他党派竞一高低。只有通过竞选获选民授权产生的政府才是真正合法的政府，也只有通过竞选才能产生真正合法的“执政党”。中国那八个“民主党派”，依附臣服于一个强党，而不以争取“执政党”地位为目标，因而在国人和世人的眼中，他们非但不“民主”，连“党”也不是。中国共产党建立党国体制，以党代国，至今仍将国家权力这一社会公器掠为一己之私，因而也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政党，而是现代政党的一种可怕变种。

中国的当务之急或“中国问题”的关键，与其说是立党为了什么，不如说是党应“立”在怎么样的位置上。我们的先辈付出巨大的牺牲才打破了“家天下”，但未有足够的时机和耐心来进行民主政治的试验，就在张张皇皇之中被邪念引入了一党专政的“党天下”的迷途，实是吾国吾民之大不幸。时至今日，如果还没有觉悟到今是

¹²⁶ 孙中山《致金一清函》，《孙中山全集》第三卷，中华书局1984年版。

¹²⁷ 孙中山《中国国民党总章》，《孙中山全集》第五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

¹²⁸ 孙中山《在黄埔军官学校的告别演说》，《孙中山全集》第十一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

昨非迷途知返，没有将中国共产党从“专政党”转变为现代意义上的“执政党”，继续维持早就过时的党国体制，中国的“立党”和“立国”便只是在落后的老圈子内折腾打转。

在2003年1月中共十六大上，时年85岁高龄的李锐前辈就在一定范围内咨询了资深同仁之后以上书言事的方式向党国领导大声疾呼：中国的最大隐患是民主滞后、法治难张、专制腐败之风盛行；中国未来的发展，“关键还在改革不合时宜的旧政治体制，加快民主政治建设，使国家真正走上民主化、科学化、法治化的长治久安之道”。为此，李锐前辈还对“党的民主化”和“国家民主化”提出了十条切实可行的具体建议¹²⁹。李锐等前辈是历尽劫波硕果仅存的国宝级人物，他们倡导的新启蒙，至关重要。极为遗憾的是，宝贵的几年又过去了，党国领导对李锐、李慎之、任仲夷等前辈披肝沥胆的肺腑之言依旧无动于衷，在长年形成的政治惰性中继续维持着过时落伍的极权政治体制。

（四）“全球化”与“民主化”

李慎之意识到，要铲除深入中国人骨髓的专制主义，要让自由主义思想在中国生根立足，就要大力倡导“全球化”与“民主化”，就必须挫一挫国人妄自尊大的“虚骄之气”。他在《和平奋斗兴中国》一文中说：中国向来缺少西式民族主义，而有东方式的天下主义。中国近代民族主义两大目标“反满”、“反帝”已经通过辛亥革命和抗日战争完全实现了，“不料，到二十世纪下半期，中国的民族主义却有了一个新的转向。由在世界的东方四征不庭、万国来朝的天朝上国情结发展出一个‘世界革命的情结’。……中国历史上是东亚的大帝国，几千年一直是世界第一大国，形成了中国人一有点条件就不甘屈居人下的心理，我称之为虚骄之气。由于这个原因，中国往往叫人害怕。”¹³⁰

对于“全球化”和“民主化”，中共及多数国人确存有太多的偏见误解和抵触情绪，常常将之作为“全盘西化”论来围剿和批判。冯崇义的《“全盘西化”辩》对这种蛮横的围剿和批判给予有力的反驳和痛斥——

党国素来以实行政治和意识形态的高度一元化著称于世，但在反对西方特别是“美国霸权”的时候又高高地举起多元文化的旗帜；党国领导们信誓旦旦要“与时俱进”，但对早就被时代抛弃的党国体制又死死抱着不放；最高党国当局将“民主法

¹²⁹ 李锐《关于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建议》，《炎黄春秋》2003年第1期。

¹³⁰ 李慎之在《和平奋斗兴中国》www.chinaelections.org/readnews.asp?newsid

治”定为“和谐社会”的首要目标，但对经过反复实践检验的民主宪政这一“民主法治”唯一有效的模式又欲迎还拒；朝野上下都热衷于“按国际惯例办事”，却又处处强调特殊国情中国特色；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参加国际大循环和经济全球化等方面取得了巨大进展，而在政治方面又顽固不化地抵制民主化的世界潮流。诸如此类的思想混乱，从知识和思想根源上说，起源于党国体制来到世间所伴生的那类带有明显偏见的思维逻辑、价值观念、知识结构和信息渠道。

历史事实证实的是，晚清以来落伍的中国统治者，一直依照中国的“国情”对中西文化进行选择取舍。“国情”只不过是他们口中的遁词和手中的玩物，凡是不符合他们的偏见和特权的东西都可能被宣布为“不符合中国国情”而进行封杀，结果是无一例外地依照他们的特权和偏见来选择能够满足其统治需要的“文化”，排斥和封杀那些对统治者的特权有威胁的思想和制度。实际上，很多异质的、本来与“中国国情”或“中国固有文化”格格不入的文化，只要不直接威胁统治者的特权和统治地位，也都为中国的统治者所宽容或接纳，比如佛教、伊斯兰教与基督教。唯有自由民主的思想和制度，因为直接威胁专制主义的统治而被统治者千方百计拒之门外。

中国的“全盘西化”与反对“全盘西化”之争，落到实处便是自由民主与反自由民主之争，焦点是中国应否移植已在西方反复证明行之有效的、对整个人类带来无限福祉的代议制民主宪政这一现代政治制度。近代以来中国那些竭力反对“全盘西化”的政权及其帮闲们真正反对的，正是自由民主理念及其相应的制度。此外其它方面，从生产方式到生活方式，他们对“西化”可谓趋之若鹜。蒋介石国民党在疯狂地反对“全盘西化”的时候就不遗余力地追求西方的洋枪洋炮、洋教洋文、以及西洋的法西斯主义。中国共产党当年在野的时候，主要攻击对象是国民党的“国情特殊”论，而非“全盘西化”论。只是中共在朝多年之后，才翻过脸来与当年的国民党一样高唱中国“国情特殊”。其实，中国共产党人反对“全盘西化”的资格就很成问题，因为中共的宗旨正是用马列主义这一洋术来全面改造中国。

对于外来文化，我们一直重复着只要“精华”不要“糟粕”的陈词滥调，而不去追问何以学到的往往是“糟粕”而不是“精华”。其实，中国主张西化的人士并不反对中国传统的道德修养，而是实践中国传统美德的典范。中国人的传统道德有很多可圈可点、足可传诸万世的内容。例如，成型于文化至为灿烂的春秋战国时期的士大夫人生观，就有一些万古不朽的高贵品质，应当在全人类文化中焕发光芒。中国士人追求“内在超越”的人生信仰最为宝贵，人生的不朽不必到彼岸世界去追求、不必依靠

神的启示与拯救，而只要在人世间立德、立功、立言，便能在此岸世界实现不朽，永远活在现世的人和后代人的心中；这种人生追求也激励人们对人生永远保持积极的态度，致力于参透天道人事、建功立业、化育万物；而且因为追求永远活在世人与后人心中，这种人生观还特别注重个人的修养，培养出一代又一代仁人志士、和李慎之这样的谦谦君子。关键在于，在自由民主这一绝对必要的制度平台建立之前，中国公民选择“精华”的权利和机会被统治者剥夺了。选择的主体既是官府而非公民，而且是没有经过合法程序产生的官府，所选择的就难免是有利于维持过时统治方式的“糟粕”，而不是真正利国利民的“精华”。这样说来，国人对自由民主选择，就不仅仅是因为自由民主本身就是“精华”，而且还因为自由民主是国人能够从容地选择“精华”的必要平台。中国落后的原因，正因为缺乏这一必要平台极大地局限了中华民族近代以来的创造能力，而绝非我种之不逮。¹³¹

“中国特色”、“国情”论、“多元文化”论多年来常常被党国用来作为抵御民主化的借口，作为保护落后的政治制度或落后的生活方式的救命稻草，作为压制自由民主的遮羞布。但平心而论，目前中国官方所津津乐道的“中国特色”，实际上多是舶来之毒品。吾国现行政治上的党国体制、极权/后极权制度就是“以俄为师”引进之物，因为加上中国专制主义文化的支援而毒性更大并更显“民族特色”；经济领域的“权贵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则是不成熟的市场经济和党国官权相结合的怪胎，因参杂着封建特权而比西方早期资本主义有更多的弊端祸害。这种连自由竞争、公平交易等基本规则都无法满足的“市场经济”和党国体制，已经成为中华民族进步和发展的主要障碍，早就该被已在西方实践成熟的真正意义上的市场经济及民主制度安排所取代。而吾国官方话语中的所谓“资产阶级自由化”又恰恰是中国最迫切需要的政治民主化“精华”，正是迄今为止人类最先进的政治文明成果。

针对邓小平曾经讲过中国“不搞三权分立那一套”，中国改革开放时代最杰出的封疆大吏、曾领导广东在改革开放中“先行一步”的任仲夷前不久以九秩之躯向党国新领导建言：“我们对任何人都不能搞‘两个凡是’！西方国家几百年的实践已证明，‘三权分立’对制约全力遏制腐败非常有效。就象市场经济能有效配置资源一样，这是人类创造的管理国家、管理社会的有效工具，是人类创造的政治文明，不应是资本主义的专利。”¹³² 在当今的全球化信息时代，李慎之等有识之士大声疾呼

¹³¹ 参阅冯崇义《“全盘西化”辩》，《当代中国研究》，2005年第2期，第81-93页

¹³² 《任仲夷谈邓小平与广东改革开放》，《同舟共进》2004年第8期，第14页

“全球化”与“民主化”，显然并不是要否定属于非政治制度领域的私人行为规范、道德修养的民族性，而是要在制度化的行为规范方面使中国早日突破专制极权主义的重围，与文明世界接轨实现全球一体化。

三、重新点燃理想的火炬

（一）、必须重燃理想之火

后极权社会是只有利益算计没有理想的“犬儒”社会。后极权社会的政治权力结构仍是自封式的、无需也不准论证合法与否的“法外”极权权力结构的延续。后极权当权者自知真理不在自己手上，于是从邓大人始就集体学练政治“瑜伽”功，身段渐软。“不争论”、“不当头”、“不称霸”……什么都可“软”下来，只有“万般软中一点硬”——党控制政治话语权（主旋律）的“巨无霸”地位“软”不得；在总结和借鉴东欧等国各极权政权倒台的前车之鉴后，“成熟”起来的后极权中国当权者一方面拼命吸纳外资师夷长技来发展经济（多产萝卜），另一方面牢牢控制政治话语权不放松（紧握大棒）。后极权当权者明白到只有经济得以持续发展，才能在一定范围内封住抱怨和异议者之口。于是发展经济和“利诱精英”就成了后极权当权者支撑自身以续“霸”其合法性稀薄和脆弱的执政权的主要（也是最后）手段。

在“熙熙攘攘，皆为利忙”的后极权社会，勇于追问真理、保有理想情怀者就寥寥无几、难能可贵。由此，我们能领悟到“老时醒”的李慎之为何再三呼吁“必须重燃理想之火”。

丁东有一段评李锐的话也正适合评李慎之：进入新的千年，民主宪政仍然是中国人尚未完成的梦想。为此奋斗的先行者们有的因为自然规律，凋谢了；有的因为各种原因，沉寂了。88岁的李锐，就成为中国大陆为民主宪政奋斗时间最长、资格最老、声望最高的代表人物。对于李锐来说，民众有疾苦，他不愿意闭上眼睛。国家的治理有偏差，他不愿意置若罔闻。

“关怀莫过朝中事，袖手难为壁上观”。这是李锐家客厅中挂的一幅对联，也是他人生态度的写照。他不同于一些离退休的政治人物，颐养天年，再不问政；也不是颐养为主，偶尔发言。他就是要始终不渝地想方设法启动政治改革，生命不息，奋斗不止。在中国官场普遍失去信仰，追逐私利，日趋腐败；中国知识界主流精神矮化，

畏于关怀公共事务的今天，李老尤其显得可贵。¹³³

目睹中国官场普遍失去信仰，追逐私利，日趋腐败；执掌朝纲的一些党国领导人由于知识结构、治国理念及道德魄力等方面的严重缺陷，无愿或无力举起理想的火炬，在保权和保位的褊狭私心和惰性之中“不争论”是非对错；中国知识界主流精神矮化，畏于关怀公共事务；小责任的大政府在“跛足”经济改革中为使民众不追究其政权来源的合法性而不惜放任道德败坏、精神坠落……李慎之忧心如焚、痛心疾首。

李慎之在悼念温济泽时回忆说：

温老对党的感情是特别深的，他编《中化英烈》杂志，编《革命烈士传》，致力于为王实味和其他许多人平反，为瞿秋白恢复名誉，亲自编出了十四卷的《瞿秋白文集》，这些都是世人看得到的业绩。鲁迅说：“一个人如果还有友情，那么收存亡友遗文真如捏着一团火，常要觉得寝食不安，企图给他流布的。”温老就是这样一个人。可悲的是，这样血性、这样厚道的人，在中国已越来越少了。

“我们经历过的事情太多了。有些话，我们不说谁说？还是要说啊！”（温老这句话，大概是深印在我脑子里的最后一句话了。他是实践了自己诺言的，虽然他要说的话也还没有完。我也算是努力追随他的榜样的，虽然我知道今天的、明天的青年人未必会看重我们的话。但是它总是代表了中国传统中“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一点精神。沧桑变易，这点精神总是不会磨灭的。¹³⁴ 实现民主宪政的大转型，是中华民族实现现代化、从而跻身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的最后一道门槛。近代以来命运多舛的中华民族，曾几度与跨越这一门槛的历史机会失之交臂。在此全球化及民主化大潮汹涌澎湃、和平发展凯歌高奏的大时代，历史及我们的智慧都不允许我们再次错失良机。为此，李慎之才“老年犹作少年狂”，才大声疾呼“必须重燃理想和启蒙之火”。

需要强调的是，我们今天需要的理想不是公共领域中的高调单一的理想，而主要是私人领域中体现个人权利的理想。刘军宁《理想之敌，理想之友》一文中说：“顾准在思想上的独特贡献在于他无畏地撕下长期蒙蔽着世人的理想主义面具，把理想从特权变成了每个人的平等权利，从而为理想在现代社会中找到了一个正确的定位。在不平等的时代，拥有理想是统治者的特权，服从这一理想是臣民们不可推卸的义务，因为在这个社会中只允许存在这一个理想。平等的时代首先体现在人与人之间的人格

¹³³ 丁东：《大哉李锐》编后记 www.observechina.com/info/artshow.asp?ID=33262

¹³⁴ 李慎之：一个老派共产党员——悼念温济泽同志 www.chinaelections.org/readnews.asp?newsid

上的平等、价值上的平等、权利上的平等，进而是追求信仰和理想的权利上的平等。在平等的时代，理想是可以由所有人共享的平等权利。

理想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正确定位与公私两个领域的分离是联系在一起的。在这个世界上存在着两个截然不同的领域，一个是公共领域，一个是私人领域。追求理想既然是个人的权利，就理所当然地属于私人事务，属于个人自主自治的领域。单一的理想只能是少数统治者的理想，并且常常是用公共权力乃至暴力支撑的理想。当单一的理想取代个人的理想的时候，便造成公共权力对私人事务的无端干预。当由个人自治的领域的完整性难以维持时，个人的人格完整也就难以把守了。单一的高调理想也就必然要否定、取代属于私人领域的个人理想。正是在高调理想的惊涛骇浪中，顾准用自己的生命孤独而艰难地守护着自己的理想风帆。

那么，理想主义在现代社会中是否还占有一席之地呢？顾准并不是一切理想主义的敌人，他否定的只是公共领域中的高调理想主义。他勇敢地在私人事务的领域中插上了理想主义的旗帜，并且始终无畏地捍卫着属于个人的理想。”¹³⁵

胡平的《犬儒病——当代中国的精神危机》谈到：“犬儒”是后极权社会的典型特点：权力依然主使社会，但所有的理想、原则、道义统统放弃，人唯利是图。“犬儒病”标志极权社会已经进入晚期。“早期的犬儒是极其严肃的”，他们愤世嫉俗，是激烈的社会批评家，极端的理想者；但后来，犬儒转为玩世不恭，成为彻底的非理想者。前者是理想的、原则的；后者是非理想的、功利的。

胡平指出：极权和犬儒主义相互依存，后者是前者的结果，但同时也维持了前者的统治——犬儒主义提供了极权国家今天的稳定”。极权统治靠人们的狂热而建立，通过大规模的恐怖而得以巩固，最后是靠人们的消沉与冷漠，极权统治才得以维系。极权制度消灭人心，犬儒就是人心的消灭。“我们要拨开灰烬，让人心重新燃烧。”¹³⁶

极权当权者曾借高调理想主义来行强制之恶，进入后极权社会的今天又通过放纵犬儒主义来维护自己垄断权力的合法性。在犬儒主义大行其道的当今，李慎之秉承“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一中国知识分子的入世传统，从“坐而思”到“起而行”逆其道而大声疾呼“必须重燃理想和启蒙之火”，这是何等可贵的理想境界。

（二）一个真正的理想主义者

在自由秩序中做自由主义者，低调律人，亦低调律己可也。在非自由状态下做社

¹³⁵ 刘军宁《理想之敌 理想之友》www.sinoliberal.net/jnliu/th992023.

¹³⁶ 胡平《犬儒病——当代中国的精神危机》<http://www.observechina.net/info/artshow.asp?ID=36049>

会主义抗争者，可能需要高调律己、高调律人——以道德感召与纪律约束双管齐下来组织运动。而在非自由状态下做“社会主义主子”，完全可以低调律己，高调律人——“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惟独在非自由状态下做自由主义者，高调律己、低调律人恐怕是必备的品格。无论古今中外，低调律己高调律人的暴君与伪善者都不乏其人，而低调律己低调律人的“嬉皮士自由派”与高调律己高调律人的英雄也不难找。但是，高调律己低调律人的人的确是少而又少。¹³⁷

李慎之就是这样一个人“少而又少”的真正的理想主义者。

对中共领导层来说，要在晚年完成从马克思主义者向自由主义者转变，要从禁锢了几十年的思想中走出、并毅然拥抱一种新的思想，确是万分艰难。绝大部分中共领导人，不是为权力所害，就是为惰力所害。为权力所害者，或任由“屁股决定脑袋”，或无奈地滑入再无崇高信念的犬儒主义泥潭。

马克思主义通过几十年的宏伟实验而遭受失败，涉及几十亿人的生活和生命，对整个人类来说可谓痛深创巨。上层建筑“决定”经济基础和人类生活的威力，莫过于此。吸引千百万热血青年的共产主义运动最初的种种美好约言在实践中走向了它们的对立面，真诚信徒的美好理想破灭了。但那些识时务的当权者们背叛了自己的理想而心安理得当新权贵，或者在经历种种磨难之后知趣地按灭了心中的理想之光。

李慎之则晚年犹作少年狂，重新点燃造福人类的理想之炬、揭橥自由主义的旗帜向专制主义宣战。他既有底气十足的自信，但也没有掩饰他自觉道孤势寡的苍凉。这种孤独与苍凉，正好显示出他傲立于犬儒主义污泥之上的独特价值。

肖雪慧这样论真正的理想主义者李慎之先生：

有着超越自身利害之追求的理想主义者现今已经非常稀缺了，但这种追求曾经在好几代人胸中激荡，特别在外部强敌压境内政混乱腐败的时期，它曾使许多人为了追寻心中的光明舍弃了舒适、安定而以身赴险。在人们寻求走出黑暗和混沌的光明之路时，以思想的先进性和救国救民的主张相标榜，以自由民主的未来为许诺的没有谁能一贯正确，真正的勇者不在於曾经有没有被愚弄，不在於有没有在追求理想的过程中曾经误把谬误当真理，而在於意识到真相后有没有勇气去面对。许多当年的理想主义者并非意识不到受了愚弄，甚至并非意识不到自己对共产运动的全身心投入对后来的现状负有责任，但他们把自己的全部梦想、全部人生价值都系在这个运动上，已经丧

¹³⁷ 秦晖：《自由主义的理论与实践》真话文论周刊 www.zhenhuanet.com 第三十六期

失了正视真相的勇气，宁可陷於理智和情感的冲突而不能自拔，宁可在“革命光荣历史”的自欺中回避真实，也不肯对自己以及那场与自己的人生紧紧纠结在一起的运动作重新认识。至於那些理想早已随着权力带来的既得利益异化、蜕变的人，就根本不是什麼正不正视真相的问题，而是心安理得加入了掩盖真相并用谎言冒充真理的既得利益集团。

在当年那一批理想主义者中，只有很小一部分以非凡的勇气终身坚持独立的思考和言说，无论是残酷的整肃还是位居高官的好处都不能使之放弃；他们为了追寻真理而在不断反省中探索向前，在勇敢地否定该否定的过去中实现自我的超越。李慎之先生是他们的杰出代表。

终身追寻光明的李慎之先生，在晚年唱出了一个理想主义者最美的天鹅之歌。他留给我们的不仅是一个真理探索者的思想遗产，更是一个光明追求者勇于面对最残酷真相的精神和人格遗产。¹³⁸

在刚刚过去的五四运动八十六周年纪念日，青年时代就投身共产党的几位老人沉痛地写道：“完成民主革命是一个相当长期的历史阶段，它不需要采取暴力的形式，但这有赖于政治家和广大民众的观念更新。目前人们对民主革命普遍缺乏正确的认识，主要是因为意识形态上存在着两个与民主革命格格不入的传统观念。一是已经积累两千余年的专制主义和奴隶主义，一是几十年来在斯大林主义的教谕陶下形成的错误的社会主义观。因此，要推进民主革命，首先需要人们在观念形态上有一个根本的转变。为了凝聚全民的力量来完成这一历史任务，有必要在可以预见的时期内，开展一场新的思想启蒙运动。在这个运动中，既要启自由民主、个性解放之蒙，清除人们在观念形态上的专制主义和奴隶主义；也要启马克思主义之蒙，使广大民众，特别是党政干部，从斯大林主义的思想牢笼里解放出来。在这个新的启蒙运动中，每个具有独立见解的公民，都应当有尽情驰骋的广阔天地。所有马克思主义者、社会民主主义者、自由主义者、保守主义者、以及志在复兴儒学的思想家，都应当有足够的机会，来阐述自己的学术观点和政治理念，各是其是，各非其非。在全面的充分的宣传和辩论中，探索社会发展的最佳途径，熔铸完成民主革命的利器。中华民族只有经历一次比“五四运动”更加广泛更加深入的思想启蒙运动，为完成民主革命准备雄厚的丰富的思想资源，才能把民主革命进行到底。

¹³⁸ 肖雪慧：《一个真正的理想主义者 ——纪念李慎之先生》
www.sinoliberal.net/lishenzhi/lisz2003051202.

我们在青年时代都曾投身民主革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建立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中国’而奋斗。建国以后，经过五十多年的曲折道路，在我们白发苍苍的垂暮之年，才遗憾无穷地发现，我们仍然面临着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任务。这使我们感到痛心，也感到沉重的责任。我们希望，一百多年来追求宪政中华的志士仁人的愿望不致落空，‘五四运动’以来为民主革命英勇牺牲的先驱者的热血不会白流。中华民族迫切需要新的思想启蒙运动，需要把民主革命进行到底。我们热切地希望，一切有远见的政治家和有识之士，都能认清这个历史趋势，顺应历史的召唤，为推进新启蒙运动，把民主革命进行到底，作出自己的贡献。”¹³⁹

这是几位饱经风霜的智者向国人特别是党国领导发出的泣血忠告。

¹³⁹ 李锐 杜光 李普 胡绩伟 张定《发扬“五四”精神，把民主革命进行到底》燕南网站 |www.yannan.cn/ 2005-05-05 01:49:13

第五章 李慎之现象引发的思考与争议

一、纪念李慎之的文集和研讨会

(一) 《怀念李慎之》两册和《李慎之文选》三册

(1) 《怀念李慎之》上下两册

二零零三年四月，李慎之在北京逝世。中国境内外思想界人士纷纷发表悼念文章，除来不及收集的文章外，仅丁东主编的《怀念李慎之》上下两册的纪念文章就近一百五十篇。一位退休老人受到民间这样的重视为多年来中国所仅见，王若望、王若水、吴祖光等异见人士去世时都没有享此殊荣。饶有意味的是，多如牛毛的中国出版社，竟无一家能够出版该文集，文集最后是以作者各掏腰包，并以无出版号“谨作纪念，概不出售”的方式印刷出版。丁东在《怀念李慎之》编后记中，详细介绍了编这本书的动机、目的和有关情况：

今年4月中旬，我去重庆参加纪念卢作孚110周年学术会。17日上午，我准备返回北京，临行前笑蜀告诉我，听说李慎之先生病重，也许你回去还能见他一面。当天我返回北京，便向朋友们打电话询问。他们说，慎之先生已经不能说话，大限恐怕就在这两天了。去医院也不能探视。接着，上海学者许纪霖代表世纪中国网站给我来电话，如果李先生去世，希望我能以最快的速度，组织几篇悼文，在其网站发表。20日，我和段跃通电话，她说，先生的情况稳定一些了。正当我要把悬着的心放下来的时候，22日中午，接到了谢泳的电话：李慎之先生上午10点零5分已经与世长辞。

于是，我给几位与李先生熟悉的朋友打电话，请他们在当天写出纪念文章。晚上九点钟以前，谢泳、崔卫平、雷颐、王焱、朱光烈、余世存、徐友渔七人的文章已经通过电子邮件传到了我的信箱。我加上自己写的一篇，当即转给许纪霖委托的网站编辑吴冠军。第二天早上，我又收到秦晖、朱学勤各一篇，再次传去。由于当时正是北京流行非典的高峰期，该网站没有技术人员值班，文章直到傍晚才在网上公布。当天，其他网站也出现了悼念李先生的文字。此时，秋风的个人网站“思想评论”表现出更高的热情。到24日，已经辟出专栏，将二十多篇悼念文字集中地展示出来，成为反应此事最集中最迅捷的媒体。这时，我意识到，慎公去世，很多人有话要说，有感情要表达。非典肆虐，人心惶惶，北京几乎所有的集会都取消了。李锐老提议，我们就

写点文章吧。然而，悼念文章发到一些报社，大多都被卡住。有一家报纸编辑组织了两个版面，其中也包括我提供的文章，临到开印时被撤了稿子。

于是，我萌生了一个想法：以自愿集资、自愿供稿、义务工作的方式，编印一本内部交流的纪念文集。先给徐友渔去了一个电话，他十分赞同。又给余世存去电话，问自费印刷几百册书需要多少钱。他说一万元就差不多了。于是，我决定，邀请100位李先生的好友和认同他的人，每人出资100元，在一个月内完成文集的组稿，两个月内印出这本纪念文集。

我把这个想法与戴煌、孙长江、资中筠、蓝英年、许医农、马立诚、梁晓燕、段跃等在电话上沟通，他们都表示赞成，并答应帮助向慎之先生不同领域的朋友组稿。

在组稿过程中，秋风的思想评论网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一方面，他把我转去的悼念文章每天及时地公布出来，一方面，他在网页上征求稿件，并转载其他媒体的相关文章。在李先生去世一个月的时候，他的网站已经荟萃了各种纪念文字140篇之多。

本书的绝大部分作者都欣然出资百元，有的还出资更多。钱满素、杨团、龚育之、郑海天、程乃欣、郝建、王小鲁、于奇、梁晓燕、李杨、余皓明、朱利国等先生没有提交文章，也热心捐资，襄助此事。燕京大学校友会的张定先生安排，为校友准备300册纪念文集，校友会预先垫付印刷费6000元。这样，就保证了排版印刷文集的足够费用。郑海天、许医农、程乃欣、徐晓、崔卫平、张弘先生，为本书的编校印刷做了大量工作。段跃、李薛伟先生承担了本书的所有美术设计工作。李锐、朱厚泽、刘志琴、赵梅、王东成和摄影家李晓斌、黑明为本书提供了照片。所有这些支持，使得本书能够在较短的时间内印出。

5月11日，李先生生前供职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了遗体告别仪式，参加者约四五十人。当时我在现场的感觉是，单位印发的介绍文字，并未触及李先生的特殊历史作用；活动的规模，与中国知识界的心情也是不对称的。固然公家办事有自己的规矩；因为预防非典，缩小活动规模也是不得已。但如果不及时地用其他方式弥补，于世人，于时代，于历史，都是深深的缺憾。

在当代中国，可以称得上思想家的知识分子是极少的。而李慎之先生却是当之无愧的一位。他的去世，放在百年中国历史的长河里考察，可与上世纪30年代鲁迅去世、40年代蔡元培去世、60年代胡适去世相比。鲁迅、蔡元培、胡适去世的时候，后事办得十分郑重，无愧于先人，表明了彼时彼地中国人的文化自觉。如果我们不能在

李先生去世的时候留下应有的声音，而是像顾准那样留给后人去重新发现，那将会给当代中国知识界留下新的耻辱。当然，这种担心也是多余的。本书虽系内部交流，但作者却汇集了中国思想文化界的几代精英，上自望九之年的宿儒，下至二十出头的在校学生，人员来自天南地北、四海五洲，专业遍及文、史、哲、经、政乃至自然科学，可谓群贤毕至。具有如此历史含量和炽热真情的纪念文集，在我有限的阅读范围内，还没有见过。由此可见李慎之先生巨大的人格感召力，他的思想是不会被湮没的！从中也可窥见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内心觉悟和人心所向，李慎之先生虽然走了，但他点燃的启蒙火炬，在中国大地上是不会熄灭的！¹⁴⁰

（2）、香港明报出版社《李慎之文选》三册

2003年5月4日原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所所长、美国普林斯顿中国学社主席苏绍智在《九死不悔漫漫路——赞李慎之先生“反专制、争自由、争民主”的精神》一文中写道：

李慎之的“种种研究，其成果都凝聚在今年4月底由香港明报出版社出版的《风雨苍黄五十年——李慎之文选》一书中。这是迄今为止唯一的一本李慎之先生的专著。提起这本书，我与之有一定的因缘，当中还有一些曲折。如今慎之遽归道山，不能自己露布了，我应该说一说，以存史实，也让世人知道他的艰难处境。如前所述，慎之曾给自己规定过‘三不主义’，盛年不写文章。晚年著述虽丰，却又不结集成书。从他因‘风雨苍黄五十年’一文蜚声海内外而其后的文章一概被极权政权封杀，不得在国内出版时起，我开始设想要把他的文章收集起来，替他在海外出版一本文集。这个打算经过一年多的邮电商量，蒙他同意，文章也慢慢收集齐全；但他一直不愿意自己署名出版，要用笔名作为‘编者’‘编’一本他的文集，以免有关方面找他麻烦。他并称这是一个‘野本子’，至于‘正本子’留待日后由他自己来编。我们一直是按这个‘方针’工作着，我也用笔名写了‘编者前言’。在先后联系台港出版社的过程中，我曾几度写信向帮忙的朋友解释此事：‘我与慎之谊属知己，却不得不尔，可慨也夫！’‘我们两个老知识分子的区区不得已心情，请鉴察之’。一直到今年2月初订定出版合同前夕，需要慎之亲自签署一份给我的授权书时，我终于奉劝他还是自己署名出版为好，可以省却涉及出版法上的周折，也可免去许多‘别扭’现象。他倒爽快地答应了。这才删去‘编者’和‘编者前言’，改署‘李慎之著’，一路顺畅出

¹⁴⁰ 参阅北国之春网 www.beichun.com

版。读者捧读此书，当不会再有‘别扭’之感了。这一曲折过程，反映出中国知识分子处境的艰难和心情的压抑。它只会发生在扼杀人民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的专制统治之下，在民主制度下成长的人们是难以理解的。然而我辈感受深切，不知这种折磨何时得以不再在中国发生。¹⁴¹

2003年12月，香港明报出版社出版又出版《廿一世纪的忧思——李慎之文选》（续一）和《被革命吞吃掉的孩子——李慎之文选》（续二）出版社对二书作如下简介：

中共在野时，一再动员人民争民主、争自由、争司法独立、争直接选举，并信誓旦旦地承诺将建立一个民主、自由、富强的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但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建立，上述「历史的先声」墨迹未干，便被弃如废纸。新民主主义无疾而终，而人民民主专政实质上即无产阶级专政，也就是共产党一党专政。从此毛泽东一路抓阶级斗争，搞引蛇出洞，坦承自己是「马克思加秦始皇」，直到亲自发动和领导十年文革，实行「无产阶级全面专政」。

抚今追昔，青年时曾奔赴延安参加革命，中年时被打成「右派」，垂老之年因「六四」事件而声称「不在刺刀下做官」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李慎之先生近年来笔耕不辍，发表了一系列振聋发聩的文章。本书选编的是李慎之先生最具有代表性的篇章。他认为实行民主、发展民主，也就是使中国融入全球的主体价值体系，只有全球化、现代化、民主化三化合一，才是中国的出路，中国的前途。

（二书后面均附有“李慎之的子女”写的“后记”。在网络上搜索，这篇具有一定资料价值、有助于人们更好地了解李慎之的短文并未流传开，兹将其收录于此论文之后）

（二）、“李慎之和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命运”学术研讨会

2003年底，国内外专家学者在悉尼科技大学的会议室举行“李慎之和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命运”学术研讨会。这是中国自由主义者继2003年初聚谈宪政与中国话题之后第二次聚首悉尼。这次会议虽在李慎之的评价上见仁见智、评价不一，在展望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前景时却达成共识——重要的是尽快在更大范围内拓宽自由主义理念和实

¹⁴¹ 《九死不悔漫漫路》——赞李慎之先生“反专制、争自由、争民主”的精神《当代中国研究》2003年第2期

践在中国的进路。会议本身就是这种实践的组成部分，可惜自由主义在中国国内的空间有限，会议只好在异国他邦举行。

值得一提的是，在悉尼科技大学举行的二次会议经“出口转内销”，在国内产生了巨大影响。有国内网友戏称二次会议为“悉尼老鼠会”，个中原因是自从曾支持自由主义者聚会的企业界孙大午惹了“大麻烦”之后，大陆自由主义者聚会的阵地悄悄转移到了悉尼。

身居悉尼的笔者有幸参加了包括今年二月举行的历次“老鼠会”，下面是笔者在“李慎之和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命运”学术研讨会上及会前会后和一些与会学者的交流接触中得到的一些认识感想，兹作为对此次会议的介绍：

1、自由主义者反对不容反对

研讨会一开始就围绕着李慎之晚年思想遗产对转型中国将产生怎样的影响、历史将如何确定他的地位和作用等问题在激烈的针锋相对中拉开帷幕。

研讨会讨论的第一篇论文是仲维光的《李慎之先生的历史地位及其政治文化思想简析》。仲先生在论文提出李慎之一代人在协助建立党文化和极权统治上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我们这一代人的生存和精神困境一定程度是他们那一代人造成的。49年后只有陈寅恪极少数人站在共产政权和意识形态之外，精神上始终完全和共产党文化不相容。对于“在精神深处”并未和极权主义的政治和文化决裂的党内开明派李慎之的过高评价会成为“历史的笑柄”。冯崇义等人则认为，我们不必违言李慎之自由主义原创性理论建树之不足，但仲文责人过甚，理由主要是该文在方法论上有欠缺，诸如用绝对的学术标准来评判思想价值、用抽象的道德裁判代替对具体历史背景和历史人物的分析、行文过于情绪化和不恰当地使用全称判断等等。

徐友渔的论文从周扬和于光远两位党内较优秀的思想家无法突破马克思主义正统、陷于粗鄙毛泽东思想的罗网而不能自拔来反证李慎之从他那一代人单骑突进的开拓意义，尽管李慎之回归自由主义不过是回归自由主义的“常识常理”。徐友渔认为李慎之和一般党内民主派、与通常有正义感看不惯腐败和专制的人有深刻的区别。他在晚年已完成了从共产革命的信徒到自由主义者的转化。

徐友渔声明自己看重的不是李慎之的学术建树，而是批判现实，破除旧意识形态的彻底性，认为重要的是准确理解李慎之在当代中国政治变革中的作用。重要的不是他在古今中外学术坐标中的绝对位置，而是在当代中国思想解放运动中的相对地位。朱学勤完全赞同徐友渔的看法，特别强调李慎之利用他的特殊地位将自由主义置入中

国语境的功勋。

朱学勤就自己与李慎之的近距离交往和思想交流详尽介绍了李慎之晚年返宗自由主义的心路历程，同时指出从书斋学理与现实操作的不同角度对李先生的评价自然不同。

从开启国内学者与国外异见者的思想交流的先河到跨洋双方的握手直接交流，朱学勤与仲维光的思想交锋展示了自由主义者对反对的包容和尊重。

理论的争执并未引来不快反而导向沟通。崔卫平从人们难以摆脱习焉不察的旧语言来认可仲维光强调的知识结构和认知方法转换的艰难。而仲先生也承认对李慎之早年人道主义涵养有所忽略影响了某些方面对李慎之的准确把握。

多元并存本来就是自由主义的基本原则，而唯有反对而后有多元。诚如朱学勤强调：我们反对强制国民拥护的政府，我们拥护可以反对的政府。学术争论上也情同此理。

反对，是自由人的基本权利，严格来说，中国人尚未拥有这种基本权利。习惯反对，操练反对还须尽快开始。

2、后发国家与后发理论

出版《毛泽东执政春秋》大作的单少杰，会上会下对中共领袖人物的权斗和性格，对中国民众少有“认死理”和爱“搭便车”的滑头有许多精彩的论述。他的论文盛赞李慎之继承了以“勇”和“直”著称的“子路人格”。而他强调中国是后发国家难有前沿理论，我以为对于李慎之的评价颇有启迪新意。其实，有现成的理论可用，后发国家也大可不必再去发明创造自由主义理论。

自由秩序在当下中国远未建立，反自由势力仍然强大。在此种情势下过多谈论在世界上领先的学术价值实在有些过于奢侈。在了解人家的理论已如何“前卫”时，实不可忘记一些最基本的“后发理论”在大陆本土尚难以进入具体的操作。

王怡在提交的论文中认同刘军宁对李慎之的准确评价——普世价值的本土楷模。指出自由主义在中国至今未有完整的叙述和融入，正与单少杰后发理论说呼应。

奋力将普世价值在后发中国本土传播开，李慎之应是第一楷模。

关于后发国家与后发理论，另一未能到会的王毅在提交的论文中对李慎之多次论及的中国皇权主义作了较为详尽的论述，也从历史角度在理论上支撑了单少杰后发国家的后发理论说。

3、一个悖论带来的拷问

王怡因出国手续受阻未能到席，这或与他之前力倡“以民权对付极权”，并发起捍卫言论自由的签名有关。

送来的论文中王怡转述友人提出的悖论：一个人在专制主义时代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但他又平安无事，这怎么可能？要么他不是真正的自由主义者，要么他身处的社会并不是一个专制社会。以这一悖论，王怡提出尖刻的问题：我们是否在互惠共存中与极权专制“共谋”？我们是否有“原罪”？我们应如何得到拯救？

与此同时，王怡也认为，任何一个对大陆语境有所了解的人，都能理解不主动‘退党’的李先生无非是在晚年对自己家人部分既得权益的保守，对这种个人既得利益的保守加以藐视和否定，甚至因此贬低李慎之先生的自由主义思想，这种藐视不仅是一种“道德傲慢”，几乎是一种残酷性的诉求。

崔卫平和与会的多数学者都认为王怡的“共谋”一词用得太过宽。将施害者与受害者一视同仁、等量齐观，显然有失公允。朱学勤等提出，关键是斩断国家对资源的垄断之手、捍卫公民的合法权益，而不是过分谴责公民在无奈中的选择。

王怡认为仲、曹对李慎之“剔骨削肉”“不彻底”的质疑，不仅指向对李慎之个人思想的评价，并与对整个大陆当代自由主义的理解相关。身在大陆对严峻的生存和精神环境有切肤感受的王怡，强调“将当代大陆的自由主义理解为一种本土化的经验的政治思潮与过程”，是理解李慎之和当代大陆自由主义思潮的关键。很多人也曾指出自由主义的基本理念卑之无甚高论，但自由主义的本土化叙述却历经百年磨难至今未曾在中国政治与文化语境下完成一个完整的表达和融入。什么是当代大陆自由主义的学术？完成自由主义在中国政治与文化语境下的完整表达和融入就是今天最大的学术难题。

这使笔者想起李慎之自己所言他只是“创旧”，事实上他高扬的也只是自由主义的常识，但这种创旧和常识的高扬在中国本土却是如此之艰难不易。

学术的价值和地位固然重要，但诚如王怡所说，一个研究自由主义的学者倘若不着眼与自己共存的本土极权政治现实，不着眼于一个自由主义的本土政治过程，他的学问就与当代大陆的自由主义无关，他是一个知识爱好者而非自由主义知识分子。

这里我们可以更好的理解秦晖何以将反对别人受奴役的储安平、李慎之等“自由主义者”置于在书斋中研究学术的陈寅恪、钱钟书等“自由者”之上。也正是在这标尺上，笔者无法同意仲维光只视陈寅恪一类人为自由主义者。

一直思考自由主义理论如何落实于政治操作的吴国光从胡适和李慎之的比较表述了与王怡一些相似的看法。在吴国光看来，李慎之时代的言论自由等个人权利和立法、司法乃至政治程序诸多方面远远落后于胡适的时代。

吴国光认为胡适推崇的自由主义是一种有反政治倾向的自由主义。李慎之的目光更多的关注于政治领域的变革，把自由主义看作解决中国问题的基本政治学说，这既是李慎之的一大贡献，也是自由主义在中国的进展。但胡适等自由主义先行者当年未能解决好如何贯彻自由主义原则到政治现实这一巨大难题，因而在政治上失败，而今天的自由主义者也未能很好反省历史经验而同样在解决这个难题方面无所进展。可以看出，吴国光与王怡均对自由主义在中国的政治使命和理论使命有更多的关注和强调。不同的是吴国光把完成这一使命的希望更多的放在民众而不是精英身上。

邵建的论文分析了李慎之从推崇鲁迅到仰视胡适的转变。他在欣赏李慎之过人识力的同时，也对李慎之未能完全摆脱一些成见而惋惜。邵建指出，鲁迅迷信革命而鄙视改良、钟情于国民性改造而蔑视制度建构，而且鲁迅倾向苏俄无产阶级专政、胡适以英美自由主义为皓的，李慎之对这些关键点都没有醒悟。

党内自由民主派衡量标准及其在后极权社会的作用

会议召集人冯崇义一直对党内自由民主派的形成以及这一派别在后极权社会的独特作用深有研究。

在分析马克思主义在认识论和人性观的根本迷误——为了所谓人类高尚的“类人性”而践踏自由主义所尊重“自然人性”之后，冯崇义痛惜中共党内的许多“才俊”“梦里不知身是客”，始终无法摆脱诱人的马列主义意识形态这一“世俗宗教”的蒙蔽，最终都只能算是半个自由民主派。

冯崇义认为党内自由民主派有三个主要标准：①认同自由主义民主的价值体系；②反对一党专政；③在行动上从中共内部积极推进中国的民主化政治改革。而李慎之正因为在这几个方面的卓著成就成为举世瞩目的公共人物。

对于党内自由民主派在后极权社会的独特作用，冯崇义引述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奈的例子，认为他虽没有用极权主义理论的分析框架，但对党国社会主义的社会结构及其演变轨迹的把握相当准确。科尔奈将神圣的意识形态和共产党至高无上的权力视为党国体制的内核，论证出这种体制的实质性变革只能从党和意识形态的变化开始。由此，冯崇义高度评价李先生并对中共跟随世界潮流存有希望。

冯崇义的论述实质上有力的回答了曹、仲等关于李慎之没有退党和没有与党外民

主派结盟的质问。

如冯崇义所说，后极权时代的中共早已是一个人各有志、同床异梦的复合体。当今维系中共上层的“共识”，与其说是共同的信仰，毋宁说是对同归于尽的恐惧和得过且过的惰性。

我们有理由相信，在党内民主派的不懈推动和民间持续并且愈来愈有力的压力下，中国从后极权向自由民主社会转型的完成不会久远了。

冯崇义是笔者学位导师，在他反复指导下笔者也尝试运用极权和后极权理论框架分析李慎之现象并写成一文参加讨论，论文初稿先前已在网上刊发，有兴趣者可搜索一读。

4、一个老共产党人的忧伤

会议最后的发言人是人民大学的高放老教授，他沉重忧郁的语调使活跃热烈的场面改为一片静寂。对他的论文的讨论，实际上是自由主义者与马克思主义者的一次严肃对话。

人们为他早年一起真诚投身革命而成为烈士的许多同学哀伤，也为他至今仍虔诚信奉共产主义而感慨。由他颤抖的语言大家不难看到他的心正为今日的权力异化和与这种异化伴生的道德腐化而滴血。

高放老教授的一个基本观点是，原始马克思主义包含了自由主义，只不过是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偏离了马克思的本意才在实践中不断出差错。与会的其它学者则指出，宗奉马克思主义的各国共产党在掌权后都无一例外地走向专制，并不是“歪嘴和尚念歪经”，而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经典中的“自由”，违反自由主义的“自由”。马克思要依据虚构的人类“类本性”去改造现实的人性、以没有国家的共产主义共同体中整体人类的自由去否定自由民主政治中的个人自由，都是导向极权主义统治的思想因子。

高放老教授踏上悉尼的艰难不在于他的老年的体力不支而在于办理出国手续过程中的层层阻力。尽管如此，他仍守着这个党本来是好的信念。

我们不能否认中共党内有不少“饱学之士”，我们也承认中共党内有许多品正德高的优秀人才。但“品质”、“德性”和“理性”均是有限度和反复无常的，所以权力是需要监督的，政府是靠不住的。在开车送高老会后参加一个郊外晚会的一个多小时车程中，当我问及他是否考虑到如果公共权力落在品德和心术不正之徒手上，而制度又无法制约他时怎么办？高老沉默之后，也认为自由主义对人德性和理性有限的人性观和低调的制度预设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他仍希望有一种吸纳了自由主义合理因素

的自由社会主义。

会议上高老提到李慎之在五七年看到苏联的某些变化后，曾与他谈到能否有共产党 A 和共产党 B 的互相监督。这让我们知道，李慎之对于一党独大，不受制约权力的怀疑早在五七年已开始了，只是其时未见自由主义亮光才有此 AB 共产党之天真设想。

有着七百年历史，在全球范围内的实践中证明了自己的普世价值的自由主义思想，由李慎之的领军再一次领到了中国大陆和国人面前。尽管在自由主义价值体系基础上建立的制度安排已被证明为人类迄今为止所能发现的“最不坏”的制度，但自由主义在中国会否再次重复遭到政治强人的拒斥抑或在无法控制的社会失序中重归沉寂，这在一定程度上由我们能否把一些争执的观点留待历史去辩识，而把更多的精力凝聚于尽快拓宽自由主义理念和实践在未来中国的进路来作答。¹⁴²

二、围绕李慎之现象的批评与反批评

（一）、如何理解思想的“原创性”

李慎之先生去世后，官方报刊发表一简短的消息，而民间网站则哀思不断，好评如潮，这是大陆思想界沉寂十四年来所罕见的。在如潮的好评中，也夹有一些批判指责李慎之的杂音，高声发出这种音响的代表人物是曹长青和仲维光。

曹长青在肯定李慎之三大贡献的同时，提出其“三大局限”：谏士情结；理论上否定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但对个人早期参加这一意识形态的传播没有忏悔；鲜见他对个人自由、个体价值重要性的阐述，把社会稳定看得比个人自由更重要。认为，有如此三大局限的李慎之被公认为“中国自由派知识分子的领军人物”，说明国内自由派知识分子的“滑稽与可怜”¹⁴³；仲维光评价李慎之和顾准生前“只有社会政治价值，却无学术思想价值”。也认为对李慎之的追思，说明“中国的知识界出了问题”。慎之仅一“过渡人物”。“过高地吹捧顾准、李慎之先生这一代人，甚至借吹捧他们来拉抬自己，是可悲的。因为中国的知识和文化传统不是从我们这一代人才开始的，而相反，是断在我们这两、三代人手里的。我们努力一生也许只能到达上一代人，那些

¹⁴² 参阅丘岳首：《重要的是拓宽自由主义理念和实践在中国的进路——“李慎之和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命运”学术研讨会的几点感想》，《世纪中国》网 www.cc.org.cn/newcc/browwenzhang.php?articleid=65-22k

¹⁴³ 曹长青：《对李慎之说点真话吧 www.peacehall.com/news/gb/pubvp/2003/05/2003

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起点，任何使用‘过大’的词语形容和赞扬我们这两代知识分子，都只能证明自己的无知，只会给后世留下笑柄。”¹⁴⁴

笔者在阅读李慎之先生的文本时，罗丹《思想者》的形象常常浮现在眼前——一只健硕的手，托着一个沉重的头颅。在我们的日常语言中，如果某个人思想很深刻，比周围的人站得高看得远，通常便怀着敬意将之称为思想家。从这个意义上说，“思想家”这一头衔李慎之当然是受之无愧的。曹长青列出“思想家”的“原创性的思想”和“系统论述”两条标准，认为李先生不够资格称为思想家，实在有吹毛求疵、尖酸刻薄之嫌。李先生确实还没有机会以鸿篇巨著将其思想做出系统的论述，但是，我们细读李先生的文章和谈话，并不难悟出其思想的原创意义与系统性。我十分遗憾一向以思想敏锐著称的曹长青没有读懂、读透李慎之。曹长青从这一个思想者的头颅里面“读不出李慎之作为‘思想家’到底有哪些深刻”之后断言李慎之晚年写的文章“基本是没有任何原创性的”。李慎之文章根本无法与东欧知识份子和异议人士（吉拉斯、哈维尔、昆德拉、索尔仁尼琴、萨哈罗夫）相比，而且“他那些观点在过去这些年来很多中国人早就说过、写过，并没有新鲜之处。”¹⁴⁵

让我们先看看“国内”。把曹长青所说的“这些年”扩大到1949年政权转换后的五十年也不是有“许多人”说过、写过李慎之晚年的观点。先前有胡风、储安平、顾准等人对现存不合理现状大声的抗议和冷静的思索，晚近有王若水、吴祖光、李锐等人顶着刺刀与权势对峙，呼唤着政治体制改革。作为强权的反对力量存在，这些体制内异议代表人士以其良知和勇气支撑着我们民族的脊梁。但可惜的是，无论前者后者，均是在共产主义思维模式给定的意识形态中思辨马克思主义的真与假。他们当中最有思想深度的顾准也仍然未能超出经验主义和唯物主义的旧意识形态的总体框架，而最终在昏暗的思想隧道里找不到中国未来出路。

李慎之十分推崇顾准，但他没有在顾准的思想平台逗留太久，他完全跳出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框架和樊篱，在更广阔的视野中以其睿智的目光在自由主义的亮光中审视中国，从而达到对中国社会专制主义本质的洞彻认知，对中国的历史和现实作出新的分析与概括，并为转型中的中国探明了一条可行的出路——以个人价值为本的自由主义。在李慎之晚年思想这里，马克思主义虚构的“完美理想人”已经还原为自由主义真实的、善恶合一的“有缺陷人”。这一审视中国社会现实的视角转换的意义今天

¹⁴⁴ 仲维光《由悼念李慎之所想到的——最近二十年中国知识界的几个社会思想问题》

<http://210.91.253.199:100/viewthread.php?tid=116958>

¹⁴⁵ 曹长青：《李慎之是不是思想家？》<http://www.ncn.org/asp/zwginfo/da.asp?ID=52750&ad=5/31/2003>

尚未充分显现出来，连思想十分敏锐的曹长青的反映都有些迟钝。由此可以看出自由主义思想观念在中国的稀薄，也正可掂量出李慎之晚年思想的沉重份量。

再说东欧。上个世纪末，东欧社会主义阵营如玻璃落地，碎成一地碎片。促成这次破裂的动力主要来自东欧社会历史发展条件时机成熟的“内在动力”，也来自东欧杰出的异议人士和知识分子的思想力量。作为同时代的思想者，李慎之也从这些思想（特别是哈维尔）中吸取了大量的养分，并将之作为分析中国问题的理论资源。

曹长青在赞扬东欧异议人士和知识分子“对共产制度有一个较系统的理论批判”（如有专著）之后认为“李慎之先生还处在一个学习理解和消化的阶段，自然谈不上超过他们。”¹⁴⁶这种简单的类比完全忽视了“思想者”所处的不同政治文化背景和实际境况，而谁高谁低的评判标准也失之倚重“批判”的偏颇。

首先，中国由于专制主义的意识形态沉积二千多年，进入了中国人的骨髓。权力对意识形态的控制强度，国民现代公民意识启蒙的难度都不是东欧国家所能比拟。民主潮流和对共产制度的批判当然也是全球化的重要内容，但具体到中国的土地范围内却有一个两千两百年专制主义历史和目前“前民主和后极权”的问题。

思想者在艰难的掘进中有两个基本的路向——批判和建设。在致力于对于共产制度旧意识形态的批判中出现不少像曹长青一类的出色的“爆破手”，但相对来说致力于破坏之后的重建工作（也就是娜拉出走后怎么办）则更为艰难。为了给中国的“娜拉”出走后怎么办找到答案，李慎之顺着陈寅恪、殷海光、庞朴、王元化、罗荣渠……回溯几千年昏暗的中国历史，上下求索；又沿着胡适、顾准、哈耶克、哈维尔、昆德拉……放眼全球，纵横观望，最终发现了以个人价值为终极目标的自由主义亮光，并以此烛照出沉沉一线穿越秦之后二千二百年的专制主义文化传统（不是传统文化）。在扎实的研究和痛苦的反思中，李慎之痛感“这个专制主义传统太深，深到不易认识清楚，深到不能真的触动的程度”，“中国人之接受专制主义正是到了深入骨髓的程度”，“中国人并没有‘公民’的觉悟，只有‘子民’的顺从”。中国的出路在于“先将制度民主化，再将子民公民化”，“当前的敌人只有一个，就是在中国绵延了两千二百年的专制主义，虽然自八十年代起它已因自身的腐烂而日趋软化，但极权的本性未变。要救治专制主义，只有民主主义，自由主义以至个人主义，别的出路是没有的。”¹⁴⁷

¹⁴⁶ 同上

¹⁴⁷ 《致何家栋信》，丁东主编《李慎之纪念文集》

至此，我们清楚地看到，李慎之已经转身和现存的中国专制体制作别了。并且，李慎之用自己的头颅为专制中国撞开了一扇通往自由新的大门。李慎之并非倒在门坎内，他已经走出来了，虽然刚刚走出来便倒下了，但门已被他撞开。

其次，如果没理解错，曹长青的“原创”说是指前人未有的创造。那么，李慎之彻底推翻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共产党人依据“唯物史观”对中国历史所作的分期以及关于中国“封建社会”的无稽之谈，将中国当前的“社会主义”实践纳入中国专制主义的框架中来分析 and 认识，并明确提出唯有自由主义能够救中国，难道不是“原创”之说？

至于李慎之没有退党，曹长青的看法有点接近天安门广场一些激进学生的“美丽的幼稚”和“可爱的简单”。不错，更多像李慎之这样的共产党高官退党，从思想到形式彻底与专制政权痛快淋漓的诀别会加速专制政权的瓦解。但从另一个角度看，这样的结果只不过是多了一个在门外大声嚷嚷的勇士。如果从“建设”的角度来理解，李慎之没有退党正是为了把自己的声音留在“门内”。他出席大小会议，有时还不请自到，（“读不出作为一个颇有个性的人，李慎之有哪些可爱的个人气质、生活细节”的曹长青可以从这里更多体味李慎之）为的就是不堵塞自己的言路而能更实在更直接地表达自己的“异见”。

门内门外的异议都有作用（这里还有一个如何默契的问题），而目前中国的实际情况是，门外抗议的声浪大，而门内反对的声音微弱。承认这一事实，请问曹长青，李慎之是在里面振臂高呼好呢还是出来和曹长青一起隔墙大叫好呢？

李慎之没有公开退出共产党，而且一些文章采取了开导中共领导层的言说方式，明白人不难理解这是出于效用的考虑，而不是曹长青所说“李慎之不是不够勇敢，而是他的认识还相当有局限”。曹长青对晚年“致力于把个人主义唱开”¹⁴⁸的李慎之思想中通过对专制主义的批判来褒扬个体价值的内核没有吃透便轻率断言“他对‘个人主义’这个自由主义最重要的基座几乎没有任何论述”，¹⁴⁹这就更是明显的武断和无知了。

至此，我们似乎再不需多费口舌来反驳曹长青对李慎之缺少“反省早年追随共产主义的错误”的指责，李慎之“风雨沧桑五十年”的独语和他对这个他曾为之奋斗大半辈子的政权投下的反对票已经做了回答。

¹⁴⁸ 《致王若水信》，同上

¹⁴⁹ 曹长青：《李慎之是不是思想家？》<http://www.ncn.org/asp/zwginfo/da.asp?ID=52750&ad=5/31/2003>

李慎之迈出大门出走了。越来越多的人（特别是近期挺身而出的中青年学者）走上了跟随他的道路，他们从李慎之的头颅中看到金子般闪光的思想宝藏。这些宝藏散落在杂志、书信和录言之中，需要后来人整理、开掘、汇集。

曹长青也算是敏锐和有较强文化消化能力的“思想者”。国外十几年的生活开阔了他的视野，但得到“天空”的同时小心失去“土地”，在“那片神奇的土地上”仍然生活着“沉默的大多数”。从那里发生的每一个真言都是微弱和难能可贵的，而李慎之在生命黄昏发出的洪钟般声响将久久回荡在这片“黄土地”上。

关于“原创性”，秦晖的一段话说得好：“有一本讲顾准的书名为《拆下肋骨当火把》，就是突出了顾准、李慎之等老一代自由先驱的这种精神。现在人们怀念顾准、李慎之等前辈，可是有人说他们固然人格令人景仰，但是在学术理论上成就没有那么高。顾准的学问早已经过时了。而慎之先生的“理论原创性”并不突出。其实今天中国的自由主义更需要‘实践原创性’。就以近年来国人经常提到的哈维尔来说，他作为深受卡夫卡式后现代思想影响的剧作家，很难说对自由主义理论、尤其是认同市场经济的古典自由主义理论有多少热情，甚至他（如同甘地等人一样）的某些言论与如今一些所谓左派愤青也不无形似。使他与后者截然有别的不就是他的实践吗？哈维尔能不能算自由主义的“神学家”我看大有疑问，但他作为自由主义的圣徒已足够伟大，他对捷克自由事业的贡献亦堪称不朽了。”¹⁵⁰

中国艺术研究院副研究员张耀杰也认为：任何个人都是时代和环境的产物，有着自己不能克服的局限性。曹先生自己在“是不是思想家”的问题上大较其真，就是颇为无聊的局限性。为了证明自己不是“无的放矢”，曹先生所开列的并不是“不满”之“的”，而是“对李慎之的颂扬”：“李老是人们心中的巍峨的高山，是雄伟壮丽的长城”；“我们这个民族有福了、有救了，因为我们这个民族出现了先知 李慎之”。多篇文章把李慎之评价为“思想家”，有的还称李慎之是“杰出的思想家”、“伟大的思想家”，甚至称李慎之是中国“当代思想史确立坐标的人”，是“世纪之交中国思想界的泰山北斗……20世纪中国思想道统的四个代表是梁启超、胡适、顾准、李慎之……”

既然是“对李慎之的颂扬”，溢美夸张之词在所难免也情有可原，曹先生大可不必到别人的内心深处去搜罗“存天理，灭人欲”的诛心证据：“大家都迫不及待地要出来表态一下，我是这一伙的，千万别漏下我。”人人过关的表态献媚是中共的政治

¹⁵⁰ 秦晖《自由主义的理论与实践》真话文论周刊第三十六期

运动和中央电视台的政治宣传的拿手好戏，表态献媚者大都有触手可及的现实利害，对于连正当言论都不大可能正常发表的李慎之及其“一伙”，能够“迫不及待”表态认同的，肯定不是为了争取什么遗产和宝库，而是冒一网打尽之危险的自我暴露。这哀悼死者的自我暴露，尽管有一些谨小慎微的言不由衷和言不及义，更多的还是以泪洗面甚至失声失态的真情流露，赏心悦目的戏子表演肯定是不存在的。曹先生偏偏要在这件事上拗一调，表明自己不是“这一伙的”，同样是你的言论自由和信仰自由；不过，再加上耸人听闻的“好象有点大逆不道”，就有些自作多情和搔首弄姿了。

151

关于该不该“退党”和“谏士心态”，张耀杰说：真正的自由主义者所要坚守的底线是公共权力者的必须正当作为和个人权利者的可以自由作为也可以自由不作为。作为退休退职的个人，李先生更享有在此作为和彼作为之间进行选择的权力。他用自己的心血和智慧向公众宣传真理，向权力者提出忠告，就是在既成事实面前力所能及的最大作为。许良英先生的学问显然要比李先生好一些，但是，许先生的公开退党，实际上是自动放弃了公开发言的正当权力，他所产生的实际影响和社会作用，远远比不上李先生。两位先生之间所做出的都是自己的自由选择，用任何一方压倒另一方面都是无知的或别有用心。

曹长青的“做一个自由主义者，在无数追求自由的民众和文化人心里，他们是反抗强权的英雄，是赢得人们尊敬的。不是我要求李慎之做烈士，而是他自己选择做英雄。”如果不是居心叵测的话，至少应该是连他自己都不知所云的强词夺理和无理取闹。“无数追求自由的民众和文化人”本应该自己去追求自己的自由，而不是勒令“一个自由主义者”代表和代替他们去充当什么“反抗强权的英雄”，“一个自由主义者”也从来不会去干包办代表别人的侵权事情，曹长青远在纽约倒是很会理解体会包办代表的真谛所在，只可惜他并不拥有包办代表的特殊权力。在任何性质的强权社会里，敢于向掌握公共资源和公共权力和当权者公开进谏，既是一种做人的勇气也是一种公民的权利，进谏总比不进谏好，李慎之不向掌握公共权力的前江泽民总书记进谏，难道要向远在纽约的曹长青进谏不成？！¹⁵²

对于曹长青、仲维光质疑李慎之的“谏士心态”，朱学勤有很精彩的回应：慎之本人有无“谏士心态”，以“藕断丝连”喻之，庶几近乎。所谓“藕段”，是指他个

¹⁵¹ 张耀杰《是不是思想家重要？》<http://www.dajun.com.cn>2003年6月23日

¹⁵² 张耀杰：李慎之的败笔和曹长青的圈套

www.peacehall.com/news/gb/pubvp/2003/07/200307152158.shtml

人早已突破此类自限，思想上“剜肉还母，剔骨还父”，行动上“决不在刺刀下做官”，当为明证。所谓“丝连”，是指他晚年还是保持着与这些党内同辈的私人交谊，并拉着他们一起走。据高建国追思文章，老人早餐常以啃麻花代之。在这样的经济境况中，他居然省下三百五十元给“谏士老朋友”送《顾准全集》，以“支持”他们的民主“意识”，如此高谊厚德，在今天的年轻一代，已十分罕见。慎之先生与前辈“谏士老朋友”的思想交往，非我辈所能取代。后人应从中体会什么是民主事业所需要的“支持意识”，什么是历史积层下的道义资源，而不是道一声“谏士心态”，弃之如蔽帚。至于由此苛责，再引出进一步苛求：所有那些“谏士心态”都应该“退党”，“如果几万、几十万共产党员知识分子都退出了这个党，其摧毁这个党统治的意义是非常重大的”，其实并无意义。如此“道德傲慢”，只不过是“错置具体感的谬误”，无意中以海外环境之特殊，迫人从己。这种唯我独“革”的心态，“形右实左”，折射出革命文化的反向拷贝，其危害之烈，内耗不已，恐已超过“谏士心态”。

朱学勤认为，仲维光之批评，比曹长青的“道德傲慢”有深度。一篇《当代中国无大师》论西方汉学界弥漫着左翼文化，汉语功底浅，经济资源多，反而能吸引大陆学术潮流趋附；而国内左翼思潮自二、三十年代左翼文学始，源远流长，盘根错节，老“左”护之，新“左”爱之，一直得不到彻底清理；境内境外合流，表面上造成开放以来国际交流的热闹气氛，而这样的欢乐接轨在陈寅恪这样的大师前，则暴露出“可笑的自大与可鄙的猥琐”。这一批评剔肤见骨，相见恨晚。但在同一作者后一篇文章里，论“过渡人物顾准和李慎之的贡献究竟在哪里？”，却以自己在海外所接触的所谓西方“学术训练”为标准，贬低境内思想前驱的历史地位，自相矛盾，流露出另一种“知识傲慢”。”¹⁵³

朱学勤并借助三十四年前林毓生悼殷海光的一段文字有力地回应了这种“知识傲慢”：“任何人如要在学术上有重大成就，都必须有一种不顾一切，专心研究的能力。在今天苦难的中国社会里，一个人如能如此专心，必须相当的自私。自私大别可分为两种：一种是损人利己的鄙劣行为；另外一种是对外界也有同情心，并不损人利己，——有时是以将来研究成就可能对别人有很大的好处做理由，来把外界的苦难忘掉，或对外界的苦难变得漠不关心。——般先生经常处在道德忿怒与纯理追求的两

¹⁵³ 朱学勤《“常识”与“傲慢”——评曹长青、仲维光对李慎之、顾准的批评》
www.ncn.org/zwginfo/6/22/2003.htm

极所造成“紧张”心情中，自然不易获致重大的学术成就。事实上，学问对他不是目的，在强烈的道德热情呼唤之下，他不可能为学问而学问。以殷先生之天赋与为学之诚笃，如能稍减其对社会的关切，在一个学术空气流通的地方，积十年之力是不难有重大成就的。易言之，他之所以在学术上没有获知原创性成就，正是因为道德成就过高的缘故。”¹⁵⁴

仲维光、曹长青的“道德傲慢”和“知识傲慢”点到了“当代中国无大师”的某些原因，而“当代中国无大师”最根本的原因在笔者看来正是自由主义在中国的缺位，也正是在这一点上，成功地把自由主义在当代中国重新“唱开”的李慎之就是“大师”。

诚如肖雪慧所说：李先生在《重新点燃启蒙的火炬——五四运动八十年祭》一文中尖锐指出中国文化传统的核心是专制主义，并指出由专制主义必然衍生出蒙昧主义。他提出重新启蒙的思想任务，表明专制主义不仅是历史的梦魇，而且是现实的存在。如果说重新启蒙的任务对现体制的本质是一种暗示，那么他的《风雨苍黄五十年》则在对现体制的本质作深刻理性剖析的同时提供了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在这一过程中，他对自己投身其中的那场催生了现体制的革命进行了痛苦的揭露，作出了历史性的否定判断。有人指责李慎之先生在揭露革命和它造就的体制时缺乏对自己的反省，这是不公正的。对于一个几十年的人生道路都与这场革命联系在一起的老人来说，否定这场革命和由这场革命催生的制度性怪胎，本身就意味着对自己走了大半辈子的道路的否定，它需要经历极其痛彻的自我反省。在读先生的《风雨苍黄五十年》时，我强烈地感到浸透于全文的痛彻。但最为痛彻的自我反省，是从邵建传来的纪念文中李老致邵建信里读到的，他写道：“我以过来人的身份可以说我们这一代是被误导了。‘误导’这两个字，可以说是很沉痛的，也可以说是份量很重的。”邵建纪念文中还有一封丁东的来信，信中转述的李老关于自己一生的一段话更是感人肺腑，他坦陈“直到老年，才反省自己一生走了弯路”，甚至说出：“我们这些革命党对民族都是有罪的”。这自认“对民族有罪”的痛彻反省文字出自这样一位老人：他为着民族有一个自由、民主的光明前景投身了革命；他在理想遭受一次次惨痛挫败下不改初衷，不惜代价勇敢揭露真相，不遗余力在新的探索中进行民族的重新启蒙。他对历史真相的勇敢揭露和锐利剖析振聋发聩，他作的重新启蒙令蒙昧者开智，令制造蒙昧者

¹⁵⁴ 《殷海光纪念文集》，台北桂冠图书公司，1990年版，第133至135页

胆寒。而他对一生所作的自我反省，那是一个心地无私而又大彻大悟的人才可能达到的。这种自我反省精神的震撼力和人格启蒙作用丝毫不亚于他在揭示真相和思想启蒙上的力量和作用。¹⁵⁵

（二）如何评价“中共党内民主派”

曹长青在《李慎之的三大贡献与三个局限》一文中这样指责：

这个向往自由主义的李慎之直到去世都没有退出中国共产党。一个共产党员和一个自由主义者是两个截然对立的角色，是无法统一的。也许有人认为，既然李慎之已经在理论上否认了共产党，那么他在形式上还是党员则无关紧要。这是绝对错误的。形式是重要的！否定共产党，首先得退出这个组织。如果几万、几十万共产党员知识份子都退出了这个党，其摧毁这个党统治的意义是非常重大的。李慎之不仅被认为是“中国自由派知识份子的领军人物”，而且在他去世后，从国内自由派知识份子几乎异口同声的热烈赞美中，似乎更确定了他的这种“领军”地位。如果一个“共产党员”是“中国自由派知识份子”的代表人物的话，是不是有点滑稽呢，或者说，中国的自由派知识份子太可怜了点吧。¹⁵⁶

仲维光也在长篇大论《当代中国无大师》中，论述专制社会中完全意识形态化的知识与精神的改变之不易，以此作为论据，推断出李慎之“在知识结构和精神上基本没有超出马克思主义教科书的范畴”这一“谁也不愿意看到的结论”。¹⁵⁷

笔者虽不同意仲先生的结论，却愿意承认仲先生的论述精彩，因为他的论述无意之中正论述了李慎之的超凡脱俗的生命意义。李慎之“剜肉还母，剔骨还父”告别的，正是仲先生所论说的弥漫于专制极权社会的“知识与精神”。

关于如何评价“中共党内民主派”，冯崇义《中共党内民主派与李慎之》一文有很好的作答，冯崇义以李慎之为个案分析中共党内民主派以及中国自由主义者的来历、处境和前景：

从理论上说，中共党内民主派指的是中共党内信仰自由主义民主并付诸行动的人士。根据中国的政治现实和苏联东欧的经验，判别中共党内民主派的标准，必须考综合考虑如下这些关键因素：对中共党政权的认识 and 态度、对自由主义民主的认识和态

¹⁵⁵ 肖雪慧《一个真正的理想主义者——纪念李慎之先生》www.sinoliberal.net

¹⁵⁶ 曹长青在《李慎之的三大贡献与三个局限》

<http://www.ncn.org/asp/zwginfo/da.asp?ID=52090&ad=4/30/2003>

¹⁵⁷ 仲维光：《当代中国无大师》www.zhongguohun.com/party/gongchan/020.html - 12k

度、与政治民主化改革的关系。因而，判别，中共党内民主派的标准，至少包括如下几项。第一，认同自由主义民主的价值体系，尽管对自由主义民主政治的认识程度可以有深浅不同。第二，反对一党专政。从民主的角度反对个人迷信、领袖独裁但并不明确反对一党专政的人，至多也只能算是半个民主派。第三，在行动上从中共内部积极推进中国的民主化政治改革，区别于有思想而没行动的党内潜在民主派、也区别于作为公开的反对派从事民主运动的党外民主派。

依据这样一套判别标准，我们可以判定中共在立国前就存在一些民主因素，包括继承五四民主余绪的部分第一代中共党人和在抗日民主救亡运动中投奔中共的一代，但他们还不够格称为党内民主派，理由就在于他们为马列主义“民主观”所遮蔽，并没有认同自由主义民主。经过五十年代初的洗脑和五七年反右的打压，中共党内的民主因素至多只是由顾准那样极个别的异数保留不绝如缕的一丝血脉。文化大革命的灾难和毛泽东时代的终结使中共党内民主因素死灰复燃，而且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几成燎原之势，真正形成党内民主派。具体表现为王若水、刘宾雁、吴祖光、王若望、方励之、许良英等党内知名知识分子的呐喊，千百万中共党青年为自由而呼号，甚至有胡耀帮、赵紫阳两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和项南、任仲夷等封疆大吏所显示出来的民主倾向。严格说来，中共党内民主派实际上指的两部分人，即极少数完全意义上的民主派（与自由派同义）和在不同程度上具有自由主义民主倾向但未必完全认同自由主义民主的“半民主派”。

冯崇义指出，李慎之在完成向自由主义者的转变之后，在上文谈到的党内民主派具体标志的三个方面，都有非常突出的成就。其中最为重要的一点就是从党内公开打出自由主义这面大旗、向共产党人指明了彻底转变为自由主义者的出路。第二个贡献是以自由主义为理论依据来批判“中国专制主义”。第三个贡献是试图调动中共党内的一切资源重新开启六四之后被搁置起来的中国民主化政治改革。¹⁵⁸

冯崇义曾亲口问李慎之处于他那个层面的同辈人有多少人是自由主义同道，李慎之以拇指对胸，半是自豪、半是叹息地作答：“余一人也”。¹⁵⁹六四事件之前，中共党内已有一批具有某些自由思想和价值观并在不同程度上试图参照自由主义的理论和价值来改革政治体制的人物。中共两任总书记，胡耀邦和赵紫阳，是因为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错误”而被解除职务的；刘宾雁、王若望、王若水、吴祖光、方励之等人

¹⁵⁸ 参阅冯崇义：《中共党内民主派与李慎之》，《真话文论周刊》www.zhenhuanet.com

¹⁵⁹ 2003年3月16日李慎之在北京的面谈

是因为“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被开除出党，天安门事件中因为“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思想和行动而被清算和整肃的各级党政干部则更多。不过，这些人不但没有彻底摆脱马列主义的框架，没有放弃他们的马克思主义信仰而改宗自由主义，他们所要求的只是“体制内改革”。他们真心向往自由民主主义，但其心智尚不能摆脱马列主义意识形态的樊篱，正所谓“梦里不知身是客”，“错将他乡当故乡”。由此可见对党内这类“马克思主义者”（特别是当权的）的启蒙任务仍然任重道远。

国内自由主义者及其它人士广泛认同李慎之，也就意味着人们对在现存体制内和中共党内积“一点一滴”的改良以预备翻天覆地的大变革这样一种发展途经还没有完全绝望。李慎之以当代中共先知的身份向中共党徒们指明：“全球化是世界潮流，市场经济是世界潮流，民主政治是世界潮流，提高人权是世界潮流，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力启党员同仁之蒙。他致力于从内部说服中共同仁担负起政治民主化的重任，甚至于念念不忘打动“核心”，可谓用心良苦。¹⁶⁰

曹长青自己也说：“谁说共产党结束后一定会是今天的民运人士执政？以苏联、东欧以及亚洲那些结束了专制的国家例子来看，那些政府的运作基本上多是原班人马，只不过形成了不同党派，开始了通过竞选而你上我下的民主机制。”¹⁶¹既如此，李慎之留在党内以他特殊的身份做他的同僚的启蒙工作，其重大意义不就不言自明？

应该说，中共早就是一个人各有志、同床易梦的复合体。当今维系中共上层的“共识”，与其说是共同信仰，毋宁说是对同归于尽的恐惧和得过且过的惰性。李慎之力图向中共党指明，民主化政治改革可以理解为中共引刀自宫，但这是中共、同时也是中华民族获得新生成本最小的选择。中共或许还有跟随世界潮流前进的勇气，只要中共没有完全彻底地关闭政治改革的大门，通过自上而下的改革走向自由民主的政治文明的希望就没有破灭，就值得中国自由主义者（包括还留在中共党内但已舍弃共产主义信念者）去奋力争取。曹、仲等人看不到留在中共党内的自由主义者的重要作用，甚至于抨击贬低他们的价值，只能流露出自己的简单浅薄和道德傲慢。

三 从书信看更为真实的李慎之内心世界

¹⁶⁰ 参阅李慎之 2001 年 4 月 6 日致李锐信，《怀念李慎之》，北京 2003 年版，P2 《风雨苍黄五十年》一文中心用意也是教训“核心”。

¹⁶¹ 曹长青：《还靠共产党救中国？一答万润南》

<http://www.peacehall.com/news/gb/pubvp/2006/04/200604070533.shtml>

（一）李慎之书信的主要内容

李慎之先生是 20 世纪末到 21 世纪中国大陆最重要的思想家，对他的思想的整体性研究只能说还处于起步阶段。除了公开发表文章，从平时的家书信件我们或可了解到更为真实的李慎之内心世界。为此，笔者曾托人向编辑《怀念李慎之》上下两册、较了解李慎之的丁东先生索取李慎之未公开发表的信件。丁东先生回信，为因某些缘故拿不到李慎之未公开发表的信件的原件致歉意，但在信件中丁东先生就他接触到李慎之的遗著情况向笔者详细谈了他的看法：

李慎之逝世后不久，海内外曾经就对他的评价的发生过争论。争论双方如果出于不同的价值基础，对李慎之产生不同的评价是毫不奇怪的。但有的争论是在同样是认同自由主义基本价值的学者之间展开的，其实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争论的各方对李慎之了解的程度差距甚大。有人只能在报刊上或网络上零星地读过李慎之的文章，有人却与李慎之有直接的密切的交往，这就会导致不同的看法。就我了解的情况而言，与李慎之交往越多的人，往往对他的评价越高。

李慎之先生已经去世，与他没有交往的人已经不可能再去交往。但如果真有了解他研究他的诚意，就应当更多地接触他留下的各类文字和声音。

一般来说，研究一个思想家，考察他的论文、专著固然重要，但日记、书信和谈话的价值也不可低估。就书信而言，可举陈独秀为例。他在 1940 年 9 月致西流的信，比较了民主制和权权制的区别，深刻地剖析了苏联的极权体制，代表了他晚年思想达到的高度。还可举顾准为例。在他留下的著作中，最有光彩的莫过于他给陈敏之等人的信，也就是在他生后编为《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的那些文字。

李慎之先生晚期的著作，大约有 80 篇文章。其中包括近 10 封书信。这些书信是李慎之先生生前在中国大陆报刊公开发表过的。还有大量的通信，是李慎之先生无意在报刊公开发表的。

因此可以对李慎之的遗著作这样的分类，一，准备在国内公开发表的著作，二，不准备在国内公开发表的著作；三，准备在国内公开发表的书信，四，不准备在国内公开发表的书信。

李慎之先生的著述活动虽然可以上溯到 50 年代，但真正说自己的话则是九十年代以后的事。这样，他的许多著作，就打上了 90 年代的中国大陆的言论环境的印记。用通俗的话说，叫擦边球。李先生的许多擦边球也能引起巨大的反响，除了他的思想水准之外，也同他曾多年担任中共的意识形态专家有关。他对官方意识形态的游戏规则

了如指掌。所以，在意识形态的夹缝中寻找公开表达的空间，对他来说，并不困难。当然，也要说明，虽然他说过不接受报刊约稿的话，但有一些文章还是应约而写的。例如有几篇怀念已经去世的老朋友、老同事的文章，就是应家属约稿而写作的。这些怀念文集是要在国内公开出版的，所以在表达的分寸上就不能不有所考虑，免得让约稿者为难。这并不表明李先生思想的局限，而表明他为人的宽厚。

在他生前，社会反响最为强烈的是 1999 年撰写的不准备在国内公开发表的《风雨苍黄五十年》一文。这篇文章是跨越国内意识形态限制的一次突围行动。这篇文章带来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使他在国内报刊公开发表文章大受限制。

如果说，这篇不考虑意识形态限制文章，在李慎之的文章中是一个特例；那么不考虑意识形态限制的书信，则是李慎之书信的常态。所以，研究李慎之先生无意公开发表的书信，就成为了解他晚年精神世界真实面貌，了解其思想的深度和高度的基本途径。

就我读到的书信，有以下几方面内容：

(1)、为推动中国政治改革而谋划。

如他在 2002 年 3 月 28 日给李锐的信，针对李锐对中央的上书说：

“意见完全是体制内的，对方是不能拒绝的。不过即使如此，看来要接受也很难。大概不会有什么回音，顶多在口头上打个招呼表示‘知道’了而已。

如果可能的话，我以为还不妨加上一句话（可以放在第五点意见之后，结束语之前），表示政府应当立即宣布给‘六四’平反，以昭决心于天下，昭大信于天下。增加这样一点刺戟性，一方面可以使对方知道民意不可侮，也可以使这篇文章不胫而走，传启蒙海内外，起到动员民众的作用。对方最近刚刚在内部统一口径，决不改口，如此顶风而上，当然不会理睬。但是对未来的‘接班人’，可能有不小的影响。”

这封信的背景是李锐起草了一个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意见，曾征求李慎之、李普、朱厚泽等人的意见，成稿后想联络五个前中顾委委员和五个中科院院士，联名上书。在征求杜润生签

名时，杜向张劲夫咨询。张认为联名上书可能收效适得其反。在这种情况下，李慎之于 2002 年 7 月 21 日致信李锐：“我以为以你的地位和名望，完全可以单干。否‘筑室道旁，三年不成。’”

李锐同意李慎之的建议，定稿的最后一段专谈六四问题。并以个人名义将此信送

交十五届中央政治局常委每人一份，并在列席中共十六大的分组会议上宣读。十六大结束时又送交新当选的政治局常委每人一份。后来，在《炎黄春秋》等内地报刊上发表了删节稿，在香港《开放》杂志上发表了全文。

李锐意见的定位是体制内的，既在承认共产党执政地位的前提下，提出政治体制改革的主张。不论对于李慎之，还是对于李锐，这都不是他们的最终目标，而只是近期目标。这个意见的效果，也如同李慎之所料，不胫而走，成为 2003 年中国政治改革的强音。

(2)、阐述自己的政治思想理念。

如他在 2001 年 3 月 29 日给何家栋的信：

我的看法是，当面的敌人只有一个，就是在中国绵延了两千两百年的专制主义，虽然自八十年代起它已因自身的腐烂而日趋软化，但极权的本性未变。

要救治专制主义，只有民主主义、自由主义以至个人主义，别的出路是没有的。因此还是五四的任务，五四的口号。

其实自由主义就是资本主义，在世界上，它已越来越成为主流，苏联瓦解改制后尤其明显。

自由主义在世界上存在了几百年，政策屡有变化，有的甚至就叫社会主义，如英国的工党和西欧、北欧的社会民主党。但是我们中国共产党跟着苏联共产党一贯称之为资本主义。

其实并不错，因为他们不论变化多大，总是①承认私有财产存在；②承认市场竞争；③尤其重要的是无论如何不能损害民主原则。这些在根本上都是自由主义。

苏联和中国自称社会主义国家，而西方总称我们是共产主义（Communist 在西文中与共产党是一个字）国家，其实也没有错，我们不但一直悬共产主义为无比美妙的最后目标，而且坚持通向这一目标的道路——无产阶级专政。

几百年的世界近代史，一百年的较量是应该可以得出结论：共产主义是现代化过程中的支流或者逆流。自由主义则是主流，而且是全人类迟早都要走的必由之路。

自由主义历来就以容许批判作为自己的定义或标志，因此新左派、后现代在西方流行（其实始终动摇不了属于主流的制度和思潮）并不足怪。怪的是，在专制主义占绝对统治地位的中国，它们也居然能时髦起来。其原因恐怕就是你指出的，它们还没有能摆脱毛泽东思想的影响，还停留在红卫兵水平。

自由主义因为在西方流行了几百年，所以现在又有新自由主义的说法。相对于自

由主义的各种时髦形态而言，老派的自由主义者也有自称或被称为“保守主义”的。因此西方的“保守主义”就是“自由主义”，现代化和资本主义本来就是从自由主义开始的嘛。不过中国人往往分不清楚这一点，还以为保守主义就是专制主义。他们连英国保守党党魁撒契尔和在美国也被认为保守的共和党总统里根在八十年代开展一阵最新的自由主义浪潮，现在仍是世界最新潮流都弄不明白。

中国在经济上是否可说自由主义已占上风，我不敢说，因为中国计划经济的思想实在太强大，只要看有开明之称的朱镕基的施政就可以明白，不过自由主义不出十年必然要占上风，是可以肯定的。

经济自由主义①必然能发展生产，②必然扩大贫富差距，这个趋势无法扭转，世界几百年来的经验已经证明这一点，请看我的《海阔天空扯乱说》对此有说明，新左派和后主们所以能在西方存在就已因为抓住了后一点大肆批判的缘故。

西欧因为执行社会主义政策人民的福利比较平等一点，美国在这方面就比较差，然而美国的经济活力又始终比西欧强，人们当然要求“两全其美”然而又实在做不到。这恐怕是永恒的矛盾。

自由主义的精髓其实还不在于经济自由主义而在于政治自由主义。我现在还没有看到新左派与后主们敢正面批判民主、自由和人权、法治的。这些都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根本没有，而中国今日迫切地需要的。

至于中国今天的贪污横行，则主要是专制主义结果，尤其是专制主义腐烂的结果。

因此，我们的“战斗的策略”，似乎也可以像经济自由主义一样。少同无理进攻者纠缠，而是“一步一步地”正面阐明自己的主张：以民主反专制，以法治反人治（=党治）并高高举起作为其根据的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的大旗。人权在今天已成为无人敢反抗的全球价值，但是人权必须落实在一个个人身上，集体人权是我们中国人的狡辩。

一百年以后看，自由主义必然成为全球主义。这点是可以有信心的。

他在给陈敏之的信中说：

你的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两分法，确实可以概括人类的全部思想史。不过事实上各种乌托邦竟没有一个是成功的。像欧文，还有美国人搞的一些“共产共妻，性交自由”的小乌托邦应该说有的搞了几年还颇有一点合乎理想的样子，至少没有搞成悲剧，只是搞不大（顶多只有几百人），也搞不长，只要几年就搞不下去了。说到底，这是因

为人对人性的理解不足。从发生学上讲，人本来是群居动物，开头就有王，也因此而开头就有专制主义，就有集体主义。

这是人类不论哪个社会都经历过的。这一点看一看猴群就知道。人类又不是牛羊狼虎，是杂食动物，因此人吃人的现象在上古也是普遍的，到现在非洲和巴西丛林中也还有这种习惯。

但是人又是有灵性的动物，能用自己的智慧改善自己的生活，生活条件改善以后，就不断要求扩大个人的自由，这就是自由主义的来源。要讲人类社会有什么规律的话，只有渐渐要求扩大自由这一点，可以说是一个不可改变的趋势（不过这个趋势有几百万年被淹没，只有到这一千年才渐渐暴露而被承认），其他的一切都还没有可靠的验证。中国农民在二十年前的计划经济时代劳动不可谓不强，受苦不可谓少，但生产的东西有限。普通人民吃的方面甚至比不上解放以前。我常说 1978 年安徽凤阳县小岗村农民摁血手印，对天盟誓，分田单干，是最有理论意义的“革命行动”。但是，现在领导天天讲“富而思源”，把源推到“党的好政策”上，而不把它归之于人要求自由的本能，说明中国人的理论水平实在不怎么样。其实这个理论早由英国人亚当斯密（1723—1790）在三百年前就发现了。政治上的自由主义则也由另一位英国人约翰洛克（1632—1704）总结形成了。至今全世界都受其赐。我上一次信中讲马克思主义实际上是人类发展思潮中的一股支流或逆流，就是对他们两位说的。现在有人要推选第二个千年在社会人文科学最伟大的人物，我就要推举他们两位。

（3）对人物的评点。

李慎之对胡适、陈独秀、鲁迅、胡适、顾准、陈寅恪等人的评点上文已多处论及，不再赘述。

（二）李慎之与许良英的书信往来

在李慎之为数不少的书信中，最重要和较完整表述自己的内心世界的是与许良英往来的书信。

李慎之与许良英是 1998 年后才开始交往的新朋友，两人只见过两次面，主要是靠文章和通信交流思想。李慎之先后寄给许良英“近 30 篇文章，43 封信。有的信写得很长，长达 7 页、10 页；谈论的问题很广泛，从科学、民主、传统文化、国家民族和人类命运，到个人经历和人生感受。我们都是在青年时提着脑袋干革命并参加共产党，1957 年都被划为‘极右分子’。这样的共同经历，使我们在晚年成为至交，而且

大有相见恨晚之感。”许良英写于2003年5月16日的《痛悼挚友、同志李慎之》一文称李慎之为“挚友”、“一位真正志同道合的‘同志’”，“他小我3岁，却比我先离开人世，留给我的，是无尽的悲怆和无尽的思念。”¹⁶²

该文记述李慎之与许良英往来书信的详细情况，从中可窥见鲜为人知的李慎之的内心世界，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和珍贵的史料价值。特将之全文附录于后，供读者细细品读。

在与挚友往来书信的字里行间，李慎之一颗中华民族的赤子之心跃然纸上！

162 许良英：《痛悼挚友、同志李慎之》新世纪网 www.ncn.org 6/20/2003

结 论

自由主义议题在百年前的中国晨钟初鸣，历经战火洗劫和政治强人拒斥，奄奄一息至 1998 年重浮出水面并在后极权中国社会大面积范围内产生巨大影响，李慎之是推动此一重大历史转折的第一功臣。

李慎之思想的嬗变是一个消解极权“党文化”的过程，是一个转型时期中国知识学人角色转换的过程。

在这一过程中，李慎之重新认识中国传统文化传统、厘清中国专制主义的特点、勇敢否定依据“唯物史观”对中国历史的分期，将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纳入中国专制主义框架来分析和认识，并明确提出必须彰显自由主义个人价值、以自由主义的价值观念作为消解中国专制主义和极权主义的最好思想资源。

通过这一过程，李慎之完全挣脱了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桎梏，义无反顾地从党内公开打出自由主义这面大旗、向共产党人特别是中共党内开明派和在不同程度上具有自由主义民主倾向但尚未完全认同自由主义民主的“半民主派”指明了彻底转变为自由主义者的唯一正确出路。

基于对自由主义思想体系价值和后极权中国社会本质特征的洞彻认知，李慎之力倡重新启蒙和公民教育、挺褒“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高扬全球化与民主化旗帜、呼吁重燃理想之火实践自由。

自由主义议题在中国后极权时代的重新提出对推动中国社会的转型具有重大的实践意义。李慎之明确提出唯有自由主义是中国未来的出路，此举在后极权中国社会具有振聋发聩的重要作用和影响，已经为中国改革向政治体制深层的推进标明了正确的方向并注入了新的动力，也将极大影响和加速改变中国知识学人思想文化结构的重组和转换。

李慎之晚年思想的转变，对于正在急剧分化的中国执政党，也将产生难以估量的影响。在李慎之的带动下，中共党内高层中更多有自由主义倾向的智者，正在将自由主义理念和实践落实在中国的进程中发挥独特和重要的作用。

自由主义既是一种学理，也是一种生活方式。这种学理的铺开正在快速改变中国的现实，让越来越多的国人在心灵和生活行为上从极权主义的束缚中“自由”出来。

写完本文，笔者想引用王康先生的话来作为结语：

尽管中国人已经厌透了伟大、崇高、神圣的字眼，尽管先生再次重复了“古来圣

贤皆寂寞”的东方悲剧，尽管先生没有雨果、托尔斯泰、甘地、萨哈罗夫、马丁·路德·金等伟大显赫的遁世者曾经享有的哀荣，尽管先生不曾发出“泰山其颓乎，梁木其坏乎，哲人其萎乎”的临终喟叹，尽管先生对于中国和世界还是一个陌生的名字，尽管中国依然笼罩在扑朔迷离、云谲波诡的深水热火之中，但因特网上数百篇纪念先生的文章，中国自由和良知思想界的齐声祭悼，已经堪称“东方的隆重葬礼”。

先生是一大奇迹，中国整整一个世纪才孕育了这个奇迹，我们对这个奇迹的领悟才刚刚开始。¹⁶³

¹⁶³ 王康：《苍黄不易圣贤心》《议报》www.chinaeweekly.com/history/gb03090421.htm

附录一：

李慎之子女为明报出版社出版《李慎之文选》所写的“后记”：

父亲李慎之今年八十岁，本来准备在这一年将他的文章结集出版，题目也起好了，就叫做《李慎之文集》。父亲在写作上一向是十分严格到几近于苛求的，即使一片几千字的文章，也要反复修改，不能容忍有一字之未稳。文章所涉及到的引文、事实、典故甚至标点都要一再核实才能放心。“文章乃经国之大业”的思想根深蒂固，编书出书是绝不可掉以轻心的。因此，十年前三联书店的沈昌文先生和《读书》杂志的吴彬女士来建议他把文章结集时，他就回绝了。理由是文章的数量不够，内容不够充实。后来文章数量不成问题了，但是，“李慎之”三个字却成了出版界的禁忌，封杀的对象。但是，改革开放以来，国内也接上了信息化的轨道，网络的神力大大削弱了文化专制之威。连父亲自己也没有想到，靠着信息网络，它的文章不胫而走，传遍各地。有段时间，几乎天天都有人（常常是一些并不相识的人）来电话来信，诉说读到他文章的感想，和他交流信息，给他提供资料。父亲把一切都看作对自己的鞭策，因为知道出版的不易，无暇旁顾，索性说：“到八十岁再出书”，而一心思考钻研，埋头写作。人们也希望进入二十一世纪，文禁或可开放，一切水到渠成。

苏绍智先生是父亲的老友，他深为父亲的文章不能在国内出版而惋惜，极力想在海外替父亲结集出书。几经劝说，父亲终于同意选一批文章先行结集刊出。这本书便是香港明报出版社《二十一世纪文库》丛书于2003年4月出版的《风雨苍黄五十年——李慎之文选》。此书的一切出版事宜都由父亲授权苏绍智先生董理。

2003年4月，谁也没有料到，父亲的生命走到了尽头。在他弥留之际，他的儿子赶来告诉爸爸：《风雨苍黄五十年》一书即日将在香港出版。但是，书辗转到来时，只能供在他的灵前了。

父亲生前的诸位好友如李锐、李普、戴煌伯伯等，一再提醒我们，一定要设法把父亲的书尽快出版；国内外无数认识或不认识的朋友也都提出了同样的要求，有人甚至与把定购书的钱都寄来了。

我们当然不敢怠慢。大部分书稿是现成的，一用电脑排录打印好了，因为父亲生前已请段躍女士担任责任编辑排定了。但是，当时内地社会科学院本身自办的杂志都不能刊登“悼念李慎之”的文章，乃至已经刊登了还要开天窗挖去的情势，又怎能谈得上联系出版社公开出版呢？我们本想请明报出版社帮忙，但又一想，一家出版社刚

刚出版了一本选集，怎么可能马上又出全集呢？再说，父亲是希望全集在内地发行的呀。沈昌文先生从国外探亲回来，几乎是一下飞机就赶来的，他立即承担了找出版社的事务。由于沈先生的帮忙沟通，终于在国际书展时，我们和潘耀明先生见面了。一见面，感谢的话还没来得及说，潘先生就急着看稿子。大致了解了情况以后，他非常果断的决定：把未收进前书的文章作为续编全部刊出。这样，问题总算有了一个令人满意的结果。段躍女士获悉此信，立即放下手头的工作，和李尔柔一起加班加点对稿子重新进行校订编排。父亲生前对《文集》的编纂体例有一个设想，但是现在作为《风雨苍黄五十年》的续编，就一定要从权改动，工作量是不小的。另外，父亲还有一些没有改定的文稿甚至是手稿，都有李三达加紧整理出来，编进去。段躍是一个非常细心的人，她把很多文章的处处都找了出来，还连带找到了一些连我父亲都记不起来的文章。这次就把它们都编了进去。这样，父亲在文革以后写的文章就大体上包括了。当然，还不免有遗漏，容我们以后再发现，再补订。由于时间的仓促，也由于我们自身知识的匮乏，更由于我们对父亲的了解肤浅，此书的编纂肯干还存在不少问题和缺点漏洞，敬请大家指出教，以便日后更改订正。在文章中常常会牵涉到很多外文和外国人名及外国掌故典宝，刘漠英教授、徐友渔先生和赵梅女士都热情地帮助校对。在工作过程中，于奇女士、沈帆女士特别是彭洁明女士都给予了大力帮助。在这里，我们作为李慎之的子女并代表我们的母亲向他们表示衷心感谢。当然，要特别感谢苏绍智先生、胡鉴美女士、沈昌文先生和明报出版社的潘耀明先生。没有他们的真诚相助，此书不可能顺利出版。

谢谢一切关心此事的朋友们！

李慎之的子女

2003年10月于北京

附录二：

许良英：《痛悼挚友、同志李慎之》

李慎之同志是5年前才开始交往的新朋友，我们只见过两次面，主要是靠文章和沟通交流思想。他先后寄给我近30篇文章，43封信。有的信写得很长，长达7页、10页；谈论的问题很广泛，从科学、民主、传统文化、国家民族和人类命运，到个人

经历和人生感受。我们都是青年时提着脑袋干革命并参加共产党，1957年都被划为“极右分子”。这样的共同经历，使我们在晚年成为至交，而且大有相见恨晚之感。他小我3岁，却比我先离开人世。失去了这样一位真正志同道合的“同志”，留给我的，是无尽的悲怆和无尽的思念。

他今年元旦第二天给我的长信中就预示了不祥之兆。信中说：“昨天元旦，我们全家是到宣武医院病房里同老伴一起过节的。”我今年已整八十，过去虽然口头也说‘老之将至’而心里总是感觉目前的日子还可以照老样子过下去。五年半以前中风，对我是一个警告，然而日久玩生，也好像无所谓了。这次老妻摔跤，住院已两个多月，我一人在家‘苦守寒窑’，不但孤独寂寞之极，而且也产生了‘死生无常’之感。我从2001年起记录我认识的亲友死亡名录，得15人。2002年就上升到21人。自己到底还能活几年，开始感到没有把握了，而且自己也认为应该对自己敲敲警钟了。”

信中虽然流露出孤独和死生无常的伤感，但依然显示了为中国民主事业奋斗的坚强意志。他继续写着：“我前信曾跟你说过，今生已无从根本上研究‘民主’的发展与历史、理论与实践的愿望与勇气，只是还想(写)几篇万言长文；一是破，破秦始皇以来的专制主义和马列毛以来的极权主义；二是立，立一些民主的规范。”过去几年，我也写了一些文章，多少也算做了一些工作，只是自己以为远远不够。今年手头还有四五个题目，希望老天爷能让我做完这个工作。但是我最想写，而且觉得不能不写的是《民主——中国现代化的目标》一文。”“中国要现代化只有一条路可走，就是全面的充分的民主。这不但是中国的必由之路，也是世界各民族必由之路。”

这些话真是铿锵有力，诚挚感人，可恨“老天爷”太不公道，愣不让他完成这项意义深远的重要工作。

信的最后又讨论了中国将来民主化是否会滑向非洲化或拉美化的问题，以及全民启蒙和公民教育问题。这封充满激情和饱含深邃理性思考的信，引起我长久的沉思。

1月23日他给我写了一封10页的长信，这是我一生所收到的最长的一封信，很使我感到意外。信中讲到，为老妻开刀创口“未能愈合而不得出院，心中烦躁，但也没有办法”。

尽管心中烦躁，他脑子里想的依然是中国的民主化问题。“近十年来，生活没有什么波动，平常总以为可以无限期地 indefinitely 活下去。老妻骨折后，才悟到不变中其实一直存在着变的因素。只希望中国沉默的政治也蕴藏着什么表面看不出的推动力。”

接着他说，前两天读到王若水未完成的遗著两卷本《新发现的毛泽东》，“这又使我惭愧，优柔迁延，不肯下决心，下功夫做学问，正如我对你的研究民主问题一样。”由此想到，我早几年就有中国近代史(自1840年到21世纪中期民主框架大体完成之日)必须改写的想法，但总觉得这不是我老朽的事而寄希望于年轻人。最近忽然想，整本的专著写不出来，万言长文提出几个主要论点，或者写出一个大纲来，总还是应当而且可以的吧。现在想把最初步的意见向你请教。”下面用7页篇幅告诉我其主要论点。“首先，我认为一个民族最重要的创造是其政治制度，经济、文化、国民性都由之决定(与马克思的经济决定论不同)。1840年以前的中国，其政治制度、文化传统就是专制主义，从秦始皇算起已有二千年，不但养成了中国人的深入骨髓的奴性，而且压制了中国生产力的发展。”并尖锐指出，“所谓明清之际的‘萌芽’说(指“资本主义萌芽”——良英注)，不过是硬套五阶段论的文化专制主义的一种伪理论而已。”

他对160年来中国所经历的各个阶段的历史，都有自己独特的看法，且常有惊人语。如说1949年以后，“是世界上最最最革命的理论和最最最专制的传统相结合，使中国形成了最最最黑暗的毛泽东思想三十年的统治。中国传统的专制变成了极权主义。”

这封信非常有价值，可以说是他准备写的中国近代史大纲的一个初步框架，是他多年思考的结果，处处闪耀着他的思想的光芒。当然，也难免有考虑欠周的地方。我给他的回信，首先赞同他提出的政治制度决定经济、文化、国民性的大胆论点，这显然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马克思论断直接对立。我可以用一系列的史实来支持他，尤其是作为西方文明源泉的2500年前雅典民主制最能说明问题。同时我又提醒他，政治制度的形成还是受制于经济、文化等各种因素的综合作用。对他一些明显考虑欠周的地方，我也坦诚地讲了自己的看法。例如他提到，1946年后“三年战争共产党大获全胜，可称历史奇迹。我是过来人，但除了佩服毛主席英明伟大之外，到现在还有莫名其妙之感。”对他的这两点感受，我感到意外，在回信中这样回答他：“毛泽东精于权术，诡计多端，军事指挥上确有高招。但由于军队士气高昂，各路将领大多身经百战，才艺高强，完全能独立作战，统帅即使换上周恩来这样的人，战争照样会胜利，充其量不过时间可能拖后一年半载。把功劳主要归功于毛泽东，我在感情上接受不了，即使在1949年我也不会同意。我始终认为，革命事业只能依靠集体力量。……1946年蒋介石发动内战必然失败的主要原因在于人心向背问题。”

3月28日他写给我一封短信，说从一个刊物上读到一篇介绍爱因斯坦自由思想的

文章，“深感受因斯坦关于自由的思想之丰富与深邃”，建议我也可以写这样的文章，“也可以为你在刊物上露面打开一条路”。他显然是希望我能够冲破 14 年来不让我在报刊上发表文章的禁锢，我回信告诉他，目前看不出有这个可能性，而且介绍爱因斯坦的自由观已有更好的渠道，这就是去年秋天我已为浙江文艺出版社编了一本 20 万字的《爱因斯坦文录》，其中关于自由、人权的文章就有 6 篇。此书估计今年 6-7 月间可以出版。

慎之同我最初交往是在 1998 年 2 月，他托老朋友华贻芳同志（解放前杭州高中的地下党员）带他的文稿《中国传统文化中有技术而无科学》给我，征求我意见。在这以前，他给我有两个好印象。第一个是 80 年代中期茅于軾告诉我，他所在的美国所的所长李慎之说，“现代化就是美国化”。我觉得很有见地。1989 年“6·4”后，听人说，李慎之愤辞社科院副院长职务，说“不愿在刺刀下当官”。以后第一次见面时我提起这两句话，他坦诚地说，这两句话都没有公开说过，而只对一两个人私下说过，而他是到 1990 年才不当副院长的。可见在 80 年代他是象以后悼念王若水的文章中所说的，“被连续几十年的运动吓破了胆，因此还是噤若寒蝉。”

1998 年 2 月 28 日我仔细阅读了他的文章，即给他写回信，完全同意他的基本论点，并深有同感。1985 年以来，我国上下把科学与技术混为一谈，已产生严重恶果，我写过两篇文章予以批驳。慎之的文章是从另一个角度来审视，同我不谋而合。接着讨论了“科学”的涵义，真理是否中性，以及李约瑟的一些论点。

3 月 4 日他给我写了回信，这是他写给我的第一封信。一开头就说：“我的文章属于‘冒叫一声’，实在憋得太久了，不能不一吐为快”。他对李约瑟的“极端亲华”情绪和偏见很反感。“可是这话是我们做中国人的几乎不能说，说了就有卖国之嫌。”“我所以要冒叫一声，是为了要让人注意到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根本差别，西方（以希腊为代表）从源头上就重视求真，中国从源头上就重视求善，这个差别经过几千年的发展，差别实在太大了。这些话其实是老生常谈，不过中国现在已经成了市侩社会，已经没有多少‘老生’了。”

信最后说：“明年是五四 80 周年了。朋友们在研究怎么‘回到五四，重新启蒙’”。“人们只注意到五四口号之一的‘民主’，而忽视五四的另一个口号——‘科学’。我认为‘科学’在中国根本就没有生根。有些科学家甚至‘院士’有多少科学精神，我也很怀疑。于是要我写一篇阐明科学精神的文章，交他们拟议中的《中国启蒙文献精选》上发表。”

我在回信中告诉他，我从1985年开始已把主要精力用于学习、研究民主的历史和理论，已很少关注科学问题了，而且我认为，要纪念五四，重点还应在民主启蒙，1989年我写过这样的文章，现在还可以写。我的回答大概使他感到意外。他回信中说，民主问题已有十来个青年人“着意研究”，而科学精神问题，一个也没有。他随信寄给我两篇文章，一篇是叙述他所以被打成右派的《“大民主”和“小民主”》。他在信中说，被划为右派后，头两年思想不通，59年底60年初“算是彻底觉悟了”，悟出自己的思想“根本与毛泽东思想背道而驰，不可能调和。这样一想也就心安理得”。当时我还在迷信毛泽东，直至1974年才猛醒过来，比他迟了14年。不过，对他发明的并被毛泽东采纳的“大民主”、“小民主”这两个概念，我不赞同。从历史上看，民主只有有无的问题，不存大小的问题。所谓倾听群众意见的“小民主”或“民主作风”，根本谈不上什么民主。

他给我第三封信中简单地介绍了自己的经历，使我开始对他有了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随后我们讨论了他的几篇文章，主要涉及中国传统文化。他家学渊源，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素养令人钦佩，而我没有读过古书，从小就爱上自然科学。他驳斥朱高正、林毓生、余英时等人反五四的谬论，以及对钱基博、马一浮的批评，我都十分赞同。但觉得对王国维、陈寅恪的人格的评价偏高，尤其是对殉清自尽的王国维。陈寅恪一生远离政治，比王国维清高得多，是一位令人尊敬的正直的学术大师，但他的精神境界不及他的祖父和父亲。对我这一不同意见，他没有回音。

不久有人告诉我，慎之曾在一个座谈会上说自己是“半个新儒家”。我给他信中说：这表明你还有半个并不是，根据求同存异原则，我们之间还有可以合作的领域。他回信说：“我的几篇谈论天人合一的文章，其实都是对季羨林和民族主义分子的批判。所以我们不是一半相同，一半相异，应该说是基本相同。”我认为他的“半个新儒家”是名不副实的。因为从他的信和文章来看，他的基本立场与新儒家相去甚远，甚至相反。首先是坚持五四的民主与科学的启蒙精神；其次是坚决反对民族主义和夜郎自大的心态。因此建议他今后不要再自称“半个新儒家”。

同时我们也讨论了他写的《哈维尔文集》序。这篇序写得有血有肉，对当前同样是极权主义的中国会产生巨大冲击，主要论点我完全赞同。但序中也有不妥之处，如说，“自从Machiavelli以来，西方政治学一直把政治定义为权力的游戏”。事实上，权术崇拜者Machiavelli虽然对后人有不小影响(如Marx, Engels都大力吹捧他)，但没有成为西方政治思想的主流。相反，西方主流思想是继承了Aristotle的传统，

Aristotle 的名言“人是政治动物”和“人是理性动物”，“人是合群的动物”始终是有识之士的共识。Locke 的名著《政府论》中就把“政治社会”等同于“公民社会”。所谓“反政治的政治”，有点近于庸人自扰。

1999 年 8 月，他从美国回来以后不久，在信中向我诉述了他的一个重要的思想收获和自己难以忍受的孤独感。他说：“在美三个月读五四之书，最后悟出中国虽无宗教，却有意识形态，其强烈不下于宗教，没有宗教刺激人求真知，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优点，这个意识形态就是专制主义，就是外儒内法。二千年来只有五四冲击了一下，但谈不上彻底，因此，又以革命名义卷土重来，变本加厉，中国至今仍在其统治下，这就是我在介绍哈维尔的文章中说的‘后期极权主义社会’。最理想的办法是和平进化，但是可能性几乎没有。国内外现在都没有‘爱国志士’，有的只有利禄之徒。你说我关于哈维尔的文章，对‘当前的中国会产生冲击力’，但是我却看不到会有什么影响。从中国到外国，再从外国到中国感到的只是极度的孤独。”

这番肺腑之言深深地感动了我，我为他最新的思想收获感到高兴，为他的孤独感感到伤心。但我觉得他对现实过于悲观了。表面上，中国这块几千年来沉积成的板块是坚不可破的，但在整个人类文明洪流的不间断冲击下，早已在逐渐溶化中，因为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人心是不可侮的。我 1976 年清明前每天路过天安门广场所见的感人场面和 1989 年 4-5 月间更加激动人心的所见所闻，都验证了这一真理。1987-88 年间，人们普遍为当时大学生只关心个人利益、不关心国家命运而忧心忡忡；可是，1989 年 4 月中旬以后，他们所表现的政治热情竟如此高涨，在北京甚至有三千人以绝食这种准备牺牲自己生命的方式为中国的民主事业而抗争。经过血腥镇压和十年的意识形态严密控制后，是不是人心都死了？普天之下竟没有一个“爱国志士”了？完全不是。相反地，倒是处处感到鲁迅所说的“于无声处听惊雷”！我告诉他，“你每年发表这么多文章，又有这么多人争请你写序，显然，理解你和仰慕你的人是很多的。……总之，我觉得你决不是‘孤独’的，至少我和我的一些朋友都是你的知音。”

这个回音大概是打动了他的心，使他不再感到“极度的孤独”，而是知音遍天下，使他觉得需要在这个鸦雀无声的年代，用更大的声音“冒叫”，把多年憋在心里的话痛痛快快地吐出来。随后我寄给他一篇我半年前写的《“89”十年感言》，对惊天地泣鬼神的悲壮的 1989 年民主运动作了简要的回忆和反思。他回信说：“有错不敢承认是懦夫，错误已过去十年不敢改正是无能。他要自取败亡，我们也无能为力。”

一个多月后，他托人送来新作《风雨苍黄五十年——国庆夜独语》。这是一篇令人

拍案叫绝的传世之作。当读到“中国人在被‘解放’几十年以后，不但历史上传统的精神奴役的创伤远未治愈，而且继续处在被奴役的状态中”；“掩盖历史，伪造历史，随着这次 50 周年的大庆的到来而登峰造极。50 年间民族的大耻辱，大灾难统统不见了”；“历史剩下的只有谎言……而我们居然生活在谎言中”，我心潮澎湃，立即给他写了回信，表明读到此文“深受感动，引起了强烈共鸣。这是一篇有巨大震撼力和冲击力的杰作，作者的胆识令人钦佩。读了这篇表达当今中国知识分子心声的精彩杰作，我更想同你见面畅谈，交流思想。”同时我也感到有几处美中不足。其一，对自封为第二代核心的邓小平的分析评论温情乏力，没有到位。其二，Lord Acton 的名言：“Power tends to corrupt and absolute power corrupt and absolutely.” 宜译为：“权力趋向腐败，绝对权力绝对腐败。”其三，“提高人权”宜改为“尊重人权”。

这篇文章，象一颗精神原子弹，在中国知识界引起了强烈震荡，连 90 岁的老将军吕正操也要登门拜见作者。当政者当然恼火，派下属找他谈话。但此人却只问文章给几个人看过？怎样上网的？而不敢涉及文章的内容是否触犯党纪国法；即使手中握有生杀之权也无可奈何。

1999 年 12 月 7 日上午，我们在他家里第一次见面。他看来比我年轻得多，象 60 来岁，头发乌黑，脸色红润，只是中风过，走路困难。他很健谈，也很坦率。他说自己以前觉得“高人两等”，因为到过延安，又在党中央机关工作，对自己会被划为右派，开始时无法接受，1960 年终于醒悟了，认为自己真是右派。80 年代初得到胡乔木赏识，出任美国研究所所长，事实上他认为自己对美国并无研究，让他作别的研究所所长也行。他只说胡乔木胆子小，没有看出其品行的卑劣。看来，胡乔木、邓小平对他都有知遇之恩，他们对他们的评价都有失公正。他说今年去美国，醒悟到中国传统就是专制，要回到五四的启蒙，但他考虑的主要是中小学生的公民教育。他是个思想开放，知识面广，有深厚旧学根底，有才华，有文采，有风趣的人。他说自己不是学者，他没有做过深入系统的研究工作，缺乏严格的理论训练，治学不够严谨。在我所认识的老共产党员中，他是有反思精神的，思想上同我最接近，而且志向完全一致，是真正意义上的同志，因此我们相互以“同志”相称，尽管我 1989 年以后已经不是共产党员了。

2000 年 5 月他托人送来一篇将近 2 万字的论文稿《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征询我意见。这是一篇有很高学术价值的论文，也是对现实有强大冲击力的战斗檄文。主题思想就是他一年前在美国悟出来的：中国传统文化就是专制主义。现在他对这一

论点进行系统的有充分说服力的论证。这可能是他一生最重要的学术论文。当时他给我的是一份修改稿，稿中到处有他用红笔改写的字迹，其中有不少是大段的增补。他把这样一份在修改过程的原稿寄给我，也足见他对我的信任。这篇论文定稿时改名为《论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兼论中国的专制主义》。

2000年10月他又托人送来给舒芜的信，要我“多提意见”。这封信主要是讨论五四精神，以及鲁迅与胡适的比较。他不同意舒芜把五四精神限于“个人解放”并把鲁迅作为五四精神的唯一代表人物，我深有同感。但我不同意信的开头对舒芜的两点评价。其一，对舒芜1955年把胡风的信交给《人民日报》，他说，“世人或有难谅解者，我是有深切的同情”。我则认为这是置胡风于死地的告密行为，即使在当时的政治压力下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从人性、良知和道义的准则来衡量，是应该谴责的。至少在今天不该“有深切的同情”。其二，信中用很大的篇幅和极其夸张的语言赞扬舒芜的《论主观》，说“在我这一代人当中你是最有思想，也是最能思想的一个”，说他是“一世之雄”。我告诉慎之，此文刚发表时我也读过，觉得有唯意志论的味道，谈不上有什么了不起的思想深度。这两点意见他是采纳了，发表时删去了这些内容。在回信中我还提出，对鲁迅的“拒绝宽容”不宜苛责，当时他的好友杨杏佛、柔石被杀，他自己的安全也受威胁，有人还从背后放冷枪。胡适的宽容精神确实值得称赞，但应注意到，在他一生的政治实践中，宽容往往与他的软弱和脱离现实密不可分。

2001年2月2日下午，他约我去他家第二次见面，晚饭他请我们到附近一家餐馆吃鱼头火锅。我们先议论了当时热门的法轮功问题，转而回到在信上讨论的问题。首先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评价问题，他说他早已不信马克思主义，但从未公开批判过。我建议他在给舒芜的信中删去一句与主题无关而令人莫名其妙的话：“尼采与杰弗逊，到底谁对人类文明的贡献更大？”他不接受。我说，尼采是一个反理性、反民主的唯意志论者，他崇拜超人，崇拜征服者，崇拜拿破仑，而鄙视平民和妇女，鄙视林肯这样的人，而杰弗逊则是美国民主制的主要设计者，怎么可把这样两个人相提并论？这显然有悖我们所崇扬的启蒙精神。我提醒他，要珍惜自己的形象，不要被人看作是思想混乱的人。关于邓小平的评价问题，我们又进行了争论。我觉得他对胡耀邦在改革开放时期的思想主导作用以及80年代高层内部斗争的情况并不了解，于是介绍了胡耀邦留给我的印象和当时的直接见闻。整个谈话非常坦诚，中间虽有争论，但各人都把心里话说了出来。对于一向感到自己孤独的他，这样直率的交谈恐怕是不多的。

那次交谈后，我们在信中继续讨论Marx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我认为，王若水说

的“马克思主义是唯人主义”是曲解了马克思主义，只看到虚幻的共产主义天堂的理想，而看不到通向这个天堂的血淋淋的专政之路。

由于他一直在关注所谓“李约瑟问题”，我寄给他我的老师浙江大学心理学教授陈立先生 1944 年的一篇重要论文，并详细介绍这位仍在带博士研究生的 99 岁（今年已 101 岁）老人的情况，而这位老先生近几年同我通信很密，对慎之的《风雨苍黄五十年》十分赞赏。我们一连在几封信中谈论了陈立先生，他对陈立先生也非常崇敬。

2001 年 11 月，有位青年朋友送我一封从网上下载的上海朱学勤 2 月发表的《答元化先生书》，信中披露王元化 1 月间在报刊上指责慎之“拉帮结派”，我感到震惊，也为慎之不平。我原以为王元化与慎之被人称为“南王北李”，关系一定不错，想不到竟会出现如此严重分歧。我猜测，分歧可能来源于对五四和中国传统文化的评价。近十年来，王元化恣意否定五四，宣扬杜亚泉甚至辜鸿铭，吹捧新儒家，有明显的复古倾向，对慎之忌恨，不足为奇，但居然公开造谣中伤，心术未免太卑劣了。于是我给慎之写信，问他原委。他回信说，这个问题是他最不愿意谈的，但还是把他能够想得起来的情况原原本本地告诉了我。他一一详述了与王元化见过几次面，在什么场合，交谈了什么。他说：“事实上，我跟朱学勤‘拉帮结派’的可能性与同王元化‘拉帮结派’的可能性一样小，因为见面与联系的机会几乎一样小。”他分析，这件事“起因于 1995 年丁东吹捧我们两人为‘南王北李’一事。”“王一再在公开场合大声否认‘南王北李’之说，我其实也是否认的，不过不是大声”。随后，我们在信中讨论了王元化的所谓“新启蒙”。接着我们也讨论了当前风行的“后现代主义”和“新左派”的谬论。

2002 年 2 月，读到他悼念王若水的文章。文章写得亲切动人，点出毛泽东的“朕即国家”的思想，真是一针见血。文中他又坦诚地剖析了自己，说：80 年代，“像我这样的人心中也不是没有倾向，不是没有分辨是非的能力，但是被连续几十年的运动吓破了胆，树叶掉下来都怕打破了脑袋（以后的修改稿删去了这 12 个字——良英注），因此还是噤若寒蝉，只能在心底对若水的正确与勇敢叫好，赞叹与敬仰。”美中不足的是，文中所反映的 1977 年到 1989 年中国思想界的情况并不准确。如说：“历经 30 年的高压，备受荼毒的中国人当时能够想到，敢于想到的只是人道主义与人的异化的概念”；“80 年代中国思想界的中心议题就是周扬和王若水提出的人道主义与异化”。于是我写信告诉他，80 年代，人道主义争论由于胡乔木的卑劣无耻表演而影响较大，但应知道，此外还有民主与专制（80 年代后期演变为“新权威主义”），思想自由与“反自由化”，以及反对意识形态对自然科学的干扰，等等，都是思想界所关注的问题。如果

80年代仅有人道主义争论，很难设想1987年胡耀邦会被迫辞职，1989年会爆发空前规模的学生运动。关于80年代中国思想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美国Boston大学政治学教授Merle Goldman和Johns Hopkins大学副教授H. Lyman Miller都曾分别写了专著。

2002年4月，我两次读到他给朱学勤信的复印件，谈的是准备纪念顾准的问题。要纪念顾准，宣传顾准，使顾准的珍贵思想尽可能成为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共同财富，完全是应该的，我举双手赞成。但他的信中说：“顾准是中国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思想家。比五四先贤陈独秀、胡适、鲁迅、李大钊、蔡元培都更伟大。”“他比所有的人都更用功、更执着地追求中国的出路，从各个角度比较中西文化，学习民主的道理。”我认为这个论断过于仓促，不符历史事实。经过反复思考并重新阅读《顾准文集》、《顾准日记》后，6月14日给他写了一封信，坦呈自己的意见：

顾准的独立思考和不屈不挠的精神令人十分敬佩。我直到1974年才摆脱对毛泽东的迷信，而他早在50年代就已不存在这种迷信，能够独立地自由地思想。但他70年代以前思考的主要是经济问题，基本思路没有越出马克思主义框框。从他的日记看来，他是1972年10月从干校回北京后，开始阅读大量中外历史著作和几本哲学名著，可惜不久就患病，1974年12月就去世了。他一生中最光辉的思想主要是在这个时期写下的。以带病之身，在短短两年内迸发出如此众多的令人眩目的思想火花，可以说是一种人间奇迹。遗憾的是，两年时间太短，他要考虑的问题和要读的书都太多，有些书不可能读得很仔细和好好消化（如Aristotle的《政治学》就如此）。因此，这两年他不可能写出一篇完整的文章，而只能留下一些笔记性的文字，其中有不少显然不是深思熟虑的结果。例如关于民主问题的许多论断，与我和老伴王来棣近20年来所阅读过的许多关于民主的历史和理论的代表性著作并不一致。他写过《希腊城邦制度》，对雅典民主制持否定态度，认为是“贵族政治”，并说Aristotle激烈反对民主制。我们两人都通读过Aristotle的名著《政治学》，所得到的印象恰恰相反。Aristotle虽然对雅典民主制的缺点作过尖锐的批评（他称为“极端民主”），但基本上是赞赏民主制的，认为民主制的精神是自由，在三种政治制度（寡头、贵族、民主）中，民主制最佳。顾准完全否定直接民主制，认为一党专政和“文革”都是直接民主。这一错误论点被王元化、刘军宁奉为经典，也影响了当前一些青年政治学者。他还附和毛泽东的民主是手段（方法）不是目的的错误论断。他虽然反对一党专政，主张多党制，但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多党制，而是“社会主义的两党制”。看来，他对民主概念的

理解还是相当混乱的，可以说他的探索仅仅开始，还没有彻底摆脱马克思、列宁和毛泽东的影响。

相比之下，五四时期几位著名思想家，在思想的深度和成熟程度，以及眼界方面，显然都不是顾准所能及的。因为五四时期，知识分子基本上是自由的，而顾准要挣脱几十年来束缚自己思想的意识形态的禁锢，是极其艰难而又要冒大风险的。

这封信他没有及时收到。因为5月他去了杭州，6月1日回北京后就搬家，从建国门外的永安南里搬到潘家园的华威西里，可能在忙乱中弄丢了。10月间他要求我把信底复印给他，并说了他所以对顾准估计很高，是因为这二十多年来，“事实上顾准已经成为民主派或自由主义者的一面旗帜”。

对于这个评价我也不同意。因为顾准的文集1994年才出版，在此以前很少有人知道顾准的思想，而中国现代的民主派和自由主义早在80年代就已形成。而且顾准文集中根本没有论述自由的文章；议论民主时，也没有涉及自由、人权。顾准没有吸收Aristotle, Locke这些杰出思想家的思想，却误把反民主、宣扬精英统治的Schumpeter(顾准译过他的书)的糟粕当作经典。他收到我这封信和6月14日信的复印件后，没直接回答我的意见，但希望我写评论顾准民主思想的文章，说“这不可能有损他的形象与影响，反而是最好的启蒙材料”。

2002年5月，他应邀去杭州中国美术学院讲学，然后又到浙江大学作了一次演讲。听说这两次讲话反应非常热烈。这不禁使我想起1985年3月方励之在浙大演讲的情况。那是方励之第一次公开谈论政治问题，在大学生中产生了巨大影响。以后读到慎之在杭州的讲稿《全球化和全球价值》，觉得内容非常好，特别着重阐明民主是全球价值，对官方意识形态有很大冲击力。不过有几处讲到历史的地方，不够准确，甚至会误导读者。于是我给他写了一封信，坦率地提了几点意见。特别是对F. Bacon，显然拔得太高了(顾准也有这个问题)。

10月30日他回给我7页长信，态度非常坦率诚恳，感人至深。信中他诉述自己的思想变化历程。他说：“不嫌狂妄地说，我的二次觉悟(一次觉悟是马列主义觉悟)大体上与顾准是同步的(我是1960年看穿毛泽东式的社会主义而重新确立民主思想的，也可能比顾准晚了两三年)。但是我的斗争意志远远比不上顾准，我的心情灰到‘他生未卜此生休’的地步，书倒是不断地看，像哈耶克的《通向奴役之路》，熊彼得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主义》，几乎‘在内部’一出来，我就能看到，但是我一来从年青时就没有做学问的训练，二来是根本没有觉得自己还能有著书立说的可能，当时

对自己的最高要求就是做个明白鬼算了。到‘改正’（指1979年错划右派问题得到改正—良英注）以后也有好几年还是这个心情，只是做官做事大体倒还能做到按自己的原则行事。近年来才想到还有可能发挥余热，但是又觉得桑榆晚景干不了多少事了。就一年写几篇文章，最长不过万字，自认为想通一个问题就写一个问题。其间还有一段时期，因为对毛泽东批儒的反感，觉得中国传统文化远没有毛的极权主义那么坏，还一度迷醉于新儒家的学说，这就是我曾经对你自称也可以算‘半个新儒家’的原因。”“我过去几年的‘工作’进度是很慢的，自己觉得虽然效率不高，但是还能‘赶趟’，不过最近以来，我突然直觉地感到中国应当有一批‘战斗的民主主义者’，然而全社会好像都没有这样的准备。我有三个小圈子，一个都是80以上的人，一个是大约60到70的人，另一个大约50上下的人，每一两个月聚会一次。我近来一再呼吁他们研究民主的理论和制度，但是除了年轻的一批外，反应都很冷淡”。“我自认为我思想的‘大方向’还是正确的，但用作论据的许多事实 and 材料都不准确，这是因为我不但学力不足而且从头就没有决心潜心治学的缘故。”信中还议论了新出版的《大学人文读本》。我觉得这套书立意很好，会有助于青年学生扩大眼界，提高思想境界；但所选的文章基本上是近年国内出版的书刊上的，有些质量不高，而且缺乏真正有价值的经典性著作。他完全同意我的意见，并建议我把有价值的经典原文编一本《民主读本》。这是个好主意，做起来并不难，问题是是否有合适的出版社愿意出版。信的最后讲到比他大3岁的老伴10月17日在家门口摔了一下，摔成大腿骨折，一个多星期后才住进医院，生活不能自理，四个儿女轮流去服侍她，“真是紧张之至。我心里也忙忙乱乱，做不出什么事来。”

虽然家逢厄难，但他忧国忧民的情思依然未停，反而迸发出更加灿烂明亮的光芒，这反映在他今年1月2日和1月23日给我的两封长信中。在生命结束前3个月，他的生命力竟如此旺盛，思想成果又如此丰硕，真是一个奇迹。我们正期待着他把想写的惊世宏文都写出来，他尽心呼唤的民主能在中国大地上成为现实，他却猝然倒下了。慎之，你安息吧！只要我们一息尚存，我们都会坚定不移地在你已经走过的道路上继续前进，尽力为实现我们的共同理想而抗争！¹⁶⁴

¹⁶⁴ 许良英：《痛悼挚友、同志李慎之》新世纪网 www.ncn.org 6/20/2003

参考书目

- C. J. Friedrich and Z. K. Brezinski, *Totalitarianism Dictatorship Autocracy*, New York Press, 1965
- C. J. Friedrich, ed., *Totalitarianism*,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4
- Charles Taylor, *The Politics of Recognition*, in A. Gutmann ed., *Multiculturalism*,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3
- Hannah Arendt, *The Original of Totalitarianism*,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1951
- Juan J. Linz and Alfred Stephan, *Problems of Democratic Transition and Consolidation*,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Baltimore and London, 1996
- Juan J. Linz and Alfred Stepan, *Problems of Democratic Transition and Consolidation: Southern Europe, South America, and Post-Communist Europe*, Baltimore and London: Th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6, (Antithesis)
- K 波普尔著，赵月瑟译《波普尔思想自述》，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
- Sigmund Neumann, *Permanent Revolution: Totalitarianism in the Age of International Civil War*, New York, Harper, 1942
- 卞悟：《二十世纪末中国的经济转轨和社会转型》，《二十一世纪》，2002年8月号
- 波普尔：《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中社科，“西方现代思想译丛”，2000年
- 曹长青：《李慎之的三大贡献与三个局限》，www.ncn.org, 30/04/03;
- 曹长青：《李慎之是不是思想家？》
<http://www.ncn.org/asp/zwginfo/da.asp?ID=52750&ad=5/31/2003>
- 陈独秀：《本志罪案之答辩书》，《新青年》第6卷第1号
- 陈独秀：《宪法与孔教》，《新青年》2卷3号
- 陈奎德：《胡适：中国自由主义的中枢——自由主义在近代中国》
www.peacehall.com/news/gb/pubvp/2005/05/20

- 陈敏之、丁东编：《顾准寻思录》，作家出版社，1998年
- 陈敏之编，《顾准文集》，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1994年
- 陈敏之等编：《顾准日记》，李慎之序，经济日报出版社，1997年版
- 陈序经：《从西化问题的讨论里求得一具共同信仰》、《独立评记》第149号，1935年5月5日
- 陈序经：《东西文化观》，《社会学刊》2卷3期，1930年
- 陈序经：《东西文化观》，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 陈序经：《中国文化的出路》，商务印书馆，1934年
- 陈愚：《胡适型知识分子与鲁迅型知识分子》，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网站 2004-08-29
- 储小平：《权利与组织资本》
<http://info.news.sinobnet.com/HTML/001/002/009/003/8636.htm>
- 戴煌：《永念慎之兄》www.sinoliberal.net/lishenzhi
- 单少杰：《毛泽东执政春秋（1949——1976）》，明镜出版社，2000年
- 丁东：《大哉李锐》编后记 www.observechina.com/info/artshow.asp?ID=33262
- 丁东编：《怀念李慎之》文集，上、下册，2003年
- 丁东主编：《致何家栋信》，《李慎之纪念文集》
- 段跃：《永远的尊严——痛悼李慎之先生》
www.sinoliberal.net/lishenzhi/liszmemoial.htm
- 恩格斯：《反杜林论》，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3页
- 樊百华：《初述1980年代中国的自由主义》《新世纪》网
www.ncn.org 25/09/2003
- 樊百华：《“秦晖底线”：当今中国的道义权威》，《改造与建设》网
www.bjsjs.net 17/02/2004
- 樊百华：《宋楚瑜为党国背书？》 <http://www.boxun.com/hero/fanbaihua>
- 费孝通：《乡土中国》www.law-thinker.com/wenji.asp?subid
- 丰临：《我们有顾准》《新世纪》www.ncn.org 8/15/2002
- 冯崇义、朱学勤编：《李慎之与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命运》，香港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3年版
- 冯崇义、朱学勤编：《宪政与中国》，香港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
- 冯崇义：《“全盘西化”辩》，《当代中国研究》，2005年第2期

- 冯崇义：《从中国化到全球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 冯崇义：《从中国化到全球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版
- 冯崇义：《第三道路世纪梦：社会民主主义在中国的历史回顾》
- 冯崇义：《今日中国的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和自由主义学派》
www.zhenhuanet.com/wangzhan/lever%203/level3
- 冯崇义：《李慎之：冲决专制主义传统的中共党内自由派领袖》，思想评论网站
www.sinoliberal.com
- 冯崇义：《李慎之：冲决专制主义传统的中共党内自由派领袖》思想评论网站
www.sinoliberal.com
- 冯崇义：《中国文化和 21 世纪的‘第三条道路’》，载《从中国化到全球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3 年版
- 冯崇义编：《李慎之与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命运》，香港社会安定科学出版社，2004 年版
- 傅国涌、樊百华等：《脊梁》香港开放杂志出版社，2001 年
- 傅国涌：《李慎之晚年的悲凉——与许良英 4 3 封通信的解读》
www.blogchina.com/new/display/102676
- 高力克：《五四的思想世界》，学林出版社，2003 年
- 公羊编：《思潮：中国“新左派”及其影响》，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年版
- 哈耶克：《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1 年
- 汉娜·鄂兰著，林骧华译，《极权主义的起源》，中研院社科所图书馆，1995 年
- 何秉孟主编：《新自由主义评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 年版
- 何方：《悼慎之》www.sinoliberal.net/lishenzhi/liszmemoial.htm
- 何家栋：《未了的心愿——怀念慎之》www.china-village.org/ReadNews.asp
- 胡绩伟：《新春放言》，《北京之春》1996 年 3 月号，总 34 期
- 胡平：《阅尽沧桑之后——李慎之一代知识份子的反思》
www.bjsjs.net/news/news.php?intNewsId
- 胡平：《恐惧、残酷与自由主义》，《北京之春》，2004 年 3 期
- 胡平：《犬儒病——当代中国的精神危机》
<http://www.observechina.net/info/artshow.asp?ID=36049>
- 胡平：《人的驯化、躲避与反叛》，亚洲科学出版社，1999 年

- 胡平：《阅尽沧桑之后——李慎之一代知识份子的反思》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网站 16-09-2004
- 胡平：《自由，对中国前途的展望》
www.beijingspring.com/bj2/2003/huping/2003920162710.
- 胡平等：《首都各界人士座谈〈论言论自由〉》，《青年论坛》，1986年11月号
- 胡适：《读梁漱溟先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
- 胡适：《介绍我自己的思想》
- 胡适：《评所谓“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独立评论》145号，1935年3月
- 华贻芳：《痛悼慎之》www.sinoliberal.net/lishenzhi
- 霍布豪斯：《自由主义》，商务印书馆，汉译学术名著丛书，1998年
- 霍布斯：《利维坦》www.jc.gov.cn/personal/ysxs/zzty
- 江宜桦：《自由民主的理路》，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01年版
- 靳树鹏选注：《陈独秀晚年书信三十八封》《书屋》2000年第11期
- 冷眉：《面对慎之先生的愧疚》www.sinoliberal.net/lishenzhi/lisz2003061002.
- 李普：《悼李慎之——我们大家的公民教师》
www.taosl.net/dir1/memo_lisz_hejiadong.htm
- 李强：《自由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
- 李乔：《发现陈寅恪》
www.booker.com.cn/gb/paper18//class001800001/hwz61795.htm
- 李锐、杜光、李普、胡绩伟、张定：《发扬“五四”精神，把民主革命进行到底》燕南网站 |www.yannan.cn/ 2005-05-05
- 李锐：《关于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建议》、《炎黄春秋》，2003年第1期
- 李锐：《迎接新世纪要四讲》、《炎黄春秋》，1999年第12期
- 李锐：《直言——李锐六十年的忧与思》，今日中国出版社出版，1998年
- 李瑞英：《警惕新自由主义思潮》，《光明日报》2004年11月9日
- 李慎之：《中国传统文化传统与现代化——兼论中国的专制主义》，《战略与管理》，2000年第4期
- 李慎之：《北大传统与近代中国》序言 www.sinoliberal.net/zhuxq/zhuxq01.htm
- 李慎之：《点燃自己照破黑暗的人》，《风雨苍黄五十年》，香港明报出版社
- 李慎之：《风雨苍黄五十年——李慎之文选》，香港：明报出版社，2003年版

- 李慎之：《弘扬北大的自由主义传统》
- 李慎之：《回到“五四”，重新启蒙》，李慎之《风雨苍黄五十年—李慎之文选》，香港明报出版社，2003年版
- 李慎之：《回归“五四”学习民主——给舒芜谈鲁迅、胡适和启蒙的信》，《李慎之文选》，香港明报出版社
- 李慎之：《李慎之、杜维明对话录》，《风雨苍黄五十年》，香港明报出版社
- 李慎之：《全球化有赖于全球价值的确立》
www.chinaaffairs.org/gb/detail.asp?id=34133
- 李慎之：《全球化与中国文化》www.boxun.com/hero/lisz/4_1.shtml
- 李慎之：《无权者的权力和反政治的政治—后期极权主义时代的人生哲学（〈哈维尔文集〉序）》
- 李慎之：《新世纪 老任务》www.housebook.com.cn/200101/9.
- 李慎之：《修改宪法与公民教育》www.chinaaffairs.org/gb/detail.asp?id=10527
- 李慎之：《智慧与良心的实录》 顾准日记序
- 李慎之：《中国文化传统与现代化—兼论中国的专制主义》，《太平洋学报》，2001 年第 3 期
- 李慎之：《重新点燃启蒙的火炬》，《李慎之文选》，香港明报出版社
- 李慎之：《自由主义传统在中国的发轫与复兴》
www.sinoliberal.net/lishenzhi/lisz2003042202.
- 李慎之著：《风雨苍黄五十年》，香港明报出版社，2003年
- 李世涛编：《自由主义之争与中国思想界的分化》，时代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
- 李郁：《悼念李慎之先生》www.sinoliberal.net/lishenzhi/liszmemorial.htm
- 李泽厚：《中国近代思想史论》，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
- 刘军宁：《理想之敌 理想之友》www.sinoliberal.net/jnliu/th992023
- 刘军宁编：《自由主义的先声：北大传统与近现代中国》，北京：中国人民出版社 1998 年版
- 刘军宁主编：《北大传统与近代中国》，中国人事出版社，1998
- 刘泽华、刘洪涛合著：《士人与社会》（先秦卷），天津人民出版社，1988年
- 刘泽华：《先秦政治思想史》，南开大学出版社，1984年
- 刘泽华：《中国的王权主义》，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出版